

序 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不断加强。政党交往日益频繁，各类政党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力度逐渐增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们党的执政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党建研究工作，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党的建设放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来把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和借鉴世界上一些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打开思路。

一方面，我们要深入研究苏联、东欧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教训。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维护国家稳定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我们曾专门赴俄罗斯、古巴进行实地考察，对原苏共和古共的党建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说，当前研究苏东问题的文章、专著不少，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有些作品甚至还停留在表面现象和感性认识层面，还有待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从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外国其他类型政党执政的做法和特点。这里所说的外国其他类型政党，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实行政党政治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欧国家政党，二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党。虽然这些政党同我们党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但它们治国理政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做得也还比较少，尚不够系统、深入，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韩灵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作了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她的研究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视角，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很高兴看到韩灵同志在这个研究领域所做的努力，其勇气和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希望有更多的同志，特别是从事党建研究工作的同志能够多学习一些政党政治的知识，多研究一些各国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张尔霖

2005年11月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意义	2
二、研究架构	8
三、研究方法	10
四、研究说明	15
第一章 同根决裂后的不同变迁：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历史沿革 ..	19
第一节 社会党的历史演变	19
一、法国社会党的发展演变	21
二、意大利社会党的发展演变	25
第二节 共产党的历史演变	29
一、法国共产党的发展演变	30
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演变	34
第三节 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	40
一、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主要相同点	41
二、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主要不同点	44

第二章 改良与革命不同阵营中的双双“右”倾：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意识形态比较	50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奋斗目标比较	50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奋斗目标比较	51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奋斗目标比较	58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阶级性质比较	65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阶级性质比较	65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阶级性质比较	72
第三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指导思想比较	77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指导思想比较	77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指导思想比较	83
小 结	88
第三章 温和与激进：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政策主张比较 ...	90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主张比较	90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主张比较	91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主张比较	98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社会政策比较	106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社会政策比较	106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社会政策比较	113
第三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外交政策比较	117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外交政策比较	117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外交政策比较	124

小 结	130
第四章 曲折发展中的盛衰逆转：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力量与影响比较	132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参与比较	132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参与比较	133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参与比较	138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动员比较	144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动员比较	145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动员比较	152
小 结	158
第五章 扶持与限制：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发展空间比较 ...	162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国内制度空间比较	162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国内制度空间比较	163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国内制度空间比较	171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国际政治环境比较	180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国际政治环境比较	181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国际政治环境比较	189
小 结	197
第六章 改良主义的决定作用：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基础比较	199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基础比较	199

一、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基础的状况	200
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	203
三、战后经济基础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异同的影响	209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基础比较	215
一、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变动	215
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	220
三、战后社会基础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异同的影响	226
小 结	233
结束语	236
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运动从根本上决定 了这一时期社会党与共产党不同的政治命运	236
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伦理双重内 涵的认识历程决定了二者在奋斗目标上的不同转变 ...	240
三、政党自身应对生存基础和发展空间的变化所具有的主观能动 性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直接原因	244
参考文献	248
一、英文著作	248
二、英文期刊	253
三、中文著作	254
四、译文著作	260
五、中文期刊	266
后 记	268

导 论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历史上有着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点不同于美国、日本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地理上和苏东等曾经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接壤。可以说，西欧一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直接对垒、交锋的地方。近百年来，西欧两大传统左翼政党——改良性质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以下统称为社会党）和革命性质的共产党一直承受着这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斗争的压力。由此，二者虽然同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在寻求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上却并不能达成共识。二战结束后（以下简称战后，二战结束前则简称战前），^①世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异同也出现了新的演变。对于这些变化，有人提出了种种疑问：共产党是否将

^①“战后”确切地说是从1945年开始，但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比较研究的科学性上来说，两大左翼政党在1945—1947年间与1947年冷战开始后的状况极为不同，所以本书在第一章内对1945—1947年间两大左翼政党的情况作一简单阐述后，对二者的比较分析都是从1947年冷战开始进行的，分为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间两个阶段。关于比较研究中具体的历史分期在后文中还将有详细解释。鉴于本书对于两大左翼政党的研究是在二战结束后西欧经济社会重建而不是在冷战爆发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而且单纯使用“冷战爆发后”不能很好地囊括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两个阶段，所以本书中涉及到所研究的整个历史时期时都使用“战后”一词，而不用“冷战爆发后”。

要被社会党所吞并而永远消逝于西欧政治舞台？社会党已经完全脱离工人阶级而彻底蜕变为资本主义政党了吗？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方向和轨迹究竟将会怎样？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亦即为了能够深入认识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以及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本书采用个案研究法，对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异同以及异同成因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分析。

一、研究意义

西欧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祥地，其工人运动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逐步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到19世纪末期，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西欧社会主义者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和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自此，西欧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形成两大思想流派：崇尚合法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推行革命暴动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现实社会主义出现的推动下，推行革命主义的力量从原有的西欧工人政党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另行成立了共产党。西欧工人政党正式分裂为改良性质的社会党和革命性质的共产党两大支派。从此，拥有相近阶级基础和相异发展方向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开始了在政坛上既协作又对立、既联合又斗争的历程。战后，随着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力量与影响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出社会党与共产党力量失衡、双双右倾和共产党“社会党化”的特点。

第一，力量失衡。战后，西欧两大左翼政党在力量与影响上的发展趋势是很不相同的：战后初期两党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明显出现社会党日益强大和共产党渐趋衰微的力量

失衡现象。战后初期直到70年代，社会党在英、法、比、荷、奥、意、挪、丹和瑞士等国相继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共产党也在法、意、芬、挪、丹、圣、比、冰、奥、希等国先后加入联合政府。虽然从1947年开始，冷战的爆发使西欧共产党渐渐被排斥在政府的“权力门槛”之外，但是在法、意、芬、冰、比等国的议会中共产党仍享有“多数派”地位。就整个西欧来看，这一时期两党的力量对比基本平衡。^①到20世纪80年代，南欧五国（法、意、希、西、葡）社会党相继上台执政不仅标志着社会党在西欧^②范围内已成为社会主流政治势力之一（90年代中后期，欧盟13国的“玫瑰红”现象则显现出社会党在西欧政坛的主要地位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且标志着社会党与共产党势均力敌的状态被打破。西欧共产党则从80年代开始逐渐失去与社会党相抗衡的能力，标志性事件就是法国共产党的衰退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变质。就目前的政治形势看，甚至可以说西欧共产党已经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之中。如法共、意重建共、^③西共、希共、葡共等共产党，虽仍然在国内占据第三、四大党的位置，但它们的得票率一般不再能够超过10%。其余西欧各国的共产党或者只在议会中占据几个议席，或者被完全摒弃在议会之外。从两党力量对比的现实看，共产党与社会党并驾齐驱的局面基本已成为历史。

① 在不同的西欧国家内部，社会党与共产党并不都是势均力敌的。如在北欧和中欧国家，共产党始终弱于社会党，但是在南欧，共产党则普遍强于社会党。就整个西欧的综合状况而言的，这段时间两党的力量对比基本平衡。

② 本书中的“西欧”，是与“东欧”相对应的政治意义上的概念，涵盖欧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南欧”则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北欧”指的是除地中海沿岸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③ 意大利共产党（简称意共）在1991年1月底改名易帜为左翼民主党，同时一部分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另建新党“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后改名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意重建共。

第二，双双右倾。战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都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变革，每次思想变革都显现出从左向右转变的趋势。社会党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第一次思想革新，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社会党主张以多元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伦理社会主义为目标诉求，以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为自我认同，以全民党和选举党为政治行动准则，以经济民主的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维护为基本原则。这些内容决定了社会党只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利用和改善议会制民主和政党政治，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逐步改良或“纠正”的改良主义性质的政党。与战前遵循修正主义和追求以合法、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相比，战后的西欧社会党更加远离自己当初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政治身份。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的右翼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日益活跃，社会党在西欧价值观念和政治实践上的主流地位被右翼政党所取代，并且遭到来自新自由主义者的种种批评与责难。这一时期兴起的第二次理论转型主要集中于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等现实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标志着这次思想革新已经获得阶段性成果。这次转型显示出西欧社会党在概念上正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①以拉开自身与“社会主义”的距离。同时，这次

^① 西欧社会党出现概念上从“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倾向，体现了其淡化社会主义色彩尤其是制度更替的奋斗目标，强化以现实基本价值观为目的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社会党思想转型期间，不同的党对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都会有所使用。至今，有的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仍未有完全以“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定论。一般说来，社会党（包括意大利的左翼民主党）无论是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它都属于改良社会主义政党。所以，本书内这对概念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本书中冷战时期多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后冷战时期多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

转型还表明西欧社会党的改良进程是与它对右翼新自由主义妥协相关联的——西欧社会党的经济社会政策不再提及公有制作用，并且主动推行私有化运动，人们很难再找到西欧社会党与右派政党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区分。战后的西欧共产党由于冷战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曾经发生过三次重要的分化。^①其中，法共、意共、西共等西欧共产党的主流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公开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一党制和对苏联模式的膜拜，倡导“欧洲共产主义”，^②走上了追求适合本国特色的，以多党制、代议制为基本内容和以轮流执政为基本特点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政体制内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它们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制度和历史规律，而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深化的民主的进程。社会的全面民主化是其基本政治目标。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以法共和意重建共的“新共产主义”为主要标志，西欧共产党进行了又一次的思想调整，目前这一过程仍未完全结束。在这次思想革新中，西欧共产党对苏联模式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放

^① 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欧共产党逐渐形成三类派别：一是以葡、希（国外派）、丹、奥共为代表的“老共产党”，他们自称坚信并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二是“新共产党”，如法共马列党、挪威工人党（马列）以及瑞典共产党等，他们以中国革命为样板，奉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三是以法共、意共和西共为代表的，以“欧洲共产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西欧共产党的主流力量（全西欧有14个共产党属于此派）。本文主要考察这一主流派别的思想。

^② “欧洲共产主义”是以意、西、法三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人在战后探索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与方式的长期实践中，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的理论共识。其基本内容是：在国内实行通过民主方式走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在国际上争取建立一个和平、平等和独立的欧洲；关于国际共运方面则在坚持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主张发展国际主义团结和友谊。显而易见，它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目的是走一条既不同于社会党，也不同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地位，不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进行单一理解，表现出追求党内民主与党外跨阶级开放的趋势。

第三，西欧共产党的“社会党化”。在西欧的政治光谱中，社会党是紧靠在共产党右侧的政治力量，所以前文所析关于西欧共产党的两次右倾现象就实质而言就是其“社会党化”。这里之所以再次提出，是因为在苏东剧变后一批共产党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党化”现象。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一些传统的西欧共产党在改名易帜之后公开加入社会党国际（如意大利共产党等），还有一些传统共产党在纲领政策上已经与社会党无异，只是尚未公开宣布加入社会党国际而已（如英国共产党等）。这种现象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共产党表现出与同时代的社会党靠拢的趋势。如20世纪90年代的共产党与社会党都强调党内民主自由和党外开放联合，都声称代表所有雇佣劳动者的利益等等。二是共产党更多地表现出与过去的社会党思想相同或相近的特点。如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与20世纪初尚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但遵循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之间，就党的奋斗目标、指导思想、阶级性质和实现社会主义方式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研究战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发展演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特征，探寻这些特征的出现是否已经造成或将要造成西欧两大社会主义传统的终止，以及考察西欧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去生存和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共同的兴趣所在。因为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自产生之日起就作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它们的发展演变不仅关系到一直处于生产力发展最前沿地域之一的西欧社会未来的政治发

展趋势，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前进方向。那么，一个处于基础性前提地位的理论问题就是：战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究竟是什么？这些异同的演变是什么？造成这些异同的根本动因又是什么？也就是说，只有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识别特征加以厘清，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对其它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考察。因此，对战后西欧的两大传统左翼政党进行比较分析，是关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时至今日，不仅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在西欧进入深入推广阶段，对西欧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已经在各方面明显呈现，而且对两类左翼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苏东剧变也已过去十余年，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均已基本“尘埃落定”，所以笔者认为对本课题研究的客观时机业已成熟。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针对战后西欧两大左翼政党进行比较研究，获得关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异同的清晰认识，一方面有利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全面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政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并在彼此交往和合作中执行正确的原则和方针；另一方面也利于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① 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悠久的西欧社会党

^① 《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新浪首页>新闻中心>国内新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题>正文，<http://www.sina.com.cn>，2002年11月17日，22:19，新华网。

与共产党的发展演变中获得经验、教训和启示，对于同样作为劳动阶级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完成自身改革和国家改革任务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此课题研究的实践意义所在。

二、研究架构

本书主要是对战后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异同进行比较。把法国、意大利两个国家作为个案，从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力量与影响等方面全面深入地对比战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异同，并对出现这些异同表现的客观原因——政党的生存基础、发展空间等进行系统的比较性考察，从而正确认识西欧社会党、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以及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状况。

论文研究架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导论、主体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释论文的选题意义、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其中重点考察了战后整个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发展特征，为主体部分对两大左翼政党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的国别研究提供比较分析的宏观背景。

主体部分包括六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历史沿革。首先分别对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至今的发展演变进行阐释，为比较分析提供基础性知识前提，并对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的认识、实现社会主义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加以比较，从历史维度为战后两党的比较分析提供一个纵向研究背景。

第二章，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意识形态比较。分别从奋斗目标、阶级性质和指导思想三个方面，对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

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可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战后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发生了右倾现象，尤其是共产党明显地表现出“社会党化”的特征，但是两党依然保持着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根本的性质区别。

第三章，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政策主张比较。分别对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经济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指出：一方面，两党共同推行政治民主化，重视企业国有化和国家干预，重视社会福利建设，渴望世界和平、民主和公平，在政策主张上共同表现出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特征；另一方面，两党的政策主张存在温和与激进之分，这表现在对群众运动、国有化和社会福利以及对待苏东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态度等方面。

第四章，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力量与影响比较。对战后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政治参与状况和社会动员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并指出两党的力量与影响在战后出现逆转现象：社会党由战后初期的衰弱转变为强盛，最终成为国家主流政治力量之一，共产党则由战后初期的强盛转变为衰退，日趋边缘化，但同时共产党仍然能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五章，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发展空间比较。对战后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国内政治制度和国际政治环境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战后的国内政治制度和国际政治环境都给予社会党一个宽松的、具有扶持性的发展空间，而给予共产党一个狭小的、具有限制性的发展空间。

第六章，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基础比较。对战后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战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分别对社会党和共产党产生不同的作用，是造成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异同及各自演变的根本原因。内

在于经济社会之中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改良主义在战后法、意社会中确立的统治地位，是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产生异同及演变的最终动因。

结束语部分，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法、意等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发展的一些启示或认识。

三、研究方法

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

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探求客观规律的必要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寻找，也不能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探寻。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当二者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因而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本书正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由浅入

深地依次从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产生异同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从而指出，战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基本适合的矛盾性质，是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战后出现盛衰逆转、双双右倾和共产党“社会党化”现象的深层次根源。

（二）比较研究法

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法有着三个“软肋”：一是关于研究的整体性问题。许多比较研究往往出于比较的需要而要对论述对象进行分解，使对事物各方面特征的描述显得支离破碎。二是关于研究的全面性问题。许多比较研究在比较性论述中，往往集中对能相互比较的识别特征展开论述；一些无可比性特征的内容很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有意地舍弃，即为了论述形式而牺牲论述内容。三是关于研究的深刻性问题。比较法多用于对比较对象的具体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常常只局限于在表象上展开；而使用比较研究法对事物实质进行剖析，一般较少看到成功的范例。^①

为最大程度地避免以上三个缺陷，本书不仅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尽量顾及前后、旁及左右，力争使之形成一种整体性，而且注意扩大比较的范围：既对社会党与共产党本身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力量与影响等方面的具体特征进行比较，又对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使原因分析变成影响两党的客观因素的比较分析，加大了比较的深度和广度。这样不仅使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不易明察的异同及其根源得以揭示，而且使论文形式的整体性得到提高。

^① 陈林、侯玉兰等著：《激进、温和，还是懵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三）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时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任何个案，都具有共性和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通过个性而存在，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个案能够较好地体现某种共性，那么，对于这个共性来说，这一个案就具有了典型性。典型性是个案所必须具有的属性，是个案是否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或共性的必然要求。个案研究的价值大小应该由个案所具典型性的程度来判定。本书的研究正是一种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对法、意两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共产党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获得对单独的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及异同根源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整个西欧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及异同根源。

之所以使用个案研究法，主要是因为西欧各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久远，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内都存在着社会党与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西欧各国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民族特性等方面并不相同，因此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政治实践，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各国的个体差异性都极为明显。如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这些国内长期存在专制政权的国家虽然表现出如共产党的力量长期强于社会党等许多共性，但其共产党与社会党在生存环境、发展阶段等方面与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整个西欧范围内两类左翼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叙述时容易头绪繁杂、博而不深，但若只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国家进行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就会进行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入。

之所以从西欧众多国家中选取法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进行个案研究，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具有充分的典型性，

能够达到从个性中展现共性的目的。这种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意两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发展趋势符合整个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发展规律。在纷繁复杂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在北欧的大多数国家，如英、德、奥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原因，长期以来，与强大的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左翼政党是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因此在这些国家里，社会党的社会基础、力量与影响都比较强，在战后不久它就成为该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而共产党力量相对较弱，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地带。在南欧的大多数国家，如法、意、西、希、葡等国，则是掌握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共产党比社会党的力量与影响更为强大，并且这些国家的社会党属于西欧社会党中带有更多革命色彩的激进左翼。这两种模式的差异很大，主要是南北欧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经济变迁、政治变革、阶级及政党结构特点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在传统上，南欧国家就一直不如北欧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特性更适合以改良主义为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的发展。不过，随着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南欧各国的左翼力量出现了逆转：社会党由衰转盛，并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共产党由盛转衰，趋于边缘化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见，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南欧的发展变迁越来越与北欧的趋向一致，只是时间相对滞后一些。其中法国和意大利是西欧革命传统最为深厚的国家，共产党最为强大，社会党也最为激进，它们在战后依然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发展的几个特征，没能逃脱整个西欧两大左翼政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那么，选择法国和意大利两国做个案研究，所得

出的结论不仅不会与选择北欧国家互相矛盾，而且更具说服力。

第二，法、意两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具备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三个条件。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符合关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比较研究的个案对象的国家应该具备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国内必须同时存在着或存在过具有重要力量与影响的社会党与共产党。二是此国家应该在西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国内的社会党与共产党也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国内的社会党与共产党此消彼长的变迁过程应展现得比较充分。只有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个案对象，才具有更多的典型意义。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恰恰符合这三个前提。由此可见，选取法国和意大利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是具有科学性的。当然，不能忽视更不应否认，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法、意两个国家的发展演变仍然有着国别差异性，甚至差异是很明显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法国共产党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屹立不倒，而意大利共产党则改名易帜；法国社会党作为一个近百年的老党，在战后从衰到盛，至今仍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样是百年老党的意大利社会党，在战后始终不能超过共产党的力量，虽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该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但很快在90年代分崩离析，烟消云散。分别对具有如此明显的个体差异性的两个典型国家的两大左翼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两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共性认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共性认识应该是关于整个西欧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普遍性认识。据此而言，法、意两个国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西欧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以它们作为比较研究的个案对象是科学的。

另外，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经过对国内、国外（英文）有关资料的检索与阅读，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关于战后西欧（包括

具体国别) 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比较研究较为系统深入的专门性学术成果,^①就我国学术界而言,专门以法国或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亦是十分罕见的。^②为此,本书选择法、意为个案,对这两国的社会党与共产党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获得关于整个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共性认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视角,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尽了绵薄之力。

四、研究说明

为了避免出现理解上的不必要误会,在此有必要对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有关概念和容易引发歧义的有关问题作几点说明和解释。

(一) 关于个案国家中左翼政党纷杂的问题

比较研究只是针对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进行。虽然无论在法国还是意大利,还有其他与社会党或共产党性质相似或相

① 关于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包括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许多不同主题的学术著作中都涉及到这一问题,如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或比较,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西欧左翼发展或左翼联盟,法国或意大利左翼的政治生活等主题,但是内容一般都是零散的、片段的、表象的,与本书所做的系统、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根本不同。鉴于这些著作的主题不一,且与本书的研究主旨相差甚远,所以本书不再对它们进行具体述评。当然,不可否认,中外学者关于此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见:侯玉兰在《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中,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从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政治联盟的角度对两党的关系演变及其内在动因进行了研究。该书从政治合作的角度涉及到两党的矛盾分歧和共同主张,但并没有采用比较的视角。胡瑾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对意大利共产党(包括90年代的左翼民主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别作了历史的回顾和精辟的评析;但此书较多地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内容大都是注重对客观表象的记述,与本书强调对现象背后的比较分析具有质的不同。

同的政党。但是，长期存在的、占据左翼政党主要地位的社会党与共产党，才具备分别代表改良和革命两大社会主义传统的资格，其他性质相似的政党往往是从社会党或共产党内部分裂出去的某个派别。它们或者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始终在政治生活中没有大的影响；在选举和执政过程中，这些左翼小党也习惯与相同性质的大党实行联合，与大党之间的差异多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因此本书只对两国中长期占据主要地位的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与共产党进行比较研究，对其他左翼政党一般不予考虑。不过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例外，是涉及到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因为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参政时间较长，本书在研究意大利社会党的政治参与能力时，对具有和意大利社会党相同性质的社会民主党也同时进行了考察，但也仅限于此。

（二）关于两对概念的理解问题

与本书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有两对概念：“革命”与“改良”、“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为避免比较研究中在理解上出现不必要的歧义，下面对它们进行严格的界定。

关于“革命”与“改良”。从政治学范畴来看，《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革命”的阐释中指出“革命一词在不同的意义上得到使用”。^①德国的托马斯·迈尔也在《论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革命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解释：一是社会形势的大变动，不管是用和平手段还是暴力手段的结果。二是短时间内社会形势发生全面和激烈的大变动。三是强行改变政治体制。四是用暴力清除老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706页。

的社会秩序，并同时建立民主制。^①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全面的历史变革”，其基本特征是“社会制度的变革”。^②多种解释往往被人们混乱使用，因此往往无论社会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自称是革命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与“革命”相对的“改良”一词，一般存在“维护制度的改良”和“变革制度的改良”之分。前者往往被称作“改良主义”，即不以对原来的社会制度更替为目标，单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内进行某些局部的改进，以消除某些制度和社会弊病；后者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目标的指导下进行的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而进行的斗争。本书是从政党的奋斗目标决定政党性质的角度对这对概念进行界定的，认为：“革命”就是社会制度的更迭，“改良”就是制度内的改进。

关于“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这是与“革命”与“改良”紧密相关的一对概念。“制度社会主义”^③主张社会主义的实

① [德]托马斯·迈尔著：《论民主社会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② 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③ 这里的“制度社会主义”，还包括思想上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即所有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的新的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代替都包含在这一概念之中。这是因为，虽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前者较为温和，后者较为激进，但都是表达对资本主义的不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二者进行了综合，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从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制度社会主义”概念里也就包含了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容，一般不存在“制度共产主义”的概念。法国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革新中去除往日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直接以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这是有意恢复法国历史上的共产主义思想传统，是为了满足思想多元化和与苏联模式彻底断绝关系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对于这种依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替代的奋斗目标，我们仍然用“制度社会主义”的概念来归纳，因为在西欧绝大多数共产党内仍然是以明确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替代为奋斗目标的。

现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变革，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更替。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制度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且一般被认为是制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关的社会主义运动属于“制度社会主义”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制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一种运动，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政治实践。与之不同，“伦理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运动。它源自于19世纪末由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海·柯亨、卡·伏尔伦德倡导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是道德的价值，只要实现互相尊重、团结互助、公正平等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原则，由奉行社会主义的政党或政治组织如社会党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伦理社会主义”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所涉及到的“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概念，与政党的奋斗目标有关，而且与“革命”与“改良”有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制度社会主义与革命休戚相关，伦理社会主义则与改良紧密相连。因此，当需要把两对概念结合起来时，本书使用了“革命社会主义”与“改良社会主义”的概念。

第一章

同根决裂后的不同变迁：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历史沿革

20世纪初的法、意两国，从社会党内部分裂出了追随苏联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之后本是同根生的两大左翼政党开始了各自漫长曲折的发展变迁。要对战后两大左翼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必须首先对它们的历史沿革的脉络进行梳理。同时，本章还从两国同类政党的国别差异性中提取其共性，为后文的比较分析提供立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还将对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作一简单阐述，为后文的比较分析提供一个历史维度的纵向性背景。

第一节 社会党的历史演变

19世纪下半叶，在结合本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经过各种各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流派的洗礼后，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完成了正式的政党组织的建构。1879年，法国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保尔·拉法格和茹尔·盖德是领导人，宣称是正

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①之后,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最终在1905年,由革命派组成的法国社会党和由改良派组成的法兰西社会党联合组成法国统一社会党(正式名称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至此,法国社会党正式成立。与法国社会党相比,意大利社会党的命运更为曲折一些。在坚持不懈地与主张阶级调和的马志尼主义和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并日益表现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在1892年8月,意大利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劳动人民党成立,1895年改称意大利社会党。

刚成立的法国社会党与意大利社会党都是以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革命性质的阶级政党。同第二国际内部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密切相关,两个社会党内部都存在着对革命与改良问题分歧甚大的各种派别。一战结束后,党内各派之间,以及与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国际之间,针对如何判断当时西欧及本国革命形势,如何正确对待改良主义、议会斗争和资产阶级政府,是否加入共产国际、是否全部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法国社会党与意大利社会党都在20年代初出现了分裂,社会党内部原来的革命派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干预下,独立出去,建立了共产党。从此,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正式出现了社会党与共产党两大支派。我们将分别对两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之后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

^①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还存在着四个自称与社会主义有关的政治组织:一是布朗基主义者的中央革命委员会,二是布鲁斯的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三是巴枯宁和克罗波特金追随者的组织,四是以·饶勒斯为首的独立社会主义者组织。它们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法国社会党的发展演变

1920年以后的法国社会党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冷战时期（1920—1947），冷战时期（1947—1991），后冷战时期（1991至今）。^①

（一）前冷战时期

一战结束后，在拥有多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法国，^②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等问题的看法，当时的社会党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多数派分裂出去，另行组建共产党。保罗·福尔和莱昂·勃鲁姆领导留下的不足原来四分之一的少数派，继承法国社会党原有的政治衣钵。从1924年开始，法国社会党在经历了与共产党分裂后的最初低迷期之后，逐步走出困境。1932年，与激进党共同组成选举联盟，在大选中一举获得了200万张选票和131个议席。1934年初，为了应付越来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法国社会党开始谋求与共产党的联合，于1936年和共产党组成人民阵线并获得大选的胜利。随后，社会党人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进行了法国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改革。

^① 这种历史分期保证了对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同一的历史阶段内进行考察和比较。

^② 各种各样的具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思想或实践都曾在法国出现过。如巴贝夫的革命共产主义、圣西门的专家治国、傅立叶的“法郎吉”、路易斯·勃朗的生产协会以及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概括地说，在前马克思主义时代，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呼吁人性中的公正和博爱精神，一是寻求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社会。相形之下，法国早期的各种共产主义思想也毫不逊色，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两种：一是卡贝代表的民主、改良和自然神论的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德扎米和布朗基极力倡导的革命性和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

但是，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改革于1937年夭折。二战开始后，法国社会党在组织上基本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一部分领导人投靠了维希伪政权；另一部分领导人则带领余下的力量参加了武装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并与法共等其他抵抗力量一起建立了以戴高乐为首的全国抵抗委员会。1944年，麦耶当选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开始对社会党进行重组，开展了大规模清洗战时党内投降派和逍遥派的运动，因而社会党的力量与影响经过短暂的下落后又急速回升。由于战后社会形势变化迅速，此时的社会党领导层对一些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战后出狱的勃鲁姆认为当时法国“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实际的改良主义实践之间有太大的鸿沟”，^①提出修改党章的建议。但是1946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否决了根据勃鲁姆思想提出的把“阶级斗争”修改为“阶级行动”的提议，并选出了新的领导人摩勒。

（二）冷战时期

在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从冷战开始到密特朗组织新党，二是密特朗带领新社会党走上执政之路。

从1947年冷战爆发到1969年新社会党成立，这段时期内法国社会党在组织上基本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不仅其内部经常会有不同派别独立出去，如1958年独立社会党成立，在1960年它又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共产主义论坛”合并成为“统一社会党”，而且没有独立出去的派别之间的斗争与分歧也日益加剧，党的中央领导

^①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New York: I·B·Tauris Publishers, 1996, P. 133.

层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和权威。这一时期，虽然摩勒总书记的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摩勒思想与摩勒本人在政治实践中的行为主张带有明显的矛盾色彩：摩勒是以反对“议会主义”、“人阁主义”，主张不与中间阶级妥协和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登上领袖地位的，而当他在第四共和国内参与政府时，却同意了勃鲁姆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行使权力”^①的主张。冷战爆发后，摩勒彻底丢弃了激进主义，主动向中间靠拢，拥护冷战时期所有反共的观念。这一时期摩勒选择支持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对1958年戴高乐上台的政治态度，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与实践的矛盾。

1969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通过组织整合后改称为法国社会党，这就是所谓的新社会党。1971年，年密特朗率领共和制度大会党加入其中。从此，密特朗成为新社会党的领导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密特朗带领统一后的社会党严格执行与共产党结盟的左翼联盟政策，结果把大量共产党选民吸引到了社会党支持群体之中。这一时期密特朗提出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是当时社会党主要的意识形态：一是明确自己继承勃鲁姆的社会主义传统，反对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此基础上，宣布社会主义是“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充分发展”，是“将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多元化同经济的某种集体组织形式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②二是主张依靠人民的选票对资本主义进行“民主替代”，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制度的直接替代，而是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创建一种不可逆转的局势。三

^①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P. 133.

^② 侯玉兰著：《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119页。

是坚持实现民主替代战略的途径是左翼联盟，只有联合共产党，才能从数量上获得多数派群众的支持。四是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手段是依靠人民的力量，通过结构改革，实现“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目标。1981年，法国社会党开始执政，密特朗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左翼总统。20世纪80年代是法国社会党从理想色彩浓厚的在野党向更加关注具体经济社会事务的执政党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尤其是1986—1988年第一次出现的左右共处（左翼任总统，右翼任总理）的政治格局，加速了法国社会党角色的转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面临执政的具体问题，社会党政府不仅没有深入推行上台时推出的种种体现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反而实行了一些减税、紧缩等右翼政党的传统政策。

（三）后冷战时期

这一时期的前半期，社会党人密特朗仍担任法国总统。但是，由于此时遭受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转型导致的经济危机和苏东剧变引发的政治危机的双重打击，法国社会党进入了调整时期，其表现为党内不同思想派别的斗争更为复杂化和尖锐化。在1995年，若斯潘成为社会党的第一书记，这标志着调整期基本结束，社会党进入以“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为主导思想的历史时期。“现代社会主义”是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党的经验教训，并经过1997—2002年社会党领导的左翼联合政府实践了的思想理论。它一方面表明法国社会党会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另一方面主张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现代社会主义的具体政治目标就是既要保持经济的回升势头，努力提高法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又要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

持社会稳定。2002年法国大选之后，社会党惨败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若斯潘黯然辞职。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没有随之完全淡出社会党的政治实践活动，从2003年法国社会党七十三大上通过的《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党》的决议中仍可看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子。

二、意大利社会党的发展演变

与法国社会党考察相一致，对与共产党分裂之后的意大利社会党的历史考察，依然分三个阶段进行：前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

（一）前冷战时期

一战结束后，意大利社会党内虽然多数力量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但各派别^①之间就如何正确对待改良主义、议会斗争和资产阶级政府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干预下，在1921年里窝那代表大会上，以葛兰西为首的“新秩序派”派从中分裂出去，另行组建意大利共产党。此时仍宣称自己是革命性政党而不是改良主义政党的社会党，虽然成功保留了多数力量，但是元气大伤。尤其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社会党把1922年主张接受国王邀请解决政府危机的屠拉梯派开除出党，其力量进一步受到削弱。墨索里尼上台之后，社会党虽频频遭受打击，但在

^① 意大利社会党内存在这样三个基本派别：以菲·屠拉梯为首的公开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和改良主义的右翼社会党人，以恩利科·费利为首的主张改良主义，但反对亲政府的中派的整体主义者，以及以阿尔土罗·拉布里奥拉为首的反对改良主义、主张暴力革命的左派社会党人。三大派别的影响和作用强大而久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在三大基本派别的基础上不断因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看法不一而衍生新的派别。

法西斯全面专政以前的最后一次议会大选中，仍占据着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1926年，墨索里尼下令取缔一切非法西斯的政党和组织，社会党遭到灭顶之灾。以皮埃特罗·南尼为首的主要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在国内只剩下一些活动小组。1927年，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劳工社会党、意大利共和党在巴黎联合成立反法西斯中心。1934年，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共同签定了反法西斯“统一行动公约”。自此，两党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开始并肩战斗。1943年8月，流亡回国的社会党领导人决定与巴索领导的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及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建立起一个单一的社会党。重建后的意大利社会党在联合政府中仍然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与共产党一起为意大利废除君主制，走向共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946年制宪会议上，意大利社会党拥有21%的得票率，是当时意大利政坛上的第二大政治势力。

（二）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党，以1976年克拉克西上台为界，表现出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克拉克西上台前，社会党处于左右摇摆和派系纷争的阶段；克拉克西上台后，意大利社会党则处于发展和辉煌的阶段。

冷战爆发后，与共产党一起被排挤出政府的意大利社会党依然坚持自己的革命性，坚持暴力革命党的中央集权式和严密的阶级组织，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赞扬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社会党开始主动拉开与苏联的距离，废止了与意共订立的统一行动纲领，公开表示愿意与天民党对话。1963年到1974年间，社会党与天民党组成“中左政府”，获得过副总理和若干部长的职位。显然，这时的社会党先左后右，摇摆不定。党内各派在与谁联

盟等问题上也意见不一，争论不休。1947年1月，以朱塞佩·萨拉盖特为首的右派因反对社会党联共、联苏和反帝的政策而退党，另建意大利劳动者社会党。1952年，该党与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团结社会党联合，正式宣布成立“意大利社会民主党”。1963年10月，因意大利社会党召开大会决定与天民党政府合作，左派分裂出去，于1964年1月成立了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这时，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缓和了关系，随后于1966年两党合并，改称为意大利统一社会党。意大利统一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原则、政治行动和组织声明》表明该党的基本纲领是公正、平等与和平，目标是创建一个摆脱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阶级分化而带来的矛盾和强制的新社会。同时，意大利统一社会党宣布自己是替代天民党和共产党的潜在政治力量，向一切阶级和阶层开放。但是，因为党内分歧，原社会民主党于1969年退出意大利统一社会党，两党恢复了原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意共势力蓬勃发展，社会党则陷入了相对的生存危机。1976年克拉克西担任社会党总书记后，立即着手对社会党进行彻底改革，力图恢复和扩大社会党的政治影响，使之成为一个既能牵制意共又能牵制天民党的“第三势力”。克拉克西建构了“现代改良主义”理论，大力宣传改良主义，攻击列宁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1980年，意大利社会党决定再次同天民党联合组阁。1983年，时任社会党领导人的克拉克西任五党联合政府总理，1987年获得连任。社会党实现了主政的梦想。在主政的过程中，社会党于1984年的四十三大再次强调改良主义是其“基本路线”，加强现行的五党政府联盟是其“战略任务”。1987年的四十四大重申改良主义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1989年的四十五大，提出以“现代改良主义”为指导，并把这一思想融入到该党

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一系列主张中，力图使该党进入全面实践“现代改良主义”路线的阶段。不过，由于受到党的领导人如隆哥、尼科拉齐等被牵连进受贿等丑闻的影响，社会党从这一时期起逐步衰败，在1987年的立法选举中得票率仅有2.9%——这是战后重新建党40年来最低的一次。

（三）后冷战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在意大利，紧随着苏东剧变巨大政治冲击波而来的是反腐反黑的“净手运动”。作为掌握巨大政治权力的执政党之一的社会党，受到了首当其冲的沉重打击，迅速衰退下去，最终于1994年11月宣布解散。原社会党知名人士另外纷纷建立了“社会党人”、“团结社会党”、“民主联盟”、“塞尼公约党”、“自由社会党联盟——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盟”等政治组织。这些组织都不再具有组织严密、纲领明确的群众党特征，在议会中所占议席稀少，力量微弱。真正接替社会党、代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改良主义一支的政党，是1991年2月原意共改名而来的左翼民主党（以下简称左民党）。左民党放弃了意共传统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政治策略，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党性质，并通过在1992年加入社会党国际这一做法而得到普遍承认的左翼政党。1998年，左民党与从前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几个小党合并，并吸引了过去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其政治光谱进一步向中间位置移动。自成立后的十几年来，左民党不仅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渐上升为议会两大党之一，成为中左联盟的领导者。1996年，左民党带领名为“橄榄树联盟”的中左联盟获得了选举胜利，实现了执政的愿望。1996—2001年间，左民党共参加了4届政府，其中1998年10月—2000年4月，左民党人士达莱马组织了两届政府。在这5年中，左民党主导的中左联盟

在治理财政和经济问题方面可以说成绩还是比较显著的，使意大利成为首批进入欧洲经货联盟的成员国，搭上了欧元国的头班车。但是，由于国内、国际复杂的原因，在2001年的议会选举中，“橄榄树联盟”败给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联盟，但目前它作为反对党仍在意大利政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法、意两国社会党的发展历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发端于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19世纪末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式成立，都存在着改良与革命派别之争，这种争论因一战后革命派的分裂而告一段落；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爆发这一时期，都在法西斯压迫下陷入生存困境，由于意大利本土法西斯势力肆虐，意大利社会党所遇形势更加艰难；二战结束后，都重新恢复了生命力，并获得大量选民信任；冷战爆发后，都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分裂与软弱的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都相继实现了组织和思想的重建；80年代，都第一次获得组阁机会；90年代，虽然意大利社会党曲终人散，但继承其政治衣钵的左民党在政坛上的成功，与法国社会党一样证明了改良社会主义政党是国家中能够与右翼政党分庭抗礼的唯一左翼政治势力。

第二节 共产党的历史演变

法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创立如出一辙，都是在20世纪初期，由于社会党内部各派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的争论激化，革命派获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与干预，而从社会党内独立出来另行组建成的。

一、法国共产党的发展演变

我们依然从前冷战、冷战和后冷战三个阶段，对法国共产党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

（一）前冷战时期

自1920年开始，在随后的13年内，由于坚持依靠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一直被排斥在法国的政治体制之外，其发展遇到极大困难。1933年，法共党员只有不到3万人。之后，由于积极参与反法西斯的斗争，并支持人民阵线及其政府，法共的形象和影响才开始得到较大的提升。到了1937年，法共党员人数已经猛升到30多万人，不仅成长为法国的一个群众性大党，而且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二战中，法共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成为法国主要的抗德力量。1944年法国解放时，法共遵行苏联确定的策略，放弃夺取政权，解散爱国卫队，顺应了多数法国人厌战求和的心理，再加之其反法西斯斗士的形象，在战后几年里，法共的力量与影响又一次陡增。1945年，法共党员人数突破81万人，在1946年的议会选举中法共得票率达到28.3%，先后有8位领导人参加了5届政府。虽然由于冷战的原因，法共在1947年5月被排挤出政府，但这并没有阻碍它成为法国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这一时期，以多列士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人也开始思考根据法国具体国情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二）冷战时期

冷战爆发后的法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国际上长期无条件忠实于斯大林的苏联，参与对南共联盟的批判，批评意共结构改革，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等；另一方面通过其在议会中的巨大势力和所掌握

的总工会等群众组织，在法国政治生活的许多事务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与国内选举制度有了变动，加上自身力量回升，法共对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思考再度活跃起来。它不但开始与意共、西共等西欧共产党一起在理论上探索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逐渐地、缓慢地改变着自身原有的思想意识与政治策略。在1961年十六大上法共提出，有可能和有必要同其他民主力量一道进行合作。从此，法共开始在政治实践中追求与社会党实现“左翼联盟”。在1964年十七大上法共正式宣布放弃一党制。在1965年的总统选举中，法共支持社会党人密特朗为候选人。在1968年的《香比尼宣言》中，法共强调其最近目标是“先进民主”。1972年，法共与社会党正式签订了共同施政纲领，进行左翼联盟。

20世纪70年代，在左翼联盟的推动下，法国共产党一反60年代迟缓改变的现象，积极主动地推动“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并将之应用于本党的纲领政策之中，具体表现就是提出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1976年法共二十二大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明确制定出走民主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正式确立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目标。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大以“科学社会主义”取代了“马列主义”的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二十四大、二十五大大上法共对“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通过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建设法国人为自己设计的“民主的、多元化的、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其二，走民主的道路，即尊重普选制，尊重轮流执政，联合大多数群众（左翼联盟）走团结斗争的道路。其三，针对苏东等社会主义

国家的改革浪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有多样性，也有当前的局限性，但不能怀疑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其四，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论，提倡独立、平等、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党际关系，承认各国共产党之间存在不同观点和分歧。其五，主张解散集团，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欧洲一体化。其六，强调法共是劳动群众的党，是迫切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人的党。在“欧洲共产主义”和“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法共改变了原来与苏联保持高度一致的做法，在70年代不断批评苏东国家在布科夫斯基事件、^①捷克七七宪章事件^②等问题上的“不人道”、“不民主”。在80年代国际形势又一次紧张时，法共一方面在国内坚持完善“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对苏联基本支持的态度。

冷战时期，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法共的力量与影响也出现多次起伏。总的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法共始终掌握着左翼领导权，而且自身在70年代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但是80年代之后，法共进入了持续衰退期，并且把左翼领导权拱手让给了社会党。

（三）后冷战时期

苏东剧变后，法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党派、组织和新闻媒体都对法共展开了猛烈攻击，声称共产主义在巴黎也将灭亡，要求法共解

^① 布科夫斯基：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于1976年被释出狱，但同时被驱逐出前苏联。法共政治局对此事的尖锐谴责的声明发表于1976年12月7日。参见David E. Albright (ed.),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p.108.

^② 七七宪章：是1977年由捷克一些知识分子和国内其他社会阶层人士签字的宣言，它要求政府尊重捷克宪法和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规定的政治和个人权利。捷克政府对签字者进行了镇压。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于1977年10月19日对捷克政府的镇压行为进行指责，同时间接表达了对苏联的不满。

散或放弃共产党的称号。而法共党内思想也出现极度混乱，各派别之间指责和辩论不断升级，不少基层组织产生动摇、彷徨，一些党员脱离党的队伍。1994年，罗贝尔·于受命于危难之中，代替马歇出任法共新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法共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革新，主要包括：一是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在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自80年代以来由于“为金钱而金钱的逻辑”而变得更加暴力和不人道的系列做法，提出应该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的主张，宣称这种共产主义是与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二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上进行变革，着手建立“新型共产党”，即放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放弃在许多地方已经形同虚设的基层组织，强调党内的民主原则和开放原则，以表现共产党人的多样性。三是在政治实践上对党的联盟政策进行变革。内容为改变过去僵化而不妥协的左翼联盟战略，认为新的左翼联盟是具有建设性的，强调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社会党协调一致。

伴随着思想上的革新，法共在政治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选举中得票率有所回升，1997年立法选举得票率达到9.8%，在1997—2002年的社会党政府中有4位共产党人进入了政府。但是法共的党员人数一直没有增多，到90年代末只有14万多人，昔日的百万群众性大党的风采已经不再。2002年大选中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法共都遭到惨败：首先是罗贝尔·于在总统选举中只获得了令人难堪的3.4%的得票，然后是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共的选票率也只有区区的3.9%，这是战后法共选举史上最为惨淡的一年。现在的法共正在总结近几年的经验教训，2003年法共三十二大通过了题为《共同谱写共产主义新篇章》的大会文件，它

表明了法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决心和信心。

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演变

与前面政党研究相同，我们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考察，依然在前冷战、冷战和后冷战三个阶段内进行。

（一）前冷战时期

这一时期，意大利共产党在与反动力量的艰苦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1921年意共成立后，成为党的领导人的反议会政治派的波尔迪加，坚持极端主义的以小集团的“攻势”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使意共无法展开斗争和工作。1923年，波尔迪加遭到法西斯的逮捕，葛兰西接替领导人职务。从1923年到1926年这段时间里，葛兰西带领意共积极贯彻了共产国际五大关于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的路线，与社会党的“第三国际派”实现了合并。葛兰西深刻分析了意大利社会的阶级矛盾，指出共产党率领的无产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同时他提出共产国际的指导必须与意大利国内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意见。1926年葛兰西被捕入狱和意共被宣布非法后，陶里亚蒂开始成为意共公认的领袖。1926—1941年，由于受到苏共党内斗争的波及和对于共产国际的盲从而对本已脆弱不堪的党进行了多次清洗，意共面临着“在组织软弱和组织混乱的严重情况下，走向第二次大战的严重考验”。^①直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意共情况才有所好转。二战中，意共坚持在群众中建立分散形式的党支部和反法西斯工会小组，发展忠诚和同

^①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情于党的各种群众性组织，保持与包括社会党在内的一切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政党和团体进行合作，建立反法西斯武装力量。

二战末期，针对意大利是否保留君主制，英美盟军与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共认为，当时的首要问题是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全国，建立一个合法的本国政府以从同盟国军事政府统治下解脱出来，因此应该把争论的问题放在战后解决。由此，意共郑重声明，将支持并参加巴多里奥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这就是著名的“萨莱诺策略”。为适应这一策略的转变，陶里亚蒂不仅在组织上对意共进行改造，宣称共产党应该是全民的党，而且他还表示意大利可以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不是武装起义和暴力手段，而是利用和平方式，使劳动人民在民主基础上展开斗争，逐步走近社会主义社会。根据“萨莱诺策略”，战后意共向联军交出了武器装备，解散了武装力量和人民政权，并在1944年之后的3年时间里，以民主政党的身份参加了七届联合政府。1946年的制宪会议上，意共成为次于天民党和社会党之后的第三大党，与社会党一起就实现共和体制进行不遗余力的斗争，如与教会进行妥协的让步，最终促成了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并制定了一部完备的宪法。

（二）冷战时期

在冷战时期，意共作为占据议会两大党之一地位的永远的反对党，始终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同时在寻求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意大利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它一步步走向了与社会党一样的改良道路。

1947年，由于冷战爆发，意大利共产党被赶出政府，但它一直坚持实施“萨莱诺策略”。这一策略带给意大利共产党的最大收益

就是,逐渐让越来越多的意大利民众确认意共对民主进程的支持是可信的,从而使该党的力量得到大大发展:从1944年50万党员到1947年的188.9万多人,到1954年的214万人,还有43万多个青年联盟成员。

萨莱诺政策鲜明地表现出意共走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但是在1947—1956年间,由于冷战的紧张局势和意大利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等复杂因素,意共“不再谈论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了”,^①而是采取为苏共和其他执政的共产党进行辩护和“同社会主义世界完全站在一起的做法”。^②但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意共八大确立了以“结构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意大利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路线。此后意共的九大、十大和十一大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结构改革”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共都是以实行结构改革的具体建议作为它参加选举和解决国家问题的基本精神。“结构改革”论倡导在新的联盟和新的合作中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它实际放弃了必须同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形成革命动力的说法,而赞同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共同形成革命动力的思想。伴随着结构改革政策的实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时间里,意大利共产党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政治影响不断增强——不仅长期保持议会两大党之一的地位,而且议席不断扩大,从22.73%发展到34.4%,在地方政

① [意]瓦利著:《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② [意]那波利塔诺、[英]霍布斯鲍姆著:《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权的力量也获得了增强。这一时期的意共鲜明地提出了“多中心”的思想，即反对国际共运中一个指导中心和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反对领导国家和领导党的继续存在，坚持党际之间最恰当的方式是独立自主的双边关系，而不必任何事情都要与苏联立场保持一致。在关于波匈事件、中苏论战等问题上以及在世界共产党会议上，意共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20世纪70年代初，为提高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能力，增强在争取劳动者福利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是深化对智利政变^①经验教训的认识，意共领导人贝林格提出了“历史性妥协”战略，指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同中等阶层结成社会联盟，同中间派政党天民党结成政治联盟，以孤立反动派。根据这一战略，意共改变了以往反对天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是以弃权、参加议会多数派等形式支持天民党政府。在这种战略指导下，意共在1976年立法选举中获34.4%的选票，创历史最高记录，大选的胜利使意共的态度对天民党组阁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度使意共认为自己已经站在权力的门槛之上，加入政府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意共进入政府的这一愿望在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下始终未能成为现实。1979年初，意共重新成为反对党。在随后的选举中，意共也表现得不尽人意。此外，70年代还是意共与法共、西共等联合把“欧洲共产主义”发展为成熟的国际政治力量的重要时期。1979年意共十五大正式把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甚至概念明确地载入党的决议和党纲党章之中——这表

^① 1973年，智利人民公选出左派领导人阿连德为总统。但不久，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官发动血腥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建立了军人独裁政府。这次政变有3000多人被屠杀，大部分为左派人士。美英等西方国家随即承认了皮诺切特政府的合法性。

明了意共坚持远离苏联模式，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意共放弃“历史性妥协”的战略，改提“民主替代”，从而主张同社会党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包括天民党内的这些力量）联合组阁，取代以天民党为中心的政权体系。为此，意共开展了新的行动：一方面，在国内努力确立与社会党等左翼和民主政党间的政治联盟，以及与各种非党派的左翼和民主力量与运动间的社会联盟，并全面系统地提出有关改革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措施建议；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努力寻求与西欧社会党进行接触和对话，寻求彼此的共同点，进而解决共同面对的欧洲问题。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整个20世纪80年代意共都处于持续衰退中，到1987年6月的立法选举中，意共得票率仅为26.6%，不仅是连续第8年下降，而且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这种衰退还表现在党员人数的递减和外围组织的独立上。

1988年奥凯托当选总书记，意共进入了改弦易辙的最后阶段。1989年3月，意共在十八大上提出了两个阵营、两种制度相对抗的观念已经过时，世界已进入相互依存的新时代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不应理解为一种制度，而是通过不断扩大经济、政治民主向着更公正的方向迈进的一个进程，并宣布与第二国际各社会党之间已不再有什么旧的不可弥补的裂痕。关于国内路线，意共强调联合一切左翼进步力量，以求打破以天民党为核心的权力体系，进而作为强有力的反对派对国家政治体制、选举法进行改革。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意共中央召开全会，以67.2%的多数通过了奥凯托提出的“开始组建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的筹备阶段”的提议。1990年3月，意共十九大经过激烈辩论，正式通过上述提议，开始了新党的

筹建进程。1991年1月底，意共召开了二十大，以多数票通过了改变意共原有名称和标志的决定，宣布了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成立，同时大会还正式表示了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愿望。以科苏塔为首的反对易名的少数派，则另建新党“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后改名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至此，几乎是在苏东剧变发生的同时，西欧曾经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也改名易帜了。

（三）后冷战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们考察的是承继了意共政治衣钵的意大利重建共。从左翼民主党分裂出来后，意重建共的组织不断壮大，先后有托派第四国际和原“无产阶级民主党”等政治组织成员的加入。意重建共坚持了共产党的称号和社会主义方向，主张“新共产主义”，强调把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奋斗目标。同时，重建共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对自身进行了一些革新。十几年来，意重建共经历了政局动荡的种种考验，不仅早已胜利完成了“为生存而战”的最初奋斗目标，而且其政治地位也日渐巩固，政治影响日渐扩大。1994年立法选举中获得6.0%的得票率，1996年大选中则提高到8.6%，意重建共已成为意国内第五大政治力量，而且是中左联盟取得众议院多数需要倚仗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意重建共在青年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据有关民意调查表明，在意大利18至25岁的青年人当中，重建共已成为最有影响的政党之一，在该年龄段选民中其得票率超过20%。^①但是意重建共的发展道路依然存在曲折起伏。1998年，由于对待执政的中左联盟

^① 孙丽慧：《参政而不议政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当代世界》，1997年第9期，第25页。

的态度分歧过大，以科苏塔为首的支持政府的一部分力量成员从重建共分裂出去，于同年11月另行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并参加了第二届中左政府，这使重建共的力量大为削弱。

通过对法共和意共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两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有很大的相似性：基于同样的国际形势，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产生；自产生到二战，都处于在艰难生存环境中锲而不舍地斗争与发展时期；战争结束后，都由于战争中的英勇抗敌得到选民的拥戴，拥有极大的力量与影响；冷战时期，执政参政的步伐都受到阻碍，但它们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与影响依然长期存在；两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共同推动了“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出台；进入80年代以来，又几乎同时陷入持续衰退的困境；虽然在80年代后半期和随之而来的苏东剧变面前，二者的政治命运不同，但是就90年代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的力量影响和纲领政策来说，法共与接替意共的意重建共却是惊人的相似。

第三节 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

通过前文的回顾可以看出，自成立以来，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保持着左翼政党的一些相似之点和共通之处，但是也拥有着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不同支派的各自特色，特别是战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这正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要研究的重点内容。为了对后面的比较分析奠定一个历史纵向的对比性背景，这里对战前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主要相同点

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的渊源是西欧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社会党）领导的历史时期。然而到20世纪初期，由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等基本重大问题的根本分歧，社会党内部正式决裂成为两个根本不同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此，社会党继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传统，深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共产党则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新阶段。基于这种渊源，两类政党在政治光谱上是紧连在一起的。自产生之后在理论政策和政治实践中，二者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关于指导思想

战前法、意社会党和共产党共同尊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党从未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甚至指责共产党遵循列宁主义的做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的信徒”，^①而共产党则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明确地接受它的指导。事实上，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社会党和共产党共同受到西欧多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的影响。如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是社会党公开承认的参考书，这些不同的思潮流派对共产党也有明显的作用。在与共产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中，以

^① [法]克洛德·维拉尔著：《法国社会主义简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及在对待社会党的关系中，共产党内部曾经出现的各种分歧与派别纷争就证实了这些影响的客观存在。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党的奋斗目标

战前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继承了马克思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二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特点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派生出其他种种矛盾，如阶级的对抗，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的危机等等，这些矛盾的加剧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消除这种破坏社会和谐的矛盾冲突。总之，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的奋斗目标。

同时社会党与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内涵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包括崇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科技的进步、社会工业化的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社会化（国有化），用社会的再分配方式消除社会不平等、消除阶级等内容。由此，战前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短期目标都包含了遏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扩大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的成分，以及建立改善工人阶级工作、生活条件的各种保障制度，或者说建立“福利国家”等内容。1936年，由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参加的“人民阵线”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包括提高工人工资，实行税制改革，实行部分工业国有化这样两类政党都赞同的内容。这次政治实践充分表明了两类政党在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和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一致性。

（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战前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坚持以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对资本

主义的制度更替，并对这种革命的暴力性质作了必要的“心理预期”。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十月革命那样的武装起义方式实现的，社会党也称“两个社会天地之间将永远有一条鸿沟，跨越这条鸿沟将永远是某种冒险”，^①这种冒险就是“革命”。两类政党共同认为：工人阶级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领导生产资料集体化斗争的唯一主体力量。而由于受生活条件所限，工人阶级本身的知识水平不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必须由“外面的”知识分子或革命家带来，通过这样的途径，工人最终自行组织起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另外，战前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有一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重视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两大左翼政党积极加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组织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四）关于党的建设

战前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是为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而建立的群众性政党，与右翼政党以选举为主要目的的选举党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党与共产党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都有正式的规定，党章对政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的决策程序，特别是党内干部的选举和党纲的制订都有详细的说明。因此，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党员一般都有很高的忠实度和稳定性，参加较为固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党的纪律性严明，各级党机构可以有效地执行上级意志。党的这种集中性特征还表现在党与它控制的群众组织中，如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强调加强与工会的关系。两类政党都能够掌握具有一定实力的工会组织，党的许多活动是与工会的活动分不开的，党

^① [法] 克洛德·维拉尔著：《法国社会主义简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的领导层中往往也都有工会组织的领导人。

二、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主要不同点

战前法、意共产党产生的目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经历，使其从产生时起就和社会党有着明显的差异。法、意共产党自从在苏共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后，就经历了一次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这种布尔什维克化，是以共产国际多次会议的决议和直接派遣工作人员到法、意共产党内部指导监督的方式，通过对党内进行多次清洗的运动而完成的。经过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法、意共产党，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观点，而且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和建党思想、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榜样作用，以及苏共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这样的共产党与坚持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传统的社会党也就有了根本的区别。

（一）关于指导思想

战前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最大区别是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实践中由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更侧重于把列宁主义当做行动的准则。如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在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并曾经长期坚持。社会党坚决反对把列宁主义当作指导思想，而是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修正主义思想继承了下来。这一点从两类政党的分裂过程中就能看得十分清楚。

（二）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

战前法、意共产党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镇压

被统治阶级的强大的权力性工具,它是不可能为工人的利益服务的,应该用暴力手段将之打碎以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社会党认为,国家能否起作用取决于它的组织和它的合法性,与民主的作用密切相关。社会党还认为,以普选制、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国家可以实现自己的社会职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因此对待国家的态度应该是进行国家的民主化,不断增加人民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发言权,而不是彻底摧毁国家机器。正如托马斯·迈尔所说:“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本身具有价值,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而永远不取消民主。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用马克思断言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共产党人想建立这种专政来代替民主,直到建立无阶级的社会。”^①

(三) 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

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战前法、意共产党认为议会民主只能是资本家专政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不是对人民群众的真正民主,因此它们长期把议会斗争当做是机会主义、议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大加抨击。虽然后来在抗击法西斯的时候承认可以把议会斗争看做暂时实行的策略性手段,但共产党仍然坚持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苏联式的、以革命的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因此,共产党始终把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看做是对资产阶级的屈服而绝对不为之的。

社会党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通过议会合法斗争,

^① [德]托马斯·迈尔著:《论民主社会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争取选民的多数，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内阁，从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其代表性思想是法国社会党的勃鲁姆对“行使权力”和“夺取权力”两个概念的创造。所谓“夺取权力”，是具有革命性质的，完全改造所有制关系的行动，是不否认在经济、社会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以非法革命的，或合法和平的手段实现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完全夺取，但是暴力或武力只是社会党尽量避免和在最后关头使用的手段。而“行使权力”是不具有革命性质的。它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党参加议会活动，并出现获得议会多数或有机会组成一个社会主义内阁的状况时，可以行使某些政治权力。正如勃鲁姆所说：“在夺取权力方面，我不是遵纪守法者，但我坚决声明，在行使权力方面，我倒是遵纪守法者。”^①这种把“行使权力”与“夺取权力”区分开来的做法，其实质内容与勃鲁姆自己反对的改良主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并没有什么两样。20世纪30年代在反法西斯的客观需要下，勃鲁姆又提出“占据权力”的概念，终于进入政府，并当上了总理。共产党虽然在“人民阵线”中支持社会党，却一直没有参加政府。

可以看出，战前的共产党往往让自己的政策和策略更加与纲领和理想相符合，而社会党已经表现出纲领与实践的不一致：一方面在纲领目标 and 政治语言上依然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却走的是温和的改良主义的路线。不只是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在其他诸如国际问题，殖民主义等问题上社会党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因此，当共产党指责社会党是对资产阶级妥协

^① Tony Judt, *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r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9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127.

的机会主义和选票主义时，社会党反过来指责共产党是宗派主义。

（四）关于党的建设

两国共产党产生之后，都依据列宁的建党思想进行了组织更新。列宁的建党思想对法、意共产党的影响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灌输”理论。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且“社会主义学说只能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①然后灌输给工人阶级。二是“革命家组织”理论。列宁认为必须建立一支掌握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负有工人群众领导者职责的职业革命家队伍，以完成把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任务，以及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这就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中、分工细密、步调一致的革命政党，它是由职业革命家和基层党员、“先锋队”与外围群众组织相结合的广泛的组织之网。三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列宁认为革命政党的中央机关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他们负有执掌运动航向、制定行动纲领和策略的责任，下面的层层组织网络则有效地执行他们制定的路线。因此，必须使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行党的组织，来保证全部权力集中于中央机关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至于社会党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②

以列宁建党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也就与社会党有了截然的不同：第一，在具有与社会党一样的群众性政党特征以外，共产党增强了“精英党”的色彩，其内部的活动分子比社会党更趋向于职业

^① [苏]列宁著：《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② 同上，第90页。

化，专门化。第二，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者、宣传者和鼓动者，共产党比社会党更多了一份责任和权力，因为它把自己定位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者的身份上。第三，共产党内部纪律性更加严明，崇尚集中，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反对党内有派系存在——这与社会党尊重党内派别，以比例代表制来分配党内权力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综上所述，战前的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一方面因为二者有着同样的历史渊源存在大量相同点，但另一方面，种种不同证明了社会党与经过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已经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注意的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里，生存、发展和对法西斯等反对势力的抵抗成为社会党和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虽然在具体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两类政党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提出应对各种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如意共领导人葛兰西在狱中提出的“阵地战”等思想，但二者都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意识形态的成熟思考。因此直到二战结束，二者的意识形态上的异同仍然与分裂之初相差无几。

二战结束初期，根据国际国内的和平呼声和建设祖国的具体形势，加上政治左倾现象使共产党和社会党通过左翼联合实现议会多数成为可能，法、意共产党提出了“人民民主”策略。这一策略内容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领导集团，维持左翼势力的团结，争取与社会党的合并，以孤立少数的垄断性资本。二是在经济上，采取国有化政策，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成分。三是在社会基础上，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为此，避免工人激进主义，要求工会不要轻易进行罢工，任意要求提高工资。这一时期有一句名言是“懒骨头绝对不是好的共产党员，也

不是好的革命分子。”^①四是在外交上，倾向于反对帝国主义和亲近苏联。可以看出，法、意共产党传达出苏联模式并不是唯一，各国应有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而这些走选举和议会道路，放弃暴力革命为唯一方式的思想也就使得与社会党有了更多的相同点。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1947年冷战爆发，迫使法、意共产党左转——选择苏联模式。自此，社会党与共产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两大左翼政党的异同再度凸显。

^① 多列士在1944年对瓦泽地区的矿工所说，他指出生产更多的煤是工人的阶级责任。参见Donaki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New York: I·B·Tauris Publishers, 1996, p.103.

第二章

改良与革命不同阵营中的双双“右” 倾: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意识形态比较

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对周围世界以及政党本身的认知体系，是政党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思想理论依据，主要包括政党奋斗目标、阶级性质和指导思想三个方面。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随政党政治境遇的变迁不断得以调整和修正。虽然从历史的维度审视，这种变化是依次渐进的，但从比较的维度看，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意识形态却表现为一些相对稳定成熟的观念和理论。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奋斗目标比较

政党的奋斗目标是政党通过自身的活动去争取达到的某种理想状态，它代表政党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一定意义上，奋斗目标是政党的灵魂，是政党的立党之本，尤其对社会党与共产党这种作为现时社会制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左翼政党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党的奋斗目标是社会党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内容。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奋斗目标比较

因为冷战结束前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变化巨大，所以对二者奋斗目标的比较研究则从冷战和后冷战两个阶段分别进行。

（一）冷战时期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党一直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但在对这一奋斗目标的理解上却存在着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伦理社会主义渐次转变的倾向。1946年，法国社会党党章的第一条明文规定，其目标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一个集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社会”。^①1969年，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声明则指出：“使人民从所遭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男人、女人、儿童在平等博爱的社会里行使各种权利，并在尊重对集体的义务基础上，充分发挥天赋才能。”^②20世纪70、80年代的密特朗时期，法国社会党在“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重申社会主义“是在一种其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道德和伦理之上，是在尊重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之上建立起来的”，其使命是“组织社会以解放个人，此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使命”。^③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法国社会党在1990年明确提出“通过改良主义实现革命的愿望”，同时指出，“社会党将通过民主途径推出一个符合人的基本要求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

①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4页。

② 同上，第185页。

③ 侯玉兰著：《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要求是几个世纪来争取进步的斗争所确定的，也是各国人民所表达的：自由、平等、男人和女人的尊严、福利和团结互助。——这个目标也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①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党在奋斗目标上一方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把对社会主义的解释逐渐从革命色彩较浓的制度性替代的内容转变为单纯的、抽象的，如“民主”、“自由”和“平等”等基本价值观念。可以说，当在1990年党纲中明确出现“改良主义”的字样时，西欧社会党中一度最鲜明地体现激进色彩的法国社会党，已经在奋斗目标上基本完成了由原有的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二元性”向伦理社会主义“一元性”过渡的任务。

在奋斗目标问题上，冷战时期的法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明确宣称要以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它与从未有过共产主义信仰的法国社会党最大的不同。1979年，法共的二十三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法共的基本奋斗目标是使“处于深刻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适合法国特点和当代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将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并将开拓通向按需分配、国家对人们的任何约束均将消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②在1984年二十四大上法共又一次明确表示：“必须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建立独特的社会主义”。^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法共对社会主义含义的理解有了

①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0页。

② John Gaffney, *The French Left and the Fifth Republic, The Discourses of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p.47.

③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明显的变化。在传统上，法共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往往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但自从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兴起后，法共对社会主义的解释越来越集中于民主、自由、公正等伦理道德的诉求。如1968年12月，法共中央发表的《香比尼宣言》就明确宣布法共的近期奋斗目标是“先进的民主”。1973年，法共会议文件《民主的挑战》提出了“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把其定义为“民主的社会主义”。1984年，法共二十四大进一步阐述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即指民主、自治、人道、自由的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是“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头号要求”，是法国共产党最坚定不移的信仰。^①至此，法共在坚持制度性替代的奋斗目标的同时，已经公开地强调了对民主、公正等基本价值观的重视。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奋斗目标上已经默许了某些伦理社会主义色彩。

可以说，冷战时期法国共产党在奋斗目标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制度性和伦理性的二元并存，而这与尚未完成奋斗目标一元化任务的社会党有很大的相同或相似性。换句话说，冷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是对奋斗目标的表述还是对内涵的限定，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二者对与奋斗目标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的理论问题的阐述上：其一，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冷战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和80年代之前的社会党在原则上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的社会，是制造不平等、不民主的根源，因此对资本主义上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决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裂。共产党坚持认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才导致了法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只有建设另一种社会，才能摆脱恶性循环”。^①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党在1981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争取社会主义，实现变革》的决议中指出，法国社会党所确立的“改革是一个同现行秩序决裂的过程，而不是某种简单的调整”。^②其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内涵。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承认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是与自由与平等不可分的。在政治上，二者都承认以普选制、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二者都承认保有资本主义私有制，重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体制；在社会上，二者都承认实现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公民权利，通过社会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剥削的消失和公民的平等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关于实现奋斗目标的方式。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宣布走和平的、民主的、渐进的、议会的、左翼联合的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党的奋斗目标上出现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不免令人产生两党是否还具有“原则性不同”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两党有关奋斗目标的原则性立场：是否能够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问题。这一时期法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而法国社会党却不能也不愿做到这点。从两党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态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法国共产党转变

^①《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②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

了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观念，但仍坚持认为在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有机体内的私有制，“当然是指日用消费资料私人所有制，以及农民的、手工业的、商业的、工业的小规模个人与家庭所有制”，^①大资产阶级所有制决不包括其中。法国社会党在1981年执政之初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则宣称，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党及其政府，与掌握经济权力的“银行和工业垄断资本主义”之间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将寻求一种妥协的局面，来实现一种“平静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原则是“宁要妥协而不要战争”，甚至在推行国有化时要“说服一些企业主”，使他们认识到国有化、尤其是信贷机构的国有化将“有助于他们本身问题的解决”。^②这样温和的措辞充分表明，法国社会党从没有真正考虑在实践上削弱或限制，更不用说彻底废除大资本主义私有制了。也因为如此，法国社会党空喊的“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口号与其执政的具体政策越来越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到了1990年法国社会党雷恩代表大会上，社会党终于重新修订了党纲，正式放弃了“与资本主义决裂”的主张。

总而言之，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在奋斗目标上表现出具有一定的制度性和伦理性二元并存的特征。但是就本质而言，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是偏向伦理社会主义的改良特性的——最终它在1990年纲领上的表白将自己仅有的革命色彩也淡化了，而冷战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则一直是革命的制度社会主义目标的坚定拥护者。

（二）后冷战时期

^①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② 同上，第384—392页。

冷战结束后,法国社会党虽然仍然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但在若斯潘的“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中,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纯粹的、伦理性的目标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党已经公开、彻底地摒弃了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如若斯潘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教条体系”,而是千百万男人和女人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远景设想”。他明确地宣称:“不能再把社会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我不知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知道作为价值总和、作为社会运动、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它要坚定不移地参照那些既是民主的,又是社会的价值。”同时,若斯潘还认为,尽管资本主义自身“并不知道走向何处”,但是“由于它的灵活性,它的可塑性”,资本主义“确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力量”,“对我来说,选择是清楚的:要适应现实,但是不屈服于一个所谓自然的资本主义模式。”^①到2003年七十三大的时候,法国社会党更是明确提出,其行动方向应“突出自己所提倡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设想,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②至此,社会党在奋斗目标上已经公开承认,其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良,以达到某些基本价值的实现。

冷战结束后的初期,法国共产党顶住了欧洲范围内的共产党改名易帜的潮流,坚持自己的名称和宗旨不变。1994年,法共二十八次开始了新时期的理论革新阶段。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重申,法共

① 殷叙彝:《法国社会党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第58、56页。

② 黎原:《法国社会党第七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简介》,《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21页。

的奋斗目标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前景”，“建立民主的、自治管理的、使全体社会成员均能全面参与决策的社会主义”。1996年，法共二十九大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宣布放弃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传统提法，改称建设新的共产主义。法共认为，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本来就是一种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解放出来并且实行人类发展逻辑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因此应摒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种僵硬的阶段论，直接追求共产主义社会。它声称这种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男女自由平等、相互联合、尊重个人能力和个人发展的社会；一个人类共同担负责任，共享资源、知识、信息和权力的社会；一个既没有失业、压迫、动荡和不公正，也没有暴力和武器的社会与世界”。^①2003年法共三十二大对共产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共产主义一词既是一种目的，即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现实的运动，即消灭剥削、统治和人的异化，进而解放资本主义社会”。^②此时，法共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的解释是与其当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分不开的。法国共产党认为，进入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倒退和不平等的加剧，资本主义制度已处于更大的危机之中；为了坚决反对这种“资本主义金钱逻辑”，必须实行“超越资本主义”战略。法共主张，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崭新的革命观念”，它既不是“适应”资本主义，也不是依靠法令“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不断地对资本主

^①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548页。

^② 陈露摘译：《法国共产党三十二大对若干理论问题的阐述》，《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16页。

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领域“变革”，并使这种变革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①

总之，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有所保留的“貌合”——语言表述上的相近，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奋斗目标上出现了更多的“神离”——根本性的分歧。为了与后冷战时期社会党改良社会主义目标区别开来，法国共产党刻意坚持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的革命性奋斗目标，强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这就更加促使两类政党在奋斗目标问题上出现大相径庭的迹象。应该承认的事实是，后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对目标内涵的理解上，都更加重视道德和伦理价值观的诉求。从这个层面上说，后冷战时期法国共产党在坚持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二元性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向伦理性方面靠拢的趋势。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奋斗目标比较

战后的意大利共产党与其他西欧共产党相比，十分独特。在战后数十年里，意大利共产党一直沿着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不断提出各种战略目标，表现得异常灵活多变。正因为如此，它才在苏东剧变之后很快改名易帜，公开跳出共产主义阵营，而加入到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队伍之中。既然如此，是否这就是说战后意大利共产党与社会党在奋斗目标上有了趋同而失去了比较的价值呢？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欠妥的。因为意共的转变虽然使它“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党”，但是它在

^① 费新录：《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谈“超越马克思”与“超越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9期，第4页。

改名为左民党之前，“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某种尚未定性的政党”，^①仍然归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这样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意大利始终存在改良与革命两大社会主义传统。这是对二者进行比较的依据所在。

（一）冷战时期

冷战期间，意大利社会党在奋斗目标上变化很大。战后初期，它坚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性质，坚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更替。到1976年，克拉克西上台改造后的社会党明确声称：共产主义是“现代最高形式的专制主义”，意大利社会党要实现的目标是“改良的、自由的社会主义”^②——这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多元化”，“允许私人所有制存在”、“保证并鼓励私营中小企业发展”，“既肯定个人的价值，也维护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③

在具体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上，克拉克西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实行务实渐进的原则，否定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他说：“我们接受渐进主义是因为我们认为社会不是一架可以随意拆卸的机器，而是一个由连续性原则所支配的复杂的有机体。”“改良主义的行动应当是坚强的、逐步的、民主的和多元化的。从改良主义行动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中可以产生变化和变革。”显然，社会

^① Amherst, *Italian Socialism, between Politics and History*, Ma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6, p.158.

^② Spencer M. Di Solar, *Renewing Italian Socialism, Nenni to Crax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87.

^③ 克拉克西在党四十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争取一个正义的社会，争取一个起治理作用的民主》（1984年），高放、张泽森、曹德成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党的这种社会主义目标与其他社会党的伦理社会主义目标并无什么区别，它是建构在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各种基本社会民主价值基础之上的。社会党不再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作为自己的理想，它已经完成了从制度性社会主义向伦理社会主义的转变，并认识到自身实现奋斗目标的方式只能在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框架内进行。

意共则把建设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选择上，意共在战后初期就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主张以遵守现行国家宪政制度的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意共自觉承担起“保卫和发展民主方面的义务”，认为保卫民主、自由和共和是“党几十年工作的实质性内容”。^①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意共正式确立了走以结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采取一条同其他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种道路比较是新的道路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以在民主方针的基础上结成新联盟和新合作的形式，来实现工人阶级的必要领导”^②的基本路线。

之所以在谈到意共奋斗目标时，首先谈意共实现目标的方式，最重要的原因是意共在战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探索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而在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其基本内涵上，与传统的观念相比有并没多少创新意义上的突破。特别在关于社会主

① [意]那波利塔诺、[英]霍布斯鲍姆著：《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② 《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页。

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的必然性，关于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肯定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等问题上，意共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意共对其奋斗目标本身的理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意大利共产党突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正如意共在十五大决议中所承认，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战略和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观点近年来在国家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日益受到重视。^①这次大会还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不需要把生产资料全部国有化，主张除了国营部门和合作社外，私人的积极性要得到发挥。1986年，意共十七大指出把《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点作为意共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价值，强调当时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案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再也不可设想以国际大冲突促成或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②1989年，意共十八大又主张“不应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历史规律”，^③认为社会主义是从客观需要和实际矛盾中产生的，它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来转变现代社会运动的政治思想方向。

可以看出，冷战时期意共对社会主义的解释越来越倾向于伦理社会主义，显现出向社会党的方向靠拢的倾向。冷战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意共在奋斗目标上始终有着制度性替代的特性。一直到冷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节录](1979年)，高放、张泽森、曹德成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页。

② 帅能应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7页。

③ 《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战将近结束时，意共在十八大上宣布“不应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时，它才完成了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伦理社会主义的转变。但是即使这样，意共始终没有放弃共产党的称号，或者说公开抛弃共产主义信仰。它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仍然会使用一些比意大利社会党更为激进的话语。如意共在1985年的十七大上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特点来看，这个制度是不能同文明彻底地等同起来的，因为等待我们的将不会是文明，而只会是野蛮。”^①而同期的意大利社会党则显得十分温和：“社会上存在着多种的危机，混杂的发展，普遍的不平等，以及迅速变革和飞快变化的迫切要求。改良主义应善于对急剧提出新要求的社会给予新的、具体而又有远见的、既能解决问题又符合进步和正义的社会价值的答复。”^②可以说，在奋斗目标上一直保持某种革命性的意共，在冷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却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党化的色彩。

（二）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经过了短暂的过渡期，意大利左民党和重建共分别扛起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旗，承继了原来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大利政治光谱中的位置。

左民党成立初期，两任领导人奥凯托和达莱马先后提出了“新社会主义”和“民主即社会主义”的思想，以明确从意共转化而来的左民党的奋斗目标。被称为“转折之父”的奥凯托指出：“社会主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建议[节录]》（1985年），高放、张泽森、曹德成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② 克拉克西在党四十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争取一个正义的社会，争取一个起治理作用的民主》（1984年），高放、张泽森、曹德成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页。

义思想现在已不再体现为人类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所应进入的下一一种社会制度”。^①他指出，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效的进程”，社会主义只能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所以，应该把社会主义视为“不断扩大民主、扩大公民权利、实现彻底民主化的永久性运动，以便使人从统治状态下解放出来。”1994年出任总书记的达莱马则在奥凯托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民主即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已经不是“从一种特定制度向另一种特定制度的过渡”，而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使人从目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压迫和统治中解放出来，因此，民主不再是手段，民主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是不断扩大民主、扩大公民权利、实现彻底民主化的永久性运动。^②总之，意大利左民党已经不仅从实质上，而且从语言上完全抛弃了制度性替代的奋斗目标，成为彻头彻尾的改良社会主义政党。

冷战结束后，意大利重建共坚持把对现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奋斗目标。重建共认为，苏联和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仅仅是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一种具体模式的失败，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进程仍在展开之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未死亡，共产主义的前景依然有效”。^③重建共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内在推动力，资本私有制成为对自由的阻碍，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剥削

^①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页。

^② 同上，第645—647页。

^③ 邹建军、黄华光：《意大利“争取重建共产主义”运动》，《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2期，第35页。

中拯救出来，才能保障人类的自由。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使马克思预言的以阶级斗争形式摧毁新帝国主义体系、超越资本主义变得可行。因此，重建共声明自己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一支对抗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它愿意继承所有反资本主义的传统，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在新阶段把超越资本主义作为建立民主社会的条件，用社会主义方式变革和改造社会和国家，最终消除资本主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意重建共依然坚守着对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性目标，坚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但这些制度性批判与道德的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诠释十分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如意重建共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自由的桎梏，强调坚持同一切阻碍人类个性自由发展的事物作斗争，以实现“新共产主义”。在1999年四大上，意重建共更是通过新党章来强调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友爱”等价值观。

冷战结束后，刚刚成立的左民党和重建共都处于急于明确自己身份定位，以确定自身存在价值的关键时期。二者不仅都急于撇清与政见不同的“母党”的纠葛，也都急于划清与其他左翼政党之间的界线。因此，在建党的首要问题——奋斗目标上，两类政党的政治取向十分鲜明。左民党完全投入主张改良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的阵营之中，而重建共则基本保留了传统共产党的制度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当然它也包含了一定的伦理社会主义的色彩。就这一点来说，意重建共在奋斗目标上具有二元性的特征。显然，意重建共继承了原意共长期坚持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

综上所述，战后长时间里，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有着社会

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奋斗目标，同时两类政党都出现了重视民主、自由、公正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象，即带有浓厚的伦理社会主义色彩。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两类政党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党的制度社会主义色彩在战后呈逐渐淡化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完全消失，伦理社会主义成为其奋斗目标中的唯一特性；而共产党表现出的是，由战后初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一元性向70年代开始出现的制度与伦理社会主义二元性转变。虽然在后冷战时期，由于共产党要重新以共产主义的旗帜确立自己的存在价值，这种趋势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话语淡化的特征，但并没有消失。因此，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出现了关于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二元性与一元性特征“错位”的现象，而这种“错位”并不是逆转，只不过是体现出二者双双右倾的特征罢了。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阶级性质比较

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的政治组织，这就是政党的阶级性。政党的阶级性是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身份特征之一，也是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是从西欧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本质上都属于工人阶级政党，它们往往也旗帜鲜明地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战后法国、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出现了一个较大变化。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阶级性质比较

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两个不同阶段内，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

阶级性质方面的异同有着明显的表现。

(一) 冷战时期

法国社会党在1946年明确地宣布自己“一直是，并继续是一个以工人阶级组织为基础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党”。^①1969年，新社会党在成立的原则声明上宣布自己是“所有那些将社会主义原则变成理想的城乡脑力或体力劳动者”^②的党。这说明战后它已经开始摆脱工人阶级性质，转而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同年密特朗说：“工人阶级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为别人生产剩余价值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的观念已扩大到传统意义的工人(体力劳动者)之外的其他阶层，适用于扩大的工人队伍，即人们称谓的‘新工人阶级’。”^③这一思考成为密特朗后来扩大社会党的阶级基础的理论依据。在20世纪70年代密特朗提出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阶级阵线”战略是重要内容。所谓“阶级阵线”是指“有意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思想和政治统治的人的联盟”。根据这一战略，法国社会党面向的是包括传统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和新中间阶层在内的所有受雇佣的领薪者。但“阶级阵线”战略同时指出：这些受雇佣的劳动者是与资产者相对立的阶级，应该联合起来组成阶级阵线，与资产者进行阶级斗争，以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这种并非由传统工人阶级单独组成，而是由受剥削的被雇佣劳动者共同组成的阶级阵线，是引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这个时期的法国社会党自称是“人民的党”，是代

①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4页。

② 同上，第187页。

③ 林建华：《密特朗“法国式社会主义”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1期，第12页。

代表劳动者或劳工界的利益的党。由此，“代表劳动的法国、受苦的法国的广大力量”^①是法国社会党自此后一直坚持的特性。直到1990年，社会党在原则声明中仍然宣称自己“是立足于劳动世界的党，现代社会不断的和深刻的变动并未消除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对立。因此，社会活动——特别注意工资收入者的利益以及他们的行动能力的发展”。^②

应该指出的是，法国社会党在重视劳动者这样一个整体力量的同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对妇女、青年和外籍工人给予了特别关注。如1981年法国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单独列出的“敏感的领域”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妇女的作用”、“脱离社会的年青一代”和“外籍工人的地位”等内容。决议还指出，应帮助妇女摆脱从属地位的困境，引导青年人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活动，以及给予外籍工人应有的“民主大家庭成员”的地位。^③20世纪80年代之后，法国社会党更加重视这些劳动者阶级内的特殊群体。1990年社会党的原则声明还指出，“社会党人认为妇女已获得的权利和自由是主要的收获——我们的党将实现男女党员之间愈来愈多的平等”。^④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在阶级性质中已经淡化了工人阶级的独特地位，转而以劳动者或人民的党自居。但是，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依然认为社会上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劳动者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是其一直关注的重要内容，同时它还看到

① 《法国国民议会社会党议会党团政治声明（1981年）》，《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374页。

② [法]让·马雷、阿兰·乌普著：《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1页。

③ 同上，第393—395页。

④ 同上，第191页。

了劳动者内部的阶层分化，并且试图通过对其中某些群体的特别关注而强化或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冷战时期，该国共产党关于自身阶级性质表述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法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例如1976年二十二大指出法共是“工人阶级的党”、“城乡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党”，规定法共“在为社会改革的斗争中、在人民运动中”应起“领导作用”。^①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也强调，“一个伟大的共产党”的存在，适应了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应有本阶级的“先进政治组织”的“需要”。^②1990年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法共更加强调自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保护自己、反对大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变革的有力的政治工具”。^③

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法共也逐渐地表明自己能够代表工人阶级以外劳动阶层的利益，表述时往往用“工人阶级和人民”之类的话语来体现。但是，法共始终强调要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1976年法共中央出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书还对工人阶级和总体劳动者的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不管在什么部门从事劳动，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基本上取决于三个事实：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生产商品，不参与收集剩余价值。”同时它还认为：“体力劳动者仍然是一切生产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一定注意“不能把总体劳动者的概念同工人阶级的概念等同起

^① John Gaffney, *The French Left and the Fifth Republic, The Discourses of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P. 38.

^②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附录《法国共产党章程》(1979年通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③ D.S. Bell and David Scott,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Resurgence and Vic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64.

来”，因为后者所包含的除属于工人阶级以外的生产劳动者，还包括职员、管理人员、研究人员等非劳动生产者——这些人并不是“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所以在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战略中，工人阶级和“人民”并没有被放在平等重视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法共在对“工人阶级”的解释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上指出：“从经济角度看，数量日益增长的技术员、职员和部分工程师今天成了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②1986年3月和6月，法共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法国工人阶级的变化和知识分子问题。在会上与会者就指出：知识分子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活动已处于社会活动的中心。随着科技的发展，物质劳动知识化，智力劳动物质化，工人阶级队伍包括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各自的发展变化，必将导致两者的结合。所以过去所提的“让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劳动概念已经过时，而必须实行民众的大联合。^③但是，突出工人阶级的首要地位是法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思想：“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和愿望，是法国社会所有重大问题的核心所在。”^④

冷战时期法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本党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做

① 侯玉兰著：《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② 同上，第37页。

③ 张学斌：《科技革命对西欧共产党寻求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光明日报》，1988年8月1日，第3版。

④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法，与法国社会党有意强化劳动者阶级色彩，让工人阶级融入劳动者总体中的做法显然不同。可以说，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侧重显现劳动者政党的阶级性质；共产党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工人阶级内涵的基础上，突出了鲜明的传统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

（二）后冷战时期

苏东剧变后，法国社会党在党的原则声明中继续声称自己“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劳动世界的党。当代社会持续而深刻的变化没有消除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对立。因此，社会党人特别关注雇佣者的利益并发展雇佣者整体行动的能力。”^①1999年，法国社会党又提出“新阶级联盟”战略，即以中产阶级（有良好工作和良好收入的“多元化”的领薪者）为中坚，包括“平民阶级”（主要指包括产业工人和低级职员）和“被社会排斥者”（因失业、贫困等原因而被排除在正常现代社会生活之外的人）在内的新阶级联盟。此时的社会党认为，随着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从而导致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界线日益模糊，各阶层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追求既交错又融合。新兴的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主体和稳定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为此，近年来，法国社会党明确声明：“法国社会党是一个跨阶级的政党。我们的社会基础既不是清一色的，也不是狭窄的，它是经历过更新和发展的。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在各个阶层之间进行最恰当的仲裁。”^②2003年社会党七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加具有社会代表性的

^① 陈露译：《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声明和章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2期，第30页。

^② 殷叙彝：《法国社会党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第63页。

党。改变妇女、青年、工会会员、外来移民在党的机构内缺乏代表的状况”。^①显然，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在仍然坚持自己的劳动人民代表身份的基础上，看到了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并试图寻找中间阶级、下层人民以及一些特殊的劳动群体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如消除就业不稳定、促进就业、改进教育体制、巩固社会福利等），实现不同阶级阶层的联合。

冷战结束后，法国共产党认为，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的信息革命使法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阶级矛盾更为集中地表现为金融寡头资产阶级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矛盾的一方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另一方则是广大的劳动者阶级。因此，法共主张党的阶级基础应该扩大为一切被金融资产阶级奴役的人，扩大到整个雇佣劳动者，而不应该仍然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同时法共还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革命力量，相反代表各阶层群众利益的社会运动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法共主张：“将社会从资本主义阶级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不要求突出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是要求采取行动，将遭受这一统治的人团结起来，以求实现解放社会的目标。”^②为此，法共提出以被传统工运和共运怀疑的“公民”概念代替“劳动者”、“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概念，宣称它无条件地向一切希望加强人类社会关系的人，包括女权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生态学派及和平主义者等一切社会运动者和公民开放，并强调加入法共无须放弃自己的哲学观点和宗教信仰。随

^① 黎原编写：《法国社会党第七十三次代表大会简介》，《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21页。

^② Kate Hudson, *European Communism since 1989, Towards a New European Left?*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124.

着扩大阶级基础活动的逐步深入，法共甚至放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转而认为自己是一个“为所有那些拒绝被剥夺干预权和选举权的男女服务的政党”，^①是争取人类解放的旗手，是各国人民为自身解放而战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1996年法共在二十九大文件《法国共产党的政策》中指出，必须把“所有在多样性中拒绝资本主义逻辑的人们联合起来”，^②通过广泛的“公民干预”变革社会。在199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共这种试图演变为人民党的想法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欧洲议会选举的法共的竞选者名单上竟然有一半成员是党外人士。

相对于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阶级性质的认识和实践上均有了重要变化，特别是法共已经改变了自身重要的身份标志之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这与法国社会党不再有什么本质差异。当然，二者在政治实践中所争取的社会力量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在已经获得中产阶级的支持的基础上，社会党提出的“新阶级联盟”战略的重心是在努力争取平民阶级和“被社会排斥者”等相对中下层群众的信任，而法共为了改变过去忽视中间阶层的做法，正在以面向所有非垄断资产阶级者的开放性来弥补这一过失。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阶级性质比较

在冷战和后冷战两个阶段内，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在阶级性

① 陈林、侯玉兰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② Kate Hudson, *European Communism since 1989, Towards a New European Left?*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126.

质方面的异同体现得十分鲜明。

(一) 冷战时期

意大利社会党的阶级性质在战后变化甚大，这也是它不同于其他西欧左翼政党的地方之一。战后初期意大利社会党坚持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①于1966年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时制定的《意大利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宪章》规定：党是“劳动者的党”。^②到了1977年克拉克西上台后，社会党“仍主要是雇佣劳动阶级的政党，但正在把代表的范围扩大到独立劳动者阶级，从独立经营的企业主、手工业者、服务业主到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各个阶层”。^③由此可见，此时的意大利社会党已经开始放弃其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转向代表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方向发展。

冷战时期，不同于其他西欧共产党坚持自己明确的工人阶级性质的做法，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就宣布“共产党应该是全民的党”。^④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党章的第二条就明确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均可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46年，陶里亚蒂更是明确号召中产阶级入党。^⑤自此，意大利各个阶级阶层的人都

①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各国社会党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

②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③ 金重远主编：《战后西欧社会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④ [法]热纳维埃夫·比布：《意大利政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⑤ 同1。

可以自由地加入意大利共产党。显然，意共此举就是为了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同时，它却又仍然力图维持工人阶级是革命动力的理论。意共八大提出，实现工人、农民阶级同其他进步的、民主的力量的政治与社会联盟，这种联盟的领导者就是工人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临资本主义危机时，意共再一次表示为了“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干预，必须能够确立起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以便围绕工人阶级建立有各种社会力量参加的集团，一种广泛的联盟体系”。^①而此时，意共所定义的工人阶级的概念内涵比过去更为广泛，即不只包括创造剩余价值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其它阶层的劳动者，这些阶层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客观地位同工人阶级十分接近，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觉悟水平使他们易于同工人阶级发生有效的联系。在1979年十五大上，意共就明确地指出，意共是“工人、劳动者、知识分子和公民”的党，意共要建立和加强同工人阶级、青年、妇女、土地劳动者、城乡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社会进步力量的持久政治关系和组织关系。在1990年十九大上，意共决定开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的组建阶段，并确定新的政治组织要具有如下的基本政治特征：第一，新政治组织是一个改革党、民主的人民党、国际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党、劳动者的党、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左翼党；第二，新政治组织把工人阶级作为基本力量，以各界劳动者为中坚，面向妇女运动、绿色组织、激进党人和天主教界进步人士。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单就党的阶级性质而言，我们并不能看

^① [意] 那波利塔诺、[英] 霍布斯鲍姆著：《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美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出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共在其政治话语中，仍一直把工人阶级放在首要地位，除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改变性质的最后阶段的几年之外，意共的这个立场在冷战期间基本没有改变。这一点是意大利共产党与社会党关于阶级性质方面的主张最大的不同。

（二）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彻底成为具有社会党性质的政党。它继承了原意共将阶级基础定位在全民性的思想，宣布要团结“最广泛的进步力量”建立一个包括社会党、各左翼世俗党、天主教民主力量、绿党、女权运动等一切左翼力量的进步阵营。在政治实践中，左民党基本代表的是中下层人民的利益。1998年左民党与原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一些小的政党组织合并，其领导人达莱马宣称，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吸收或吸引“过去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从达莱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期的左民党希望增强自己在中间阶级的吸引力，它在政治光谱上有进一步中间化的趋向。

意重建共则一直宣布自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组织性质的群众性政党。在1996年三大上重建共明确提出，重建共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它认为：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雇佣劳动者数量的增加，社会下层阶级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但是由于其内部的严重分歧和差异，社会下层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增强。因此，保护这部分人的根本权益、争取劳动者的自主权成为重建共政治斗争的中心任务。重建共抛弃党以革命先锋队自居的态度，向各种运动开放，向各种斗争经验开放，向不同的抗议文化开放，继续使党扎根于工厂和街邻中，扎根于文化活动和社会中，试图借此为

西欧左翼力量探索出一条超越工人运动的无序状态和危机的道路。就是说，意重建共一方面保持其共产党传统的工人阶级性质，另一方面试图把阶级基础扩大到包括更多社会阶层的下层群众，以适应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新形势。

总而言之，后冷战时期意大利两大左翼政党在阶级性质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实践。左民党是以中左社会力量为阶级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居，而重建共则坚持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下层群众为自己的阶级基础。

战后以来，法、意社会党和共产党在阶级性质上既存在着许多相似之点又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社会党一直力图摆脱工人阶级政党性质，逐渐转化为人民党、全民党，但它始终没有超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阶级性质。共产党则采用“雇佣劳动者”、“社会下层群众”等概念淡化传统工人阶级政党的单一性质的做法。从这点看，两类政党都具有一种试图扩大阶级基础，使党的阶级性质具有多元性的趋势，但都没有真正离开劳动者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定位。就扩大阶级基础工作而言，共产党显然比社会党滞后许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党已经利用“雇佣劳动者”的概念吸引传统工人阶级以外的劳动者，即新中间阶级。共产党虽然也重视对这部分人的“吸收”工作，但因坚持强调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扩大阶级基础方面进展缓慢。直到90年代，共产党才放弃工人阶级的特殊地位的思想，使用“雇佣劳动者”、“公民”、“人民”等概念来争取新中间阶级的信任。而此时的社会党或者在已经获得新中间阶级广泛支持的基础上，反过来关心社会下层群众利益，或者已经开始争取更多的如自由主义者群体等中间力量，从而使该党的阶级性质更加富有多元性。

第三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指导思想比较

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开展活动的依据。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之日起，二者的指导思想就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党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之下，主要继承拉萨尔、蒲鲁东、伯恩斯坦等人的修正主义传统，而共产党则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其根本的指导思想。战后，根据各自实际的政治命运与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党与共产党分别对指导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解与诠释。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指导思想比较

就法国社会党来说，它在战后几十年内基本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对法国共产党来说，冷战时期推行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冷战后推行的新共产主义，都表现出它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特别是战后初期，法国社会党是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密特朗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社会主义有两个家族，列宁家族和勃鲁姆家族，我属于莱昂·勃鲁姆的传统。所以我不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协。”^①这句话鲜明地表达出社会党的历史传统及其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但社会党是一直承认马克思主义对本党的影响的。如勃鲁姆在1945年度社会党三十

^① 王捷、杨祖功著：《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七大上说：“我们完整地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我们完整地接受关于价值和剥削的理论。我们接受它们，不作任何一点保留。”20世纪50年代，法国社会党领袖摩勒指出：“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研究人类社会的最好的历史方法。”^①在1971年召开的埃皮纳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重申，承认阶级斗争，承认马克思的分析，主张改造社会，消灭人剥削人，要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立场，但也只是把它作为多元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②如其他的欧洲社会党一样，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思想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主义的理论体系，它把人本主义、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作为理论来源。例如主张设立特别的“国民银行”，以“无息信贷”帮助工人得到自己一份生产资料的蒲鲁东主义，至今仍为法国社会党所景仰。法国社会党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傅立叶和蒲鲁东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就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而被法国社会党奉为精神之父的饶勒斯的思想复杂性，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其以多元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历史传统。饶勒斯本人最初属于中左，然后倒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在法国社会主义统一运动中最后转为改良主义的内阁派的社会主义者。深受饶勒斯主义影响的勃鲁姆、密特朗等人的思想也显示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等思想的混合物，从而说明社会党所接受思想的广泛性与

^① [奥]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著：《国际史》第三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② 王捷、杨祖功著：《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多元性。这正如1981年法国社会党六大上所说的：“社会党内，一直存在着各种思潮，……只要人们需要民主，就要承认各少数派有存在的权利，有转变成多数派的权利，从而有在党内发展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手段。”^①

冷战时期的法国共产党一直是以一元性的马列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由于长期受苏联的影响，它在政治实践中更多地重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一种完善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完美无缺的科学，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同起来。”^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共开始反省自己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被斯大林主义教条化和简单化，因此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法共甚至结论性地宣称：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可以说明一切问题的框框，只需把它套用于现实便可从中得出政治方针。它的预见能力必须建立在与实际事物的运动紧密结合的基础上，以及在理论主张、政治领导、社会运动之间的不断交流中产生。因此，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研究“就要同随着第二国际的建立而出现并经斯大林修改过的狭隘的理解决裂”。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法共“根据认识 and 理论的发展以及社会运动的情况，以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为依据开展活动”。^③这就是法共在1979年二十三大会上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马列主义”的由来。1979年通过的党章上是这样声明的：“以马克思和恩格

^① 法国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争取社会主义，实现变革》（1981年），《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401页。

^② [法]雅·尚巴兹：《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运动》，《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七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③ 同上，第212页。

斯创建并被列宁及工人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依据的”。^①这种提法一直到冷战结束没有再被更改过。在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认识上反省的同时，法共也开始关注法兰西民族历史的革命传统对自己的影响：“1789年革命所宣布的人道主义、世俗和民主的理想，乌托邦和自由主义的口号，工团主义的发展，天主教徒对正义和联合的渴望，都在法国工人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之后，……成立了法国共产党的前身——盖得和饶勒斯领导的社会党。”^②可以看出，冷战时期法共在指导思想の設定上虽然好像是简单的一个从“马列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但其真正的思想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除斯大林主义的影响，降低列宁主义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思考，并且不再将之视为僵化的思想体系，而是随时代和现实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法共试图突破绝对的一元性的指导思想体系，承认法国工人运动自身发展出来的历史思想遗产。

对比这一时期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可以看出，二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但在二者的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却是截然不同的：在社会党那里，马克思主义只是其多元指导思想中的一种，而共产党基本仍奉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性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社会党始终强调的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从未包括列宁主义。共产党则长期把马克思、恩格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附录《法国共产党章程》（1979年通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② 同上，第165—166页。

斯、列宁、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到欧洲共产主义时期才彻底消除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努力降低列宁主义的作用。另外，虽然法国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历史思想遗产的地位并没有被上升到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但在是否应该重视本国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工人运动传统的指导意义的问题上，共产党与社会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二）后冷战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依然是承认它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的有用性，却不赞同它全部的思想。如针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加大社会差距等负面影响，若斯潘主张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他认为，在为了控制和改革资本主义而必须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有用”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分析社会现实、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应当被“重新发现的”。但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论是不赞同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关于存在一种对世界的科学解释的奢望已经消失”。^①

冷战结束后，法国共产党在坚持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十分注意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如将本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有代表性和凝聚力的进步思想和革命传统纳入党的指导思想范畴，探索构筑适应社会发展状况和国民特点的多层次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体系。这种倾向充分表现在罗贝尔·于发表的《共产主义的变革》等著作中，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内容：其一，“重返马克思”，即

^① 殷叙彝：《法国社会党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第64页。

运用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超越马克思。其基本含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使马克思从他在历史上所遭到的曲解中解放出来并得以深化，坚持否定那些马克思受其时代认识的局限性而作出的分析和判断。其二，承认人类解放的思想是多元化的。在此基础上，主张法国历史上有一种来自遥远时代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法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力图制定新的具有特色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并不只是重复来自别国的思想”。^①法共认为“与共产主义珠联璧合的另一个词是‘人道主义’，它也是法国文化和革命遗产的核心”。^②法共还强调，应该根据法国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去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显然，后冷战时期的法共在指导思想方面做了根本的改变——指导思想从一元性特征转变为多元性；进一步脱离列宁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的指导作用进行了非教条化的处理，确立了法国历史思想遗产对党的指导作用。就指导思想而言，后冷战时期的法共力图进一步与苏联模式脱离关系，摆脱思想僵化的形象，转而求助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一点也就与法国社会党有了很大的相似。虽然二者在对待指导思想多元性上已经没有原则性差异，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的具体取舍上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共产党仍强调吸取激进的、革命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思想，而社会党则撷取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观念。

① 费新录编写：《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谈“超越马克思”与“超越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9期，第4页。

② 金润华译：《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录》，《当代世界》，1996年第3期，第24页。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指导思想比较

我们依然从冷战和后冷战两个阶段来对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进行比较分析。

（一）冷战时期

战后初期，意大利社会党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意大利社会党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宝库的一部分，同时指出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它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战争、暴力夺取政权的判断是对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估计过高，是受了当时社会主义极端派的影响。因此，意社会党感慨道：“如果没有民主和自由精神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无产阶级政权也可能蜕化为官僚政治、警察和暴政”。^① 20世纪70年代，克拉克西上台之后，发表《社会主义的准则》和《社会党人的福音书》等文章，开始对社会党指导思想中的列宁主义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假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能与代表西方的，世俗的和自由文明的文化遗产相容”的，并把蒲鲁东主义当成了意大利社会党新路线的鼻祖，倡导“加强和发展社会多元主义和个人的自由的”的民主社会主义。^②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柏林大会上，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文化部部长朱·塔姆布拉诺在其所作的题为《马克思改变了世界，但未来的道路在于改良主义》的演讲中称：“过去西方工人阶级是马

^① 金重远主编：《战后西欧社会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② Spencer M. Di Solar, *Renewing Italian Socialism, Nenni to Crax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88.

克思主义的，今天就不再是了，现在他们成了改良主义者，因为未来的道路在于改良主义，虽然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①但是冷战时期的社会党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在1987年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依然保留着“党集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经验和在四分之三世纪中残酷阶级斗争中的成熟政治经验，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财富”^②的字样。另外，意大利社会党对意共所推崇的葛兰西的思想也是持否定态度。它认为，葛兰西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他的“阵地战”和逐步建立阶级和文化领导权的处方是权力主义者的设计，这与多元论的自由主义概念是不一致的。^③这一时期，社会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彻底的转变，即为与苏联划清界限而彻底抛弃列宁主义和属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转而承认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虽然意共在1979年十五大上才正式取消党章中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但是从1945年五大开始，意共就不再对入党人员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加以限制。正如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所说：“我们从来没有，甚至在党章中也没有学究式地阐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党，也没有阐明我们是马列主义党。”意共只是“一个受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鼓舞的政治组织，但是我们也吸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入党”。^④在1979年十五大上，意

①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② 同上，第131页。

③ Spencer M. Di Scalar, *Renewing Italian Socialism, Nenni to Crax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87.

④ [意]那波利塔诺、[英]霍布斯鲍姆著：《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共认为，容易被当做教条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体现意共的理论和思想宝库中的丰富内容，而应将马恩列与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陶里亚蒂等相提并论。为此，意共取消了党员必需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规定，改为要研究意共和整个工人和革命运动的历史和思想财富。1989年后，意共提出要“超越马克思主义”、“超越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因为马克思主义已不能为当今的复杂社会提出合适的公式。但是意共始终承认马克思和列宁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冷战时期的意共在指导思想上最大的变化是疏远与列宁主义的距离，转而强调意大利本土产生的共产党理论家的指导作用。

总之，冷战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最大的相同点，表现在力图使指导思想不会成为一个僵化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对以往尊奉的马列主义的重新审视。同时，两类政党都注重从过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理论中寻求现实改革的理论根据。共产党寻求的是葛兰西思想，意大利社会党则找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良主义者，如考茨基和蒲鲁东。它们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对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有关的思想意识，意大利社会党否定得更为彻底，而共产党始终不是完全否定，总是在话语中留有一定余地。

（二）后冷战时期

这一时期，左民党在党章中删除了意共原党章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列宁、葛兰西、陶里亚蒂理论的内容，对上述人物的思想只字未提。它宣布党实行“意识形态的非共产主义化”，党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不以任何预先构想的模式为指导的党”。它还强调要在“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建立的专制制度破产”的情况下，超越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把“自由、平等、团结”等作为自己的

根本价值观。^①左民党甚至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哲学观念、宗教信仰的不同将丰富党的思想财富”，多元主义有助于扩大与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可见，左民党已经彻底成为以多元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了与以往的意共划清界限，左民党并不像法国社会党那样公开承认用马克思的某些思想来指导自己，而是采取回避态度。

意重建共则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1996年意重建共三大提出，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模式的批评性分析方法，也因为马克思就“革命”的范畴（即向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的历史性过渡这一思想）达到了其思想总结的最高点，所以，“回归马克思”，追求并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达到政治的最高点。^②这种“回归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原话，而是继续和深化其观点，甚至要超越马克思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而得出的某些结论，并在深化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及其新特点、新矛盾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重新建立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整套思想、理论、方针和战略。1999年意重建共四大修改的党章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友爱”的价值，引进党内政治生活多元化。^③2002年在其五大上提出，“要与盛行于意共领袖中的文化决裂，与陶里亚蒂的精神遗产决裂”，“就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个人权利和民主问题是与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的原因

^① Vassilis Fouskas, *Italy, Europe, the Lef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ian Communism and the European Imperative*,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p.220.

^②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586页。

^③ 邹建军：《方向坚定 策略灵活——意大利重建共的发展之路》，《当代世界》，2001年第9期，第16页。

和动力。我们与斯大林主义的彻底决裂也是今天我们重树共产主义旗帜的必要条件。”它认为人类解放的思想必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因此党应向“各种斗争经验开放，向不同的抗议文化开放”，这种“开放”包括“政治争论和立场观点的透明性”。^①由此看来，意重建共是批判性、选择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是重建共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突破。重建共已经具有了承认政治多元性和思想多元化的倾向，这间接表明它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唯一的、绝对的指导思想。而与原意共中存在的改良主义的思想的决裂，则表明重建共为坚持革命性而在思想多元化上有所取舍。

可以看出，作为完全融入社会党阵营的一个标志，左民党最终不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强调多元主义的作用——这也是意共几十年渐进的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意重建共则坚持了共产党原有的特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绝对的思想去尊奉。在思想上承认多元化是两党共同存在的倾向，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二者最显著的不同。当然，在对其他理论的认可选择上，二者仍然存在着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差异。

总之，战后的法、意共产党在指导思想问题上，远离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辩证地、灵活地、有选择性地对待马克思及其思想，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僵化的思想体系，承认思想的多元性。这些看法与社会党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的特征十分相似。而具体到在

^① 姜辉、于海青编写：《从温和到激进：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开放与革新》，《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0期，第4—5页。

指导思想中如何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定位，以及在多元化思想中如何取舍——到底是优先吸收改良主义的思想还是优先吸收革命性的思想，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所作的回答则是不同的。

小 结

通过初步比较法、意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异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的几点认识：

第一，战后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演变都出现了右倾现象。法、意社会党都属于西欧改良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左翼，在战后保留的革命性特征较为浓厚，如关于制度性替代、工人阶级性质等内容。但是社会党在经过70年代的政党重建后，这些革命性的意识形态特征越来越淡化，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法、意共产党的右倾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出现了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到认同议会民主制，从马列主义到超越马克思和思想多元化，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到代表全体劳动者利益等种种转变。

第二，社会党与共产党右倾程度是不同的。很明显，由于本身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不同，也由于各自政治命运的不同，共产党的右倾变化比社会党更为明显。例如法共虽然仍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但主张不再存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这无形中抹杀了自己数十年奋斗的历史。而法国社会党则坚持近百年的社会主义目标，右倾

的。又如，对比法共彻底摒弃曾经顶礼膜拜的苏联模式，法国社会党却依然对饶勒斯、勃鲁姆等推崇备至。法共从单一地强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分析，转变为重视以不民主、不人道的金钱逻辑等道德诉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法国社会党在数十年一贯坚持公正、平等、民主、人道的价值观的同时，仍然认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所有这些都表明，战后共产党右倾程度要比社会党更深更强。

第三，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双双右倾的意识形态演变过程中，共产党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党化”的特征。共产党在坚持制度性替代的奋斗目标的同时，以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解释，放弃工人阶级的政党性质，放弃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思想，抑或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思想的多元化。这些迹像都表明，共产党或多或少地有着向社会党靠拢的倾向。

第四，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始终没有合二为一，改良和革命两大社会主义传统依然在法、意两国延续。换句话说，社会党坚持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改良，而不是与其决裂。共产党则仍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和社会制度替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种奋斗目标的根本性质的不同，表明了社会党与共产党仍然是改良和革命两种不同性质的左翼政党。

第三章

温和与激进：战后社会 党与共产党政策主张比较

政党政策主张是指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或服从党内政治压力，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观点、态度、立场和策略等。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不同，政策主张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会不断地调整、变化。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和实现政治目的，在每个历史阶段提出了大量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两类政党应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领域重大问题的立场、态度和策略。本章将选取最能体现政党意识形态、政治命运和历史处境的一些基本政策主张进行比较。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主张比较

对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比较，将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是政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任何政党都会有一个由其意识形态决定的基本政治立场，它所有的具体政治举措都是为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政治立场而实施的手段。二是政党的参政策略。这是政党在具体政治实践上为达到执政或参政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主要举措。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主张比较

在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两个不同阶段内,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治主张的异同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①

(一) 冷战时期

在冷战开始后的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基本政治立场和参政策略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为了维护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稳定和促进国家和平民主的发展,社会党坚持了“第三种势力”的立场: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具体参政策略上,社会党设法与人民共和党等其他的“所有忠于法国的共和主义者”共同组成“不可分割的多数派”,而避免与共产党联合,以期获得参政机会。同期的共产党在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认为自己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捍卫民族独立,具体地说,就是反对马歇尔计划,阻止国家法西斯化,推行和平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摆在首要的位置。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法共的政策稍微有些调整,重新提出人民阵线政策,试图与社会党联合,但遭到拒绝。1958—1968年是实行新政治制度的第五共和国的头十年,也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策调整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统一

^① 就政策主张本身而言,它有着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灵活性。随着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在80年代成为主要执政党,它们的政策主张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政策主张方面的变化不完全以冷战结束为界。

但是,研究法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仍以冷战结束为界最为科学,而意大利共产党在冷战结束后的变化也决定了以冷战结束为界,更易说明问题。同时,沿用与前一章对意识形态比较分析相同的历史分期,可以使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比较能够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内进行,以获得它们的共性。所以在此依然使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两个阶段来进行比较研究。

而团结的新社会党成立，摇摆不定的社会党政策主张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下面的比较研究也重点围绕这一时期展开。

这一时期，社会党与共产党都确立了政治民主的基本政治立场。1969年，新社会党在成立的原则声明中就明确提出推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的基本政治立场。^①1979年，共产党二十三通过的党章上也声明要把“政治的民主推进到底”。^②概括地说，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代表劳动者的政权，让公民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获得决策权和参与权，这些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党与共产党对政治民主解释的共同之处。但是，在政治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的理解上，社会党与共产党却存在着不同。共产党坚持认为：“一旦结束资本主义政权后，必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将是一张不可能恢复资本主义政权的单程票。”^③也就是说，共产党认为一旦左翼执政，建立人民政权，就不会容许因为选举失败而出现政权“更迭”现象。另外，在对多党制的理解上，社会党与共产党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共产党所理解或允许的多党制，只是作为合作伙伴的左翼政党之间的“多党制”。而社会党认为“多党制”也包括反社会主义的政党，主张各种政党有着平等的权利，实行各政党间的轮流执政。不过，经过多次谈判，法共在这个问题上最终作出了让步。1972年两类政党签署《共同施政纲领》，“承认政党的作用和多党制”，不过，仍坚持“如果国家拒绝信任多数党，那么该党就应该放

① [法]让·马雷、阿兰·乌普著：《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7页。

②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附录《法国共产党章程》（1979年通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③ David E. Albright (ed.),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p.104.

弃执政，而作为在野党重新进行斗争。”^①至此，社会党与共产党都主张在体制内以合法的方式推动政治民主化，从政策层面上几乎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根本区别。

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方面，社会党与共产党有着温和与激进之别，但共产党比社会党更加注重群众运动的意义。法共认为，除了合法的议会斗争方式之外，还可以存在除内战以外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方式，主要是发动群众运动，扩大民主成份，改变社会和政治力量对比，最终推动议会选举获得稳定多数，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共产党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方式”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劳资谈判，工会组织的罢工和群众示威游行等。同时期的社会党在把议会斗争看作是首要任务的同时，一般不会主动鼓动发起群众运动，而是主张建立一种制度框架来保证政治民主化的实施。这种制度是公民参与制度，包括企业参与制和居民参与制。社会党提倡工人或居民在企业内、在居住区内做自己的主人，多多参与企业或居住区的治理工作，从而体现一种公民全面参与的民主生活，实现“自我管理”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公民参与制度与法共的群众运动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是通过发动人民群众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等。但是，社会党主张的“一切斗争方式都需要在体制内进行”的制度规划方式，比共产党倡导的直接发动群众的方式显得更为温和——这也是冷战时期两类政党在政治主张上的一个明显区别。

这一时期社会党与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参政策略：左翼联盟。二

^①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共同施政纲领》（1972年），《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351页。

者都认识到，只有左翼的联合才能“推翻（右翼）多数派，动员在数量上和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是多数派的群众”。^①但在左翼联盟的具体的领导权问题上，二者的政治立场却是截然对立的。共产党试图凭借自己强大力量谋取联盟的领导权，进而利用左翼联盟削弱社会党，相对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社会党也设想通过联盟把共产党选民策反到自己门下，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左翼联盟，改变共产党长期占据左翼主导地位的局面。在当时与右翼势力争斗不断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明争暗斗”的政治联盟很快出现了危机。20世纪80年代，当已经失去左翼领导权的共产党不愿再同社会党一起承担“出力不讨好”的政治责任时，它就毅然决然地退出联合政府。至此，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左翼联盟策略也就宣告失败。此后一直到罗贝尔·于成为法共领导人这段时间里，共产党始终拒绝与社会党再次联盟。

总之，当冷战时期的法共渐次地承认普选的、多党轮流执政的、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治民主的意义时，在基本政治主张上它与社会党也就没有了原则性的区分，只是在实现的方式上存在温和与激进不同。另外，虽然两类政党在具体的参政策略方面都采取了左翼联盟的形式，但在关于左翼联盟的领导权问题的理解上却有着根本的分歧。

（二）后冷战时期

后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仍然坚持政治民主化的基本政治立场，尤其是把重点放在推进共和国机构运作的民主化方面。社会党认为

^① 殷叙彝主编：《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需要国家来防备今天或者明天将出现的危险，扩大自由，保障安全以及维护政教分离，还主张社会机体特别需要有一个具有管理、仲裁和保护民主价值的中介权力机构来维持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平衡，而共和国正应起这样的作用。为此，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建议实行机构改革，创建一个高效率的国家，国家保证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新的地方分权。另外，社会党还提出制度改革的五个优先标准：一是确认一名公民总统，即把公民利益置于首位的总统；二是加强议会在控制和评估能力上的权力并使它在预算方面获得最主要的建议权；三是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四是深化地方分权；五是赋予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免除对外国人的歧视。^①

后冷战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在继续坚持政治民主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措施。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开展“公民园地”活动，把民主扩大到企业和公共生活、国家机构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全面实现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开创法兰西民主的新纪元。二是对国家机构进行重大改革，结束总统制，扩大议会和政党的作用，在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制等，同时强调，国家政权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不能以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服从国家权力。三是充分发挥代议制民主的作用，并使代议制民主从直接民主中吸取营养，让公民的主导性融进议会，逐渐使人民拥有更多的权力，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提高民主的质量，使公民享有比代议制民主大得多的、新的权利和权力。^②

^① 陈露：《法国社会党纲领性文件》，《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期，第15页。

^② 李周著：《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聂运麟教授指导，2002年，第66页。

可以看出,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治主张上都在关注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但二者关注的重心有一些差异:社会党更加倾情于国家机构的改革,共产党更热心于完善直接民主的形式来实现党的政策和公民的民主权利。后冷战时期,社会党提出的政治多元主义观点,重点在于“左翼多元化”,这是一种新的左翼联盟策略。比如1997年的法国大选,社会党通过在选举前与共产党、绿党共同签署竞选协议,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另外,社会党主导的左翼联合政府在组阁时,特别注意吸收参加立法选举的所有左翼政党入阁,即吸引了社会党外的共产党、激进社会党、绿党和公民运动,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左翼多数派。这种新的左翼联盟策略更好地团结了左翼力量,保证了左翼力量在国民议会中长期占有多数派地位。同期的法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天然使命是抵制政权的各种恶劣作法,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的东西。共产党虽然有一种抗议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共产党希望参加各级政权,但要搞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因此它不打算搞维护资本主义的改革,相反它要革新政权,参与革新政权的行动。”^①为此,法共调整了联盟政策,提出要建立建立在公民干预基础之上的左翼进步力量的新联盟,把各种左翼进步力量联合在政府和议会里,以“真正的‘重新夺取权力’走向真正的参与民主”。^②法共还认为,所有处在不稳定社会地位上的人们,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可以通过左翼进步力量联盟,参与革新政权的民主的、和平的斗争。因此,新的左翼联合大

^① 王坚红主编:《冷战后的世界共产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② 费新录:《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谈“超越马克思主义”与“超越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9期,第4页。

大扩展了联合的范围，只要是不反对法共的政治力量，就是法共联合的对象。法共自己认为，这种左翼进步力量联盟与社会党的阶级合作政策是不同的。“社会党的左翼联合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提出渐进的改革目标。”而法共的联盟是“取代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为了改变社会党从未触动过的“为金钱而金钱”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一革命的目的，而建立在公民干预的基础上的，富有多样化的，不分领导权的，促使“左翼联合政府同右翼政策决裂，实行左翼政策”的新联盟。^①这就是说，共产党主张的这种大范围内的左翼力量联合，是以多种层次的形式实现的，在政府和议会内，或者是通过直接民主的公民干预和人民运动都可以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的左翼联盟已不仅仅是参政策略，而是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后冷战时期，社会党实施左翼联盟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自己获得议会多数，以实现自己参政甚至执政的愿望。显然，社会党希冀自己在左翼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而共产党也不满意只是充当社会党的政治小伙伴。不过，共产党实施左翼联盟策略不仅要达到自己参政的目的，还肩负着希冀促进左翼政府实行进步的变革政策，以免滑向右翼深渊的重任。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坚持左翼联合策略的两类政党难免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共产党的议会党员在完成对社会党的抨击后，却又不得不最终选择支持社会党的做法。所以，后冷战时期在社会党掌握左翼联盟的领导权之后，共产党的左翼联盟策略能够实现到哪种程度——是参政和群众运动的双重实现抑或仅仅是单一的群众运动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党的安排。

^① 林德山：《在探索中前进》，《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第5页。

总之，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治主张上，都是坚持政治民主化的基本政治立场。其中，推行国家机构和制度的民主化是社会党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内容，而共产党则更加热衷于把群众运动和公民干预作为政治民主化必不可少的手段。另外，推进左翼联合是社会党与共产党改变选举不利状态时共同认可的具体参政策略，但不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社会党与共产党对左翼联盟的理解和目的都有很大不同。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主张比较

在冷战时期，研究的重心是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治主张方面的异同；在后冷战时期，则主要对意大利左民党与重建共的政治主张进行比较。

（一）冷战时期

从二战结束到1976年克拉克西上台这一段时间里，意大利社会党的基本政治立场是推进意大利的政治民主，即通过对国内政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建立民主共和国，并团结一切力量以民主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此时意大利社会党提出的主要政治任务包括：其一，反抗专制。反对天民党长期垄断政权的专制主义做法，努力阻止天民党取得议会多数，希冀打破天民党对政权的长期垄断。其二，维护宪法。主张在宪政体制内以和平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治生活中维护宪法，坚决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其三，进行阶级斗争。认为“要把社会民主提高为政治民主，要清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劳动者只有一个办法：阶级斗争”。^①而工会斗争、议会斗争、维护

^①《意大利社会党1957年代表大会的政策声明》，《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宪法和在宪法范围内的斗争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四、建立共和国。正如社会党领导人南尼所说：“我最大的胜利在于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①1976年克拉克西上台后，社会党比以往更加重视通过完善宪政体制来推行国家的民主化。克拉克西提出，用改良主义对国家政治生活进行整顿、治理和改革，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并在本党四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起治理作用的民主”的观点。^②所谓“起治理作用的民主”指的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发展民主，同时通过政治改革和民主的发展来有效地治理国家。^③社会党认为这种对政治体制的大改革，正是“意大利社会和意大利民主的中心问题”。^④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直接选举总统，增强总理和政府的权力，简化立法程序，改革议会工作程序，改革选举制度等等。

战后初期，意大利共产党就宣布维护宪法，在宪政体制内走和平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承认并肯定政治民主的价值是工人运动早在反对法西斯斗争与抵抗运动中取得的牢固成果。”^⑤在共产党人眼中，“确立政治民主的普遍价值，是不可改变的、永久性的抉择”。^⑥可见，政治民主化是冷战时期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立场。这

① 殷叙彝主编：《当代西欧社会党人物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5页。

② 克拉克西在党四十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争取一个正义的社会，争取一个起治理作用的民主》（1984年），高放、张译森、曹德成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页。

③ Alexander De Grand, *The Itali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8.

④ 同2。

⑤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节录]（1979年），同2，第446页。

⑥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建议》（1985年），同2，第473页。

种政治立场的充分表现，是1956年意共八大以“结构改革”为中心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内容包括：一是遵循宪法的要求，意共引导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增强参政意识和积累斗争经验，组成“实现意大利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①来提高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削弱大资产阶级的垄断权力，逐步为民主力量进入国家政权创造条件。二是意共夺取政权后着手进行结构改革，增加整个社会的民主因素，为整个工人阶级及其盟友领导政权创造条件。三是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夺取政权后，增加整个社会上的社会主义因素，实现结构的实质性转变，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意共主张在肯定多党制必要性的同时，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实现共产党的参政或执政目的。这些政治主张包括：一是提高议会的地位，改变议会的结构，简化和加速立法程序；二是权力下放和地方自治；三是改革政党；四是对政府任命实行监督，防止政治分肥等等。

可以看出，冷战时期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立场都是主张维护现存的，由普选制、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组成的共和国政治体制，都认为应该实现政治民主化，都要求改变天民党垄断政权的违宪行为，对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进行改革。当然，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的最大不同应该是出现在克拉克西对社会党改造之后。当时社会党推行改良主义性质的“起治理作用的民主”，政治民主中的工人和劳动阶级领导政权的色彩不再明显，而趋向于单纯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获得更多的执政机会。而同时期的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2页。

共产党仍然十分重视“促进劳动者和公民最广泛地参与对政治方针、经济方针和社会方针的根本决策”。^①

在参政策略方面，战后初期的社会党认为，通过与共产党的统一行动，借助共产党当时的强大的影响壮大自身，就能够达到参政甚至执政的目的。然而，历次选举的失败使社会党对原先的联盟策略心灰意冷。为此，1961年社会党正式通过“中左主义”的路线，逐渐放弃与意共合作的“左翼联盟”，转身投入天民党怀抱，希望通过与天民党结盟，实行“中左联合”政府。1963—1973年是与意共有所疏远的社会党与天民党进行“中左联合”的蜜月时期。但是，当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崛起时，社会党在其1976年的四十大上也再次“抛出绣球”，提出“左翼替代”的战略，希望通过与共产党的重新联盟，实现政权转换。1979年，意共试图进入政府的战略告败，在选举中也接连出现失利，于是克拉克西“无情地”放弃了“左翼替代”战略。80年代之后，伴随着“现代改良主义”政治气氛的弥漫，社会党开始注意吸纳一些小党，想建立一个广泛的改良联盟，目的是在选举中超过共产党，成为左翼领袖。同时，社会党也不拒绝同天民党合作。它希望通过建立政府联盟，夺取国家权力中心的位置，或至少与天民党分享政权。这种新的政治联盟策略，在1983年由克拉克西组成的五党（社会党、天民党、社会民主、自由党和共和党）联合政府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执行。

意大利共产党在战后一直坚持政治联盟策略，但其侧重点随着

^①《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建议》（1985年），高放、张泽森、曹德成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页。

不同阶段历史使命的不同而变动不居。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意共采取的是左翼联合的联盟策略。1948年，意共六大通过了与社会党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阵线的建议。同年，共产党同社会党联合组成人民民主阵线参加根据意大利新宪法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1956年，意共八大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新的联盟和新的合作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①这种联盟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继续加强与同样也是工人与农民阶级代表的社会党的联合，二是与天主教中进步的、民主的力量结成联盟，三是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70年代初，意共根据新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国际形势，提出“历史的妥协”战略，要求建立“民族团结联盟”，实现共产党、天民党和社会党的合作，以促进意大利民主的发展。1979年“历史的妥协”战略失败，意共开始推行“民主替代”战略，强调左翼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是意共的根本目标，同时与天主教运动中进步民主力量达成有效的谅解，并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泛的社会联盟，包括城乡中等生产阶层、知识分子、青年、妇女、南方居民群众等一切愿为自己争取体面生活的人。1989年意共十八大重申“民主代替”战略，决定建立“影子内阁”，争取一切世俗和天主教的民主进步力量，特别是要同社会党和各种群众运动组成广泛的民主替代阵营，推进国家改革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冷战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把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作为基本政治立场。它们在政治领域内的宣传和活动都是围绕这个基本政治立场进行的，例如，共同反对天民党独断政权的专制行为，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

共同在维护宪法和当时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成为意大利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可以看出，二者坚持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基本政治立场分别与它们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都表现出纲领性政党的特征。另外，在具体的参政策略的选择上，二者都突破了只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左翼力量联盟的界限——这表明它们共同作为选举性政党的趋势都日益增强。事实上，这种参政策略对于二者的效果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党获得了成功，而共产党则遭到了失败。

（二）后冷战时期

左民党坚持通过政治制度改革来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基本政治立场。它主张的政治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院改革，变两院为一院；实行半总统制，公民直选总统；加强政府权力，扩大地方自治；改混合选举制为多数选举制等等。重建共的基本政治立场是：“致力于以多种方式，从基层群众出发，为左翼探索出一条道路——一条超越工人运动的无序状态和危机的道路。”^①这就是说，重建共在政治主张上关注的是发展社会力量、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而不再像原意共那样重视政治体制内的改革。

与原来的社会党不同，冷战结束后继承其政治衣钵的左民党急于实现执政愿望，从而选择有效的参政策略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意大利选举制度改革后，左民党很快意识到，必须改变当时左派的分裂状况，建立左派政治联盟，以在选举中与右翼进行斗争。于是，奥凯托在1993年末正式提出，建立一个从左派到中派的大进步联盟，“逐渐地推进意大利的政治斗争两

^① 姜辉、于海青编写：《从温和到激进：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开放与革新》，《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0期，第4页。

极化，促使目前的中派要么选择左翼一边，要么选择右翼一边”。^①1995年，达莱马在左民党全国委员会上宣布：党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将放弃联合左派的战略，结束与重建共的对话，开始与意大利人民党建立联盟；如果有必要，左民党还要与北方联盟建立联盟。左民党的新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者的联盟”，一个不受重建共束缚的具有革新特性的左翼民主党，党与其他政党和中左运动必须以联邦形式为基础，选举产生共同的领导人，进而建立永久的联盟。达莱马称这是一次“自由革命”。^②为此，左民党甚至在政治利益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1995年，左民党和重建共等8党组成“橄榄树联盟”。这是一个以左民党为基石的联邦形式的中左联盟，在1996年立法选举中获得成功。

为了区别于社会党性质的左民党，吸引大批原意共的党员和选民，意重建共在建党之初提出了做坚定的反对派的口号。不过，随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新选举制度开始实行，右翼政治力量不断壮大，迫使重建共逐步改变一味充当反对派的立场。在1996年大选中，为了防范右翼上台，重建共与左民党为首的中左联盟联合。中左联盟选举获得成功后，为防止被同化和失去自己的选民基础，重建共采取参政而不执政的策略：不参加政府，在议会中对政府既支持又制约。这一策略既保持了重建共自身的纲领政策的独立性，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不过，好景难以长久。1998年10月，意政府提出1999年财政法案，重建共认为其中增收

^① 史志钦：《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政治策略及其演变》，《欧洲》，1999年第1期，第76页。

^② 同上，第77页。

节支的条款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与中左联盟的原则性分歧不再能调和，重建共在议会内对政府投了反对票，并毅然退出议会多数，重新扮演起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但是党内对这次退出的分歧严重，最终导致了党的内部分裂。科苏塔带领少数不愿退出的力量另行组建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并参加了第二届中左政府。2001年大选之际，重建共曾试图与中左联盟共同达成联合竞选的协议，但终未成功。重建共一方面认为中左联盟曾经为击败右翼作出了贡献，自己与左民党在维护劳动者利益等方面有相同点；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与中左联盟在就业、私有化等纲领性主张的差异难以逾越，不愿为了竞选而放弃自己的特性。于是，成为一个“帮助推动重要目标（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实现”的“有战斗力的社会和政治反对派”，^①是重建共成立以来一直固守的基本立场。因此，对于左民党提出的中左联盟的建议，重建共基本上是不卑不亢，奉行自己灵活的参政策略。

总之，冷战结束后，意大利左民党和重建共在政治主张和参政策略上有很大不同。左民党重视的是议会政治领域，认为对政府采取政治行动具有优先性。而重建共把议会外的社会运动当作中心活动，自愿在现行民主政治体制之内进行政治活动。换言之，左民党越来越多地向选举党方向转变，重建共则政治立场坚定，保留着典型的纲领党特色。

综上所述，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是法国、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共同的基本政治立场。具体说来，两类政党共同对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予以承认，并共同要求对这种政治体制进行完善与改革。另

^① 姜辉、于海青编写：《从温和到激进：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开放与革新》，《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0期，第4页。

外，左翼联合是两类政党都重视的参政策略，但是社会党多把它当作上台执政的工具，而共产党除了需要利用它实现参政的愿望，还希望以此施加对社会党的影响，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社会政策比较

本节主要选取与选民的工作和生活最为直接相关，也最能体现政党意识形态特色的几个典型的经济社会政策，如国有化、私有化政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等等，来对法国、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社会政策比较

对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考察，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左翼联盟和80年代社会党上台执政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两类政党经济社会政策的异同非常明显，而且它们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对后冷战时期两类政党经济社会政策的比较分析，则集中在若斯潘领导的社会党与共产党联合政府时期。

（一）冷战时期

前文已经说过，战后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遵照马克思的思想，都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是社会主义题中的应有之义。因此，两类政党一直都把企业国有化和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1972年，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发布的《共同施政纲领》的第一部分就是题为“生活得更好、改变生活”的社会福利政策。它主要包含了六项内容：一是提高工资，提高人民购买力，减少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二是消灭失业和

长期就业不足现象，实现充分就业；三是建立预防年老、失业和患病的物质保障体系；四是完善劳动立法，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五是进行市政建设，改善公民住宅环境；六是健全国民教育体系，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初级的和经常性教育的权利。可见，社会党与共产党都主张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共同施政纲领》中，紧随社会福利政策的第二部分就是题为“经济民主化、发展国营部门、进步计划化”的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国有化的有关内容。社会党与共产党都认为国有化是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重要手段，进行国有化的部门应该是那些在经济的关键部门中占有战略地位的金融机构、财政部门以及工业集团和企业。在社会党与共产党看来，国有化企业仍要服从于“竞争的市场法则”，企业的运转仍要在市场经济的范畴内进行，而伴随着国有化运动同时进行的经济计划化可以帮助国家把市场机制用于达到社会目的，而这种制度可“归入社会主义一类”。^①另外，《共同施政纲领》还强调：“增加向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预先征收的赋税，减轻劳动人民，首先是收入微薄者所负担的所得税和国民消费税”，同时“提高收入较多者的赋税累进率”。^②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企业国有化和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是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共同的政治主张。

1981年6月法国社会党执政后，共产党参加了左翼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开始推行扩大国有化运动，这次国有化运动使法国国有化部

^① 侯玉兰著：《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②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305-347页。

门在全国工业总投资中的比重从15%一下子提高到了40%。与国有化运动一起启动的还有经济计划化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同时推行了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改革。从执政之日算起，联合政府先后共制定了40多项有关法律法规，对法国当时的税收政策、福利政策、就业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式改革。改革的重心是：对富人和高收入者的课税增加，减免部分低收入者的所得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补贴；在国有化部门新增就业机会，缩减工时；加强劳动者权利，发展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内容既可以看作是法国左翼政党对自己意识形态的完美兑现，也可以看作是它们用“膨胀”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有益尝试。起初，共产党对这些改革是比较满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二者的分歧逐步增大。

1982年，由于法国经济形势恶化和宏观调节失灵，社会党政府不得不大大放慢改革速度，转而实行“紧缩”政策，如：鼓励投资；降低利息率和营业税，取消企业主对家庭补助的分摊额；变反对失业为反对通货膨胀，进行工业结构改革，裁减工人；限制社会福利开支，如大幅度削减冻结失业救济金等社会福利开支，废除按物价指数自动调整工资的办法，调资幅度限制在通货膨胀率内等等。所有这些严厉的经济政策实行初衷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缓解经济危机。但是，结果却是把社会负担转嫁到中下层人民的身上，导致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出现战后第一次下降。1986—1988年左右共处时期，密特朗允许右翼政府实行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等政策。虽然1988年社会党政府停止了私有化运动，但也延缓了国有化和计划化的实施。此时的社会党政府仍是严格控制公共和社会开支，降低利税以重建企业竞争力，采取温和、务实乃至自由主义的措施，以促进经

济的稳定增长。在社会政策方面，社会党政府恢复了右翼政府中止的征收大财产税，设立了最低生活保证金，强调社会关系方面实行“全民团结互助”。

对于社会党政府“紧缩”政策的实施，共产党表示出强烈不满。它批判社会党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要求社会党放弃紧缩政策，提高人民购买力，实行“公正的税收”政策，“提高低工资”。共产党认为这样才能在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公正等“重要领域实现新的较大的进展”。^①经过与社会党的多次协调，确信无法缩小分歧后，共产党在1984年退出联合政府。此后的整个80年代，共产党一直坚持实现这样的政策：实现充分就业，提高群众购买力、工资和社会补助金；扩大享受福利的人群，实行免费医疗、教育；改善劳动者的住房条件等。同时，它坚决反对任何紧缩或压缩工人收入的经济社会政策。因为在共产党看来，这是“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地迫使人民压缩消费并接受更残酷的剥削”^②的手段。

总之，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共同主张和推行国有化运动以及社会福利政策。但是，社会党由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后，迫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压力，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对一些激进色彩浓重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进而停止了国有化运动，延缓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社会党的这些“折中”或者说“出于无奈”的做法，与一直坚持彻底实施激进政策的共产党的主张差异很大。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党并不是对这些

① 侯玉兰著：《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②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经济社会政策采取否定态度的。当1988年法国经济形势稍微好转时，社会党政府就恢复了其中的某些社会福利政策。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总之，对国有化程度和社会福利范围不同的理解和要求，成为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差别的重要表现。

（二）后冷战时期

面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困境，若斯潘社会党充分肯定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认为私有化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危机。但是它又认为，私有化的实施“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理解与支持，对于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迫切问题，必须优先采取缓解措施”。^①因此，社会党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应在保持国家股份的一定比例的基础上逐步开放，而不是一步到位。1997年，也就是若斯潘执政的第一年，社会党政府对法国电信公司、汤姆森—无线电报公司、工商业信贷银行、全国保险集团、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等十来家大型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的改造。同年，社会党制定出具有明显左翼色彩的选举纲领，把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加强公平分配作为其经济社会政策的三项主要内容。在2000年法国社会党七十二大上，它提出本党的经济政策目标是两个：“充分就业”和“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②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就业问题，法国社会党提出了一个社会应该在劳动世界里给每一个人提供一个位置的目标，主张为长期失业者设立一项“返回工作公约”，为青年人订立一项独立自主公约，将培训问

^① 童光荣：《若斯潘经济思想浅析》，《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第45页。

^② 陈露：《法国社会党纲领性文件》，《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期，第14页。

题纳入终生教育计划之中。在1997—2002年执政期间，法国社会党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降低失业率，主要包括：通过给企业优惠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青年就业法案”，规定3年内为30岁以下的失业者提供35个就业机会；缩短劳动时间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欧盟内部的就业合作等等。关于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问题，社会党反对那种认为传统的社会党人仅仅是“再分配论者”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关心生产，关心以更加有效、更加公正的方式创造财富。生产发展了，才能为再分配创造条件。因此它主张必须增加人民的购买力，具体措施包括：确定工资新等级，推广职工分红和参与机制，提高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大大增加失业津贴、家庭补助、残废补助等。在2003年法国社会党七十三大上，在对2002年大选失利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大会决议继续提出“争取充分就业”、“确保社会保障”，“为社会公正而斗争”等内容。^①总之，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主张实施“积极福利”，把削减福利与增加就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福利的效益：一方面倡导要突出对人的劳动能力的培养，变依赖社会为立足社会，而不是直接对其提供经济的维持力；另一方面主张政府应该积极加以引导并为人们提供就业门路，用社会投资国家的企业方式来取代福利国家，要充分就业而不是充分救济。

后冷战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大力推行革新政策，加大维护劳动者利益的斗争力度。1994年二十八天后，法共提出了与右翼势力针锋相对的政策主张，即要求以就业为中心，积极领导和参加反对巴拉

^① 黎原编写：《法国社会党第七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简介》，《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20页。

贝尔政府颁布的有关修改教育法和职业安全合同法的斗争，并坚决支持公用事业部门工薪者、农民、渔民等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1999年法罗贝尔·于出版的《共产主义新规划》一书提出十大社会变革“工地”，以建立一个负责任和互助的社会和世界，争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半数与经济、就业、福利等经济社会政策有关，^①包括：一是“动员全国力量，实现社会充分就业”，即要反对解雇，创造就业机会，解决青年就业，进行反失业的长期斗争。二是“改变劳动”，即要根据信息革命带来的变化，培训从事智力劳动的、有文化的人。三是“从许诺到履行诺言”，即要确定工薪劳动者的地位，要革新企业，由工薪劳动者占有劳动条件，参与企业管理和民主决策。四是“促进公共利益”，即为了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划清界限，提出要减少国家干预，以发挥国营企业的动力作用，将经济有效性、社会公正和公民平等结合起来。五是“争取一个更加互助的社会”，即要确保社会保障，开展青年互助、妇女互助、城市互助、外国移民互助等。另外，共产党仍然坚持反对私有化，主张通过对公用事业部门和国有企业实行革新和民主化，来应对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以发挥其动力作用。

总之，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从一个担负主要执政任务的角色出发，一直为力图兼顾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维持公正平等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而努力。与之相反，由于不需要承担日常的“繁文缛节式”的政府事务或“现实主义”的社会管理工作，法国共产党一直批判和攻击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不能解决新资本主

^① 曹松豪：《探索新路 面向未来——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提出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的新计划”》，《当代世界》，1999年第5期，第28页。

义的危机,力图推出自己较为理想化的经济社会改革计划和主张。法共在这一时期的做法,恰恰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在执政之前指责当时右翼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由此可见,后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经济社会政策的差异,更多地是出于两类政党现实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命运的考虑,而不是因其意识形态的作用所致。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社会政策比较

在冷战时期,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是“同”大于“异”的。在后冷战时期,左民党与重建共之间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 冷战时期

战后很长时期内,意大利社会党或者依附于共产党,或者从属于天民党,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并没有自己独到的主张。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和产品社会化”是它在这方面的政策目标。20世纪60年代,有社会党参与的天民党联合政府曾通过国有化法案,但是国有化企业很快出现管理不善的问题,经济计划也一经实行即遭遇失败。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克西认为过分支持国营企业和人为维护混合经济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应实行对所有的经济部门都适用的公平竞争原则,而私人企业在不构成权力垄断的源泉时,与社会主义并非不相容。他认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倒是国有化的普及,因为这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固有危险,也意味着失去效益与革新。因此,80年代初的社会党政府下令缩小国营企业的规模,先后共有30多家国营企业被出售。同时,社会党还认为福利国家是为了克服危机而出现的,在新的条件下它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因此要进一步检验它,减

少或除去福利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过度行为和非理性因素，使之更切实可行。

战后，通过对法西斯政权名下的企业收归国有的做法，意大利“公有部分已经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大了”。^①认识到这一点的意共主张不要继续扩大国营经济成分，却强调保持国营部门的“引导”作用。意共还重视“民主规划”，即经济计划性，认为应该“通过与不同社会力量 and 不同民主中心的对话来制定一个计划，以此作为所有国营与私人实业家的明确的指针”。^②意共还极力主张加强工业化，发展和改造农业，解决南部问题，以改善意大利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为达到这一目的，意共赞同使用紧缩政策和在工会运动中自行限制工资的政策——这与一般左翼政党的政策是不同的。另外，意共希望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实行税制改革，实现公平分配，它认为解决社会危机的政策的“目标就是高就业率”。^③与此相一致，意共主张建立和完善包括社会保险制度、全国医疗保健计划和退休金制度和救济制度等内容社会福利体系。

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理论上支持生产部门的国有化或社会化。但是二者都认为，既然意大利的国有化程度已经很高，那么就不需要继续国有化，相反应该保持私有企业的积极主动性。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二者明显的区别在于：共产

① [意]那波利塔诺、[英]霍布斯鲍姆著：《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②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纲》[节录]（1979年），高放、张泽森、曹德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③ 同1，第40页。

党坚持公营部门的主导地位，不赞成私有化政策；社会党则为应付现实经济社会问题而主动推行私有化政策。在社会政策方面，维护劳动者利益一直是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一些细小地方也还存在分歧，总的来看，就体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再分配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两个基本的经济社会政策来看，冷战时期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二）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为了谋求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关系”，^①意大利左民党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做了如下举动：一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引进私营企业管理机制，加快公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如对全国保险公司、埃尼公司和工业复兴公司的私有化，其中后者一次性转让该公司25万亿里拉，其私有化力度在整个西欧都是少见的。二是在对待社会福利制度上，左民党通过对传统左翼的“社会相助”等原则进行“深刻反思”，强调要对福利政策进行改革，使之改变仅仅作为“安全网络”的作用，朝着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性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向发展。这种改革意味着在必要时刻会削减福利开支。因此，左民党同时实行了严厉的增收节支的措施，如改革退休金制度，削减医疗费用，增加火车运输、香烟、电话等价格等，以削减公共财政赤字。三是失业问题是必须关注的重点内容。左民党表示要改革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及税收制度，保障扩大就业和合理分配。

意重建共从建立时起就主张实行国有和私营经济并存的“混合

^① 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1998—1999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经济”，反对国有部门的私有化，主张维护国有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重建共还积极呼吁反对失业，提倡保护下层劳动者的福利，抵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主张改善国家财政，赞同调整财富再分配制度等。可见，重建共的经济社会政策充分体现了该党以保护社会下层阶级的根本权益、争取劳动者的自主权为斗争基点的特色。1997年10月，重建共对中左政府制定的《1998年财政预算案》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继续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要求增加退休金和养老金。1998年，因为在就业与工资政策、私有化政策上与执政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重建共义无反顾地退出议会多数，不再支持政府。另外，重建共还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歧视和剥削，主张保护外国移民的合法权益。

后冷战时期的左民党虽然仍然重视中下层劳动人民利益，但是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已不拘泥于左翼政党的传统主张，而是更加讲求实用意义，它经常会使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相比之下，意重建共更加遵循传统左翼的经济社会政策，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坚定立场而不妥协。可见，两党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战后，法、意共产党始终坚持国有化和公有部门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建立保障劳动者利益的社会福利制度。共产党认为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纲领性政策，是不允许与资本主义妥协的。而法、意社会党的经济社会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到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作为执政党的社会党，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不得不考虑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所有人的利益问题，以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所以在政策方面更追求实效，而减少了传统的左翼意识形态色彩。

第三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外交政策比较

政党外交政策表现了政党对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反应和采取的应对举措。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之争和西欧特殊的国际地位，西欧左翼政党，尤其是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之趋向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社会党与共产党对不断推进的欧洲一体化的反应，也是三者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下面对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美、苏、欧洲一体化三个领域。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外交政策比较

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决定了对两类左翼政党的比较研究须分别在这两个阶段内进行。

（一）冷战时期

对美政策 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峙，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不得不早早地明确它们对美、苏的态度和立场。法国社会党重视与美国的同盟政策，承认美国在北大西洋联盟中的作用。它主张法国应依靠北大西洋联盟和北约的军事实力，防止美欧防务脱钩，但同时坚持法国不参加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并保持法国的独立决定权。社会党往往根据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紧张还是缓和的具体情况，灵活多变地改变对美政策，其原则是在不根本伤害盟友关系的前提下，最大实现法国的独立性和利益，发挥法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大国作用。法国共产党起初是把美国作为敌对的帝国主义对象来看待，指责帝国主义疯狂的军备竞赛及其对世界和平造成的

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冷战的缓和,法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共同施政纲领》规定:“法国一方面拒绝重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也不排除缔结防务性联盟和互不侵犯条约。在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需要的情况下,法国武装力量将协同作战。”^①从此,承认法国隶属于西方联盟内,并且在国家安全上有求于美国和北约,是共产党对美国和西方集团的基本态度。由此可见,承认法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但对美坚持法国自身的独立性,是两类政党共同的基本立场。但是共产党会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和来自苏联的压力不断调整对美国的抨击力度,这一点与社会党有着明显不同。

对苏政策 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对苏联一直采取敌对态度。社会党认为苏联是反人道的、专制的、残暴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批判苏联向外扩张的野心。如社会党在执政初期,对苏联实行强硬立场,不断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社会党政府对苏关系有所改善,对戈氏的改革持欢迎态度。一般说来,社会党对苏联的态度是与当时的法苏国家关系相一致的。法国共产党则被称为“苏共在西欧的代理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它一直支持苏共立场,赞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认为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对国际缓和做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法共对苏共不再只是顺从,而是有了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之辞。对80年代的戈氏改革,法共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内部则持保留态度。在左翼联盟时期,法

^①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页。

共在对苏政策上向社会党做了让步。如1981年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共同施政声明》宣布：“两党确认阿富汗人民有选择自己的制度和政府的权利。两党主张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停止一切外来权利”。^①冷战后期，法共在寻找适合法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越来越疏远了苏联，但是与苏共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却始终没有彻底断绝。

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对抗问题，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提出了新国际主义的观点。但二者的解释却相去甚远：社会党的“新国际主义”是指由首批工业化国家（主要是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的劳动者的团结。这一观点是针对国际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提出的，强调的是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斗争，以求得全球的解放。而共产党的“新国际主义”是针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关系而创立起来的，其侧重点是摆脱苏联的控制，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独立、完全平等、互不干涉的关系，承认各国共产党间存在分歧，互相尊重各自的立场。

可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无产阶级劳动者国际团结的传统。但是共产党主要关注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关系，而社会党则将视野定位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上。社会党宣传的“新国际主义”并不像共产党那样突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是以人类的解放为旗帜。这与社会党作为有机会执政的主要政党，为法国寻求第三种力量以制衡美苏，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的意图有关。另外，在两极对峙时期，倡导和平运动是两党共同的政

^① 乔治·马歇著：《让我们说实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策。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施政》纲领上明文规定，“促进和平与发展国际合作”。因此推动国际裁军和核不扩散运动，反对美、苏在西欧屯兵和安置导弹，成为两党共同的立场。

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政策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倡议国和推动者，其社会党与右翼政党都认为欧洲建设是自己的重点政策之一，法国社会党甚至认为“法国是祖国，欧洲是未来”。1981年六大上，社会党指出，“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欧洲，使欧洲各国人民能够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共同体事业的受益者”。^①密特朗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上曾经说过：“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共同体将是整个欧洲成功的主要因素。”^②冷战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则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共一直反对欧洲共同市场，称它为“垄断资本”的联合，提出建设一个“劳动人民”的欧洲的主张。1984年法共二十四大决议中又指出：“在欧洲，法国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应当努力促进欧洲日益走向社会进步、民主、对世界开放、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和争取和平。在共同市场内，它可以在所有方面推动以尊重各自利益和主权为基础的合作”。^③随着欧洲一体化成为客观事实，法共不再像在欧洲联合的初步筹建阶段时那样坚决反对欧洲一体化，但始终坚持在实施欧洲一体化的同时，保留民族主权和尊重民族利益。这与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社会党的立场十分不同。

①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398页。

②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页。

③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总之,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员,法国共产党则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成员。但是两党都不希望法国受到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挟制而利益受损,对超级大国都心存不满。在对待欧洲问题上,两党的外交政策也是差异很大的。社会党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决维护者和推动者,而法共一直是反对和保留意见的民族主义者。

(二) 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法国社会党一直力图使欧洲从美国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获得完全独立。因此,它对美国的霸权行径是敢于说“不”的。例如在1997年,当美国拒绝北约提出的将南欧司令一职交欧洲人担任的要求时,法国社会党政府中止了法国重返北约的进程。但是,由于对人权、自由等价值观的理解与美国等西方势力一致,对美国以维护人权为旗帜、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的“新干涉主义”,法国社会党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甚至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支持和宽容态度,一度成为美国在西欧的合作者之一。如在科索沃战争中法国社会党政府扮演的角色等等,这与其一贯的和平主义者的形象很不相符。

在对待欧政策方面,法国社会党一如既往地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主张: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改革,促进工业、外贸、文化更加统一的政策;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制定和实施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最终建立西欧独立防务体系,使欧盟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成为独立的一极;在坚持欧盟建设和如期向单一货币过渡的同时,提出建设社会和公民的欧洲,强调欧洲建设要注意解决社会问题;提出“团结和增长公约”以取代惩罚性的“稳定公约”。1997年,社会党推动欧盟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上写进了维护民众福利的社会条款。2000年社会党七十二大指出,其“欧洲

目标不仅是建设一个大市场和统一货币，而且还要创建一个真正的欧洲的公共权力机构，以便协助国家完成基本使命”。^①也就是说，要建设一个提供发展和就业服务的欧洲，要求在欧洲中央银行的统一目标下，把发展与创造就业同价格稳定放到同等的地位上；还要建设一个更为政治化的欧洲、更为民主的欧洲和更为市民化的欧洲，同时要要进行机构改革，使其免于瘫痪。2003年社会党七十三大明确提出：“为了改变世界而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和社会的欧洲”，这个欧洲是“一个团结的、政治的、公民的，以及强大的、不追随美国的欧洲”。^②法国社会党越来越把推动欧洲全面一体化，建立一个高度联合的欧洲作为实现多极世界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要把欧洲建成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分层的实体。另外，在加强欧盟一体化的深度的同时，推动欧盟向原苏东地区扩展，也包含在后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针对欧洲的外交策略之中。

冷战结束后，法国共产党继续奉行和平和裁军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中发挥法国的积极作用。它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主张北约非军事化。如近年来，法共多次组织游行，声援古巴反抗美国的禁运活动，谴责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

在欧洲问题上，法国共产党一直担心欧洲一体化会影响法国自身主权的独立性，以及劳动者权益会受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控制，所以越来越以福利国家、民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的姿态出

^① 陈露译：《法国社会党纲领性文件》，《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期，第16页。

^② 黎原编写：《法国社会党第七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简介》，《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19—20页。

现在人们面前。法共认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的就是一个野蛮的自由市场,随着带有德国印记的《马约》的实施,法国人已经开始并且面临着自由大市场的掠夺,农业配额、社会福利、生活水平、就业率不断下降,钢铁、纺织、造船工业遭到出卖,而且这种状况仍将继续下去。在法国举行反对《马约》的全民公决时,拥有46个席位的法共议会党团几乎全体投票反对(仅有一票弃权)。这一行动明确地表明了法共的态度。1997年,法共继续反对《阿姆斯特朗条约》,反对欧洲单一货币,主张建立“经济增长和就业公约”,捍卫欧洲各国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成果,赋予欧洲建设以进步和民主的方向。它还指责社会党过度看重欧洲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视对失业者的生存与生活条件进行改善。在2003年三十二大上,法共是这样批判社会党的:“掌握大权的社会党”通过放弃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而使多元左翼政府依赖金融市场并且受到不利于就业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欧盟结构的限制”。^①

可见,冷战结束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对美国的霸权政策流露出反对之意,并且希望法国能够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党在仍然支持与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已经开始认识到欧洲一体化导致的就业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法共对欧洲一体化造成的不人道现象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并要求政府加大解决社会问题的力度。

总之,无论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外交政策上都表现出对法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对国家独立的重视,

^① 陈露摘译:《法国共产党三十二大对若干理论问题的阐述》,《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18页。

以及对美国单极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反感。不过，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所扮政治角色的差别，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对美、苏以及欧洲的外交政策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外交政策比较

对于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外交政策的比较分析，仍是需要从冷战和后冷战两个历史阶段进行。

（一）冷战时期

对美政策 战后，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意大利社会党对美国的态度前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党自身意识形态的演变是一致的。最初，社会党认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布鲁塞尔公约、北大西洋公约，都是20世纪的神圣同盟的进攻工具和步骤，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如同19世纪的神圣同盟是自由主义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①因此，社会党把国际政策的中心定为和平、中立，实际上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随着冷战形势的严峻和意大利所受美国特殊“照顾”的日益加强，从1955年开始，意大利社会党开始同意接受大西洋联盟，接受北约，但同时强调它的防御性质，强调大西洋联盟重点是政治和经济合作，而不是军事合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克拉克西时期，社会党始终奉行亲美政策，认为意大利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与美国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因此不会打破多年形成的同美国互相依赖的关系。社会党虽然多年来忠实于北约，支持北约在意大利和欧洲部署导弹，却对美

^① 摘自《1949年意大利社会党佛罗伦萨代表大会决议》，参见[法]热纳维埃夫·比布著：《意大利政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国损人利己的行为日益不满，而主张意大利独立自主。利用和平与缓和的旗帜，社会党在促进美苏谈判和国际裁军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作用。

在冷战严峻时期，意大利共产党一直坚持亲苏反美的立场。意共逐渐认识到，提出意大利单方面退出北约组织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当时真正的问题是促进局势缓和，真正树立起缓和与和平共处的精神，这样才能消除将欧洲分裂成两大军事集团的状况，也才能最终消除意大利国家安全的隐患。出于这种考虑，1977年，意共表示同意意大利加入北约组织，提出一个争取既不反苏又不反美的西欧的口号，而且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同美国断绝关系或发生冲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意共甚至与美驻意使馆高级官员定期进行内部接触，以博得美国的信任和认可，争取让美国撤销不允许西欧共产党参政的“禁令”。

对苏政策 意大利社会党在跟随共产党的时期是站在苏联阵营内的，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这一状况出现了转变。克拉克西上台后更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苏共大肆抨击。社会党组成政府之后，在对苏关系上则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这主要因为克拉克西认识到苏联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发现通过与苏联进行经济贸易、技术合作等交流，可以满足意大利国内的需求，并且看到可以通过缓和双方关系来维持欧洲最低水平的均势，避免在欧洲爆发一场常规战争或有限战争的风险。与社会党不同，苏共二十大之后，意共针对苏联的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地位，提出了国际共运的“多中心论”，反对领导国家和领导党的存在。它认为不必再遵循苏联模式，也不必非要同苏联站在一起不可。换句话说，意共越来越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及其对东欧的统治，如它在对待波匈事件中的反应是强

烈谴责强国以干涉和压力威胁其他小国的主权。进入20世纪70年代，意共又提出“新国际主义”，继续坚持没有国际共运的中心，主张所有党都是平等的原则，同时把国际主义范围扩展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意共承认本党与苏共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本党民众同苏联在思想上的联系和感情上有着团结一致的历史传统，并承认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国际作用”。^①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意共与苏共的关系大为改善，纳塔和奥凯托等时任意共主要领导人均到苏联访问过。此时，意共十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对外政策，尤其重视他的“欧洲大厦”计划。^②

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政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社会党就采取了全力支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姿态。它认为意大利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必须加强意大利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欧洲一体化可以帮助意大利实现这一目的；同时还认为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有助于欧洲各国的团结和在世界范围内增强欧洲的力量。意大利社会党甚至主张“作为建立欧洲共同体倡导者之一的意大利，应当更积极推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动员国内一切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做好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准备”。^③

^① [意]那波利塔诺、[英]霍布斯鲍姆著：《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② Jacques Levesqu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Peter Lavoy), *Italian Communists Versus the Soviet Union, the PCI Charts a New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p236.

^③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44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意共意识到欧洲共同体对西欧的独立自主和争取东西方缓和的作用，意共逐渐由一体化的反对者转向建设性的合作者。一方面它谴责欧洲联合的资本主义内涵，另一方面开始谋求对欧洲联合施加影响。1969年，意共派出7人代表团参加了欧洲议会。1973年，意共和法共开始在欧洲议会组建共产党议会党团。1982年意共的欧洲议会议员加里兹提出一个报告，建议欧洲在对防务和缓和国际关系的政策上用共同的声音说话。意共致力于使欧共体独立于美国，加强欧洲合作以抵抗大西洋主义，创建一个不结盟的、中立的欧洲，同时还希望利用自身在欧共体内的作用劝说意大利的国民接受共产党的参政要求。到1989年的十八大，意共一改过去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思想，转而认为欧洲议会享有超国家的权力，主张欧洲各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条件与权利要逐步统一，克服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平衡，实行新的农业政策。

总之，冷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即使分属于不同阵营，在对美、苏、欧三方面的对外政策上，也是越来越没有本质的差异。在对待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方面，两党都承认意大利身处西方阵营的事实，都认识到国家处于冷战对峙的最前沿，因此把和平与安全当作是重要立场，呼吁欧洲的缓和，与美、苏和平相处。只是意大利共产党对苏联的疏远要比社会党晚得多。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也都是持相近的态度。

（二）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旧的两极政治格局已不复存在，意大利左民党反对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明确表示反对军备竞赛和核试验，主张推动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欧洲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发挥

作用；强调以非暴力为基础，以和平为直接目标，一切左翼、民主、进步的力量应该加强合作与交往，争取建立更公正、更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左民党积极参加社会党国际、欧洲社会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虽然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但是左民党与西欧其他社会党一样，关于基本价值观的态度与美国一致，因而以它为首的中左政府支持了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在欧洲一体化方面，左民党积极支持欧洲政治、经济、货币、外交和防务一体化进程，全面参与欧盟建设，要求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具有公民和社会权利的欧洲。^①1999年，中左联盟政府推动意大利搭上了欧元头班车，成为首批欧洲经货联盟的成员国。另外，左民党还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技术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世界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应该确立南北之间的新合作关系。

意重建共自成立以来，反对建立在美国武力独霸全球基础上的军事秩序，一直批评美通过军事、经济、金融等手段扩大资本主义统治范围。因此，它主张联合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重建共批评意政府忠于北约是允许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并坚决反对以武力解决一切国际冲突，主张通过联合国运作机制，用和平的手段建立国际新秩序。对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建共始终坚持坚决的反对立场。重建共认为，欧洲的一体化是没有民主的一体化。它批评《马约》，认为这一条约只有利

^①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648-649页。

于大资本、大金融集团加强对欧洲的统治，反对为达到《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而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主张以民主、群众参与、实现充分就业、改革福利制度为首要内容代替《马约》，建设一个人民的欧洲。为此，意重建共积极主动的参加欧洲议会联合左翼党团、欧洲新左翼论坛等组织，以及一系列欧洲共产党的多边会议，倡导在欧洲建立一个多国的、多元的政治主体——“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国际”，成为劳动者阶级和社会运动的真正代言人，与欧洲社会党相抗衡。^①

后冷战时期的意大利左民党和重建共仍然都是倡议和平、反对霸权、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左翼力量，都主张国际左翼力量的联合，都反对单极霸权和军备竞赛。但是左民党作为以执政为目标的政党，在政策主张上体现了灵活性：反对战争，却支持北约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对主权国家的人侵；重视劳动者就业问题，却努力调整国内经济政治政策以按时加入欧盟单一货币体系。意重建共则倡导世界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左翼力量实现联合，并对左民党等西欧社会党日益倾向于资产阶级阵营表示不满，强调欧洲一体化带给劳动人民的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并对此进行猛烈抨击。可见，两党的外交政策是很不相同的：左民党更富有实用主义色彩，重建共则更意识形态化，更坚持传统的和平主义者和进步力量的思维。

综上所述，受到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对峙的影响，冷战时期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十分重视西欧安全问题，因此两大左翼政党都是反对霸权，倡导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虽然在冷战时期，共产党

^①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588-589页。

始终不能完全摆脱自身意识形态所属阵营与本国所属阵营相对立的矛盾，但随着西盛东衰的国际趋势的发展，在对待美欧盟友关系和北约的军事存在问题上，本受苏联影响甚深的共产党越来越与社会党一样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接受了西欧的安全离不了美国的论调。社会党一直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欧洲脱离超级大国的控制，提高国际地位的有效方式，因此它始终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共产党则一方面对欧洲一体化持某种民族主义倾向，认为会损害本国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深知欧洲一体化不可逆转，渴望通过自身努力促进欧洲联盟的民主化与公正化。值得注意的是，后冷战时期的社会党，已经开始对欧洲一体化产生的有关增强国际资本剥削强度和影响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等负面问题有所关注，从而强调建设公正的、人道的欧洲，这一点是与共产党有相似之处的。

小 结

通过对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三个领域的政策主张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各自政策主张上都十分注重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重视企业国有化和国家干预，强调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渴望世界和平、民主与公平。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策主张上的特性与意识形态上的特性是相吻合的，它们都是社会中下层人民的代表者，是社会进步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因为如此，它们处理现实问题的具体策略主张也才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左翼联合的参政策略，重视失业问题的解决，强调对失业者进行培训和教育，以及冷战时期承认美欧盟友关系和北约的客观存在等等。

但是,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改良与革命的不同取向,在它们的政策主张上也有着明显的显现:在政治主张上,共产党以比社会党更激进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意愿。在经济政策上,共产党比社会党更加坚守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因为其一贯认为这些政策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社会党则逐渐把这些政策看作与财政、货币等手段一样的,只是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所需要的具体方案,而不再具有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作用。在外交政策上,冷战时期的共产党比社会党更多地关注苏联阵营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的共产党则在担负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使命上,比社会党更具有坚定性与积极性;社会党则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在反对美国单极霸权行径的同时,维护美欧联盟关系,并把欧洲一体化作为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声望,对抗超级大国的最主要工具。

第四章

曲折发展中的盛衰逆转：战后 社会党与共产党力量与影响比较

政党的力量与影响是指政党参与政治或社会活动并在其中对其他组织或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所起到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政党力量与影响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其在政府或议会中所谋取地位的高低。或者说，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政党的政治影响的主要指标之一。另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面的左翼政党来说，由于其具有群众性政党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动员也成为体现政党的力量与影响的重要指标之一。由此，本章将对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两个方面的力量与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参与比较

在议会民主国家里，政党的政治参与是通过参加选举的途径实现的，因此，衡量政党政治参与程度的参数就是政党参与选举的结果，即选举中政党的得票率、获得的选票数 and 议席数等。战后，出于对暴力的厌恶与对和平的尊重，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都认同并加入本国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通过参加竞选获得议席和执政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纲领目标和政策主张。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参与比较

战后，法国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包括三种形式的选举：总统选举、立法选举和地方选举。前二者是国家级选举，直接体现政党在国家级政治活动中的影响，也是我们比较的重点。在实行议会制的第四共和国时期，产生议会议员和政府首脑的立法选举最为当时各个政党所重视；而到了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的第五共和国时期，尤其是1962年法国实行直接普选总统之后，两轮多数的总统选举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其次才是对立法选举的关注。表1、2分别展示了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参加历次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的情况。

通过表1、2中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自战后初期到1968年（新社会党成立的最后一次选举时间），除1945年的24%之外，社会党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一直徘徊在10%—20%之间。其中在第五共和国的头两次选举（1958年和1962年），社会党的得票率是战后参加立法选举得票最低的两次。在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党的得票率快速突破20%，197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25.9%；在80年代，这一数字攀升到30%以上；90年代以后，这一数字的变动幅度很大：1993年是18.5%，1997年猛然拉升到38.9%，2002年又快速回落到27.7%。与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变动相呼应，1945—1956年，社会党在议会中议席数目一直维持在90席以上，1958年则跌落到最底谷的40席。从1962年开始，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逐渐增强。1967年，社会党突破了百位议席的大关。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的议席数达到峰顶（1988年获得史无前例的260个议席）；90年代以后，这一数字遭到大起大落的命运：1993年是57席，1997年急剧上升到241席，2002年又下降到160席。虽然社会党的议席数与得票率之间并不是完全的比例关系，但它们的起伏跌宕是一致的。

表 1：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历次立法选举表
(括号外是议席数，括号内是得票率)

选举时间	法国社会党 (包括不同时期党的不同名称和竞选联盟)	法国共产党
1945	13 (24%)	159 (26%)
1946	93 (17.9%)	168 (28.6%)
1951	10 (14.8%)	103 (25.6%)
1956	95 (15%)	150 (25.6%)
1958	40 (15.5%)	10 (18.9%)
1962	66 (12.7%)	41 (21.8%)
1967	121 (19%)	73 (22.5%)
1968	57 (16.5%)	34 (20%)
1973	102 (20.7%)	73 (21.3%)
1978	115 (25.9%)	86 (20.5%)
1981	285 (37.8%)	44 (16.1%)
1986	206 (31.2%)	35 (9.8%)
1988	260 (36.0%)	27 (11.1%)
1993	54 (18.5%)	23 (9.2%)
1997	241 (38.9%)	38 (3.76%)
2002	160 (27.7%)	25 (4.3%)

资料来源：凯特·胡德森主编：《1989年以来的欧洲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欧洲左翼？》，伦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第83-84页；张台麟著：《法国政府与政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21-338页；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02-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由以上的选举得票率可看出，法国社会党在执政参政方面获得了多次机会。第四共和国的27届政府中，社会党曾参政21次，并获得其中的5次组阁机会。第五共和国成立后，经过20多年的在野党生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重新获得组阁机会，这次执政持续

表 2：第五共和国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历次总统选举表
 (1962年总统选举法修改之后，有两个数字时，前一数字是第一轮选举中的得票率，后一数字是第二轮选举中的得票率)

选举时间	法国社会党	法国共产党
1965	31.7%，44.8%	与社会党联合提出共同候选人
1969	5.1%	21.3%
1974	43.3%，49.33%	与社会党联合提出共同候选人
1981	25.9%，51.76% 当选	15.4%
1988	34.1%，54.01% 当选	6.8%
1995	23.3%，47.36%	8.64%
2002	16.18%	3.37%

资料来源：张台麟著：《法国政府与政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21—338页；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02—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了12年，但期间中断两年（1986—1988年）。1997—2002年，社会党实现再次执政。在第五共和国的总统选举中，法国社会党在多次闯进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后的1981年，第一次获得选举胜利，由密特朗当选为总统（1988年获得连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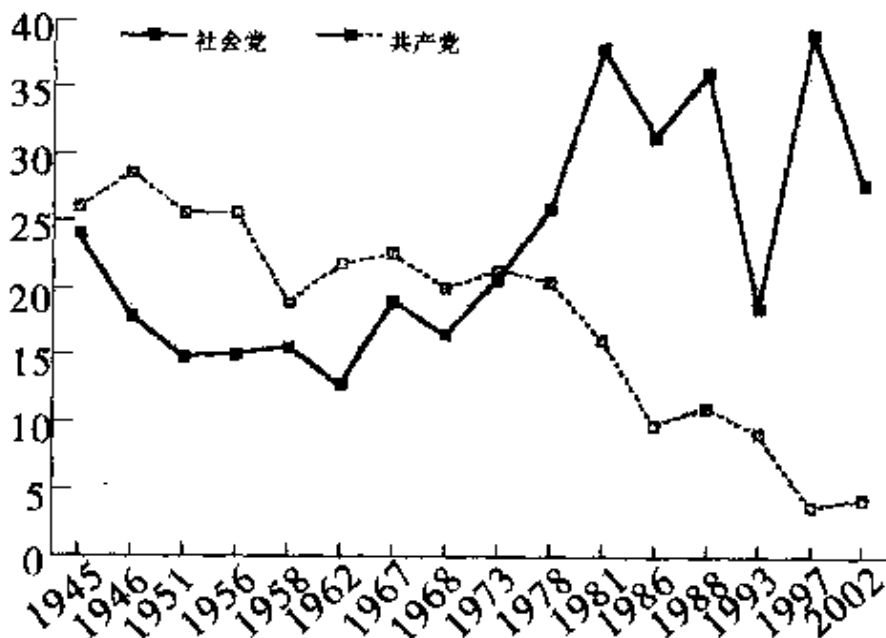
总之，战后法国社会党虽然在选举得票率和议席上起落不定，但多数时间里保持着20%左右的得票率和100以上的议席数。社会党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的多年执政、参政时间充分表明了它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强势。

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一直在25%以上；此后进入第五共和国的20年内，这一数字基本维持在20%以上，只有1958年例外，仅为18.9%。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立法选举（1981年），法共就呈现出一片颓势：得票率仅为可怜的16.1%，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法共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不仅再也未能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基本呈一路下滑趋势，大部分时间已经跌到10%以下（除1988年稍有反弹，达到11.1%），1997年及其以后，这一数字又降至5%以下。21世纪初的这几年，法共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也仅仅能够达到战后初期所获得票率的1/6。总之，从80年代之后，法共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呈现出节节败退的颓势。

从它在国民议会的议席数目来看，也有同样的趋势：1945—1956年的第四共和国内，法共在议会中所获议席一直在100席以上；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第一次选举，法共议席数遽降到10席；1962年开始逐渐回升，一直持续到1978年，这段时间内的议席数基本在70席以上，只有1968年的短暂回落是一个例外；1981年以后，法共的议席数目连创新低，到90年代，除1997年有一次强力反弹之外（上升到38个议席），其他时候只能勉强保留20多个席位；21世纪初的几年，法共议席不足50年前的1/6。

在总统选举方面，情况更是不妙。自1962年改革选举法以来，法共候选人始终未能进入第二轮选举，也就更不可能当选为总统了。除1995年比1988年多出1.8个百分点之外，在总统选举的第一轮选举中的得票率基本也是呈递减状态。2002年法共的得票率更是达到历史上的最低，居然不到5%，甚至落后于一个邮递员身份的候选人——一个极左翼小党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发言人。

表 3：1945—2002 年法国立法选举选票得票率的坐标图



资料来源：凯特·胡德森主编：《1989年以来的欧洲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欧洲左翼？》，伦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第85页。

当然法共的执政参政时间并不完全由以上的选举结果决定。战后法共在1947年之前曾参加过临时政府，在1981—1984、1997—2002年曾参加法国社会党的两次联合政府，之后就再也未能进入内阁，当然更没有机会单独执政。

比较两党战后的政治参与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党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表3坐标图直观地表现出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前，即使是自1947年起，法共没能够进入政府，但仍能够拥有比社会党更高的得票率，在议会中占据相当有影响力的位置；而这一时期社会党却能够在政府内担任职务，甚至组织内阁。到了70年代，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立法选举中得票率非常接近，前半期是共产党稍微领先，后半期是社会党占据优势。在1973年立法选举中，社会党首次超出共产党的席位，从此以

后社会党比共产党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整个80年代，社会党一直作为法国的主要执政党之一，而同期的共产党却如廉颇老矣，江河日下，在政治参与方面再也没能与社会党并肩了。因此，就两党政治参政的事实而言，战后社会党始终比共产党占据着政府参与的优势。共产党在占据了30年的议会参与优势后，也无奈地输给了社会党。

二者在参政方面的较量从地方选举中也可以有所觉察。在战后头30年里，法国共产党一直能够在市政选举中超过社会党，并且保持自己在某些地区长期的执政地位，形成“红色地带”，如巴黎的近郊地区。但自从1977年市政选举中首次败给社会党之后，法国共产党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两党在法国地方选举中得票率的走势，与表3所显示的同期国家级立法选举中得票率的走势是基本吻合的，即社会党的得票率基本上一直保持在15%—20%之间，而共产党则只拥有10%左右的得票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地方选举中一直有着为对抗右翼势力而密切合作的传统，无论在稳定程度还是持续时间上都比两党在国家级联合的情况好得多。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参与比较

与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不同，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民主制国家，所以国家级选举中直接选举出政府的议会选举（众议院选举）就显得最为重要，政党在众议院中所占议席的数目就可直接体现其政治参与的程度。从我们对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历史考察可以知道，战后，从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也曾经有过较长的参政历史。另外，后冷战时期的意大利左民党和重建共分别代替原社会党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参与。所以，我们把它们的选举情况都一并考虑进来。表4、5、6直接展现了几个党在战后几十年里的政治参与状况。

表 4：1946—2003 年意大利传统左翼政党立法选举
(众议院选举) 中的得票率统计表

选举时间	意共产党	意社会党	意社会民主党	意左翼民主党	意重建共
1946	18.9%	20.7%			
1948	30.7%	22.5%	7.1%		
1953	22.6%	12.7%	4.5%		
1958	22.7%	14.2%	4.6%		
1963	25.3%	13.8%	6.1%		
1968	26.9%	14.5%			
1972	27.2%	10.7%	5.4%		
1976	34.4%	9.6%	3.4%		
1979	30.4%	9.8%	3.8%		
1983	29.9%	11.4%	4.1%		
1987	26.6%	14.3%	3.0%		
1992		13.6%	2.7%	16.1%	5.6%
1994		2.2%		20.4%	6.0%
1996				21.1%	8.6%
2001				16.6%	5.0%

资料来源：凯特·胡德森主编：《1989年以来的欧洲共产主义：走向一个新的欧洲左翼？》，伦敦：圣马丁出版公司，2000年英文版，第100页；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01—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3页。

表 5: 1946—2003 年意大利传统左翼政党参与政府状况一览表

政党名称	参政时间
意大利共产党	1946.7—1947.5
意大利社会党	1963.12—1968.6, 1968.12—1969.8, 1970.3—1972.2, 1973.7—1974.10, 1980.3—1983.4 其中负责组阁时间是: 1983.8—1987.3, 1992.6—1993.4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1954.2—1957.5, 1958.7—1959.2, 1962.2—1963.6, 1963.12—1968.6, 1968.12—1969.8, 1970.3—1972.2, 1972.6—1974.10
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1996.4—2001.5 组阁
意大利重建共	1996.4—1998.10

资料来源: [法]热纳维埃夫·比布著:《意大利政党》,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版, 第231—234页。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中有关意大利选举内容,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年出版。

由于战后大部分时间里, 意大利实行单纯的比例代表制, 政党得票率与议席比例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表4中只列出了得票率的数

字。通过表4、5，我们可以对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政治参与状况做出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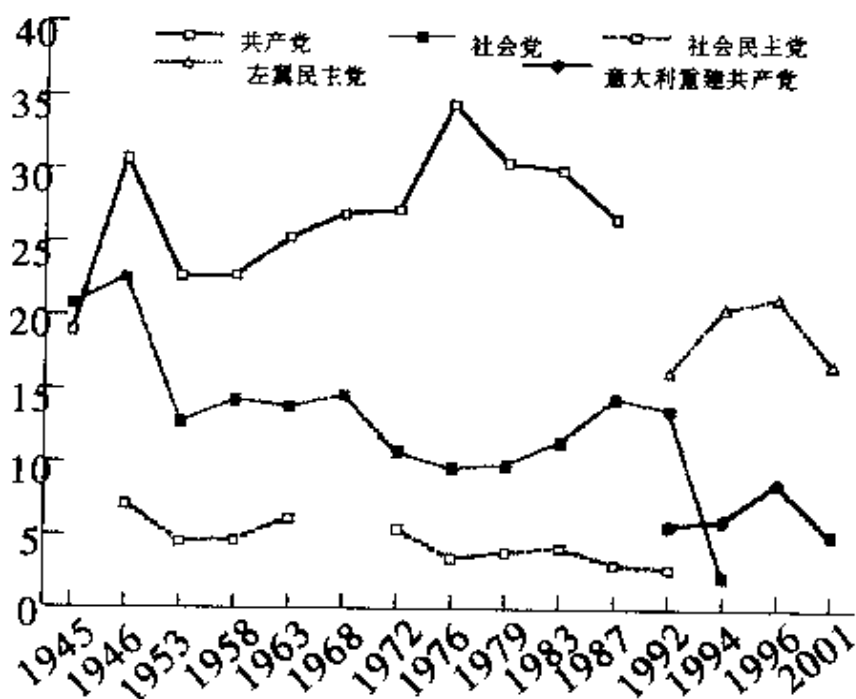
战后初期，社会党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党的得票率下降幅度比较明显，其后的整整20年时间内，社会党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一直徘徊在10%—15%之间；到70年代，这一数字已经下滑到不足10%；进入80年代，社会党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略有回升，基本维持在10%—15%之间；然而，进入90年代，情势又急转直下，1994年社会党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一下子锐减到2.2%。此后，立法选举中再也找不到社会党的身影。与社会党比较起来，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更为弱小，在战后的立法选举中它始终未能得到超过8%的得票率，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下降到5%以下。到1994年第二共和国选举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消失。后冷战时期，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占据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位置的是意大利左民党。左民党在第二共和国的头两次立法选举中（1994和1996年立法选举）都获得了20%以上的选票。在2001年立法选举中，左民党的得票率略有降低，但也在15%以上。

从执政和参政时间看，意大利社会党在1963—1973年间曾参与天民党政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获得组阁机会。社会民主党也分别在50、60、70、80年代参与过政府，但从未获得组阁机会。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意大利左民党曾在90年代后期领导中左联盟组织政府。总之，战后意大利社会党（包括意大利社会民主党）虽然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是很高，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它始终能够得到参与政府的机会，甚至屡有执政的经历。

战后初期，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1946年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为18.9%，1948年由于被排挤出政府，获得大量

同情票，得票率遽升到30.7%；在此后的20多年里，意共的得票率一直在20%以上的基础上平稳上升，在1976年的立法选举中，意共创下战后参与立法选举所获得票率的新高，达到34.4%；但是到了峰顶之后，从1979年开始其该票率出现了不断跌落现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1年改名为左民党为止，但是这一期间的意共得票率仍能维持在25%—30%之间。第二共和国时期，继承意共政治衣钵的意重建共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始终较低：十几年来，除了1996年曾经最高达到8.6%之外，其余时间基本上一直在5%上下浮动。就执政与参政情况看，意共在1947年被赶出政府之后，就始终没有能够再允许获得执政的机会；后冷战时期的意重建共曾经参加中左联合政府中，但很快因政见不合而退出。

表6：战后意大利左翼政党立法选举得票率坐标图



资料来源：根据凯特·胡德森主编：《1989年以来的欧洲共产主义：走向

一个新的欧洲左翼?》，伦敦：圣马丁出版公司，2000年英文版，第102页的图7.2修改、补充。

表6动态地显示出战后意大利各左翼政党的立法选举得票率情况。从中我们直观地发现，长时间里意共的议会影响力比社会党大得多，但是这与两党的执政参政情况是很不符的。社会党一直能够获得参政和执政的机会，而意共虽然能够在长时期内都能获得25%以上的选民支持，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但是却不能实现其执政的夙愿。即使获得30%以上的选票支持，意共也没有获得执政的机会。只有当意共彻底地改弦易辙，转而投奔社会民主主义的阵营后，它才迎来执政机会。

应该说明的是，意共虽然始终未能在国家级别内获得执政参政机会，但是在议会内部，意共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它一直扮演着“永久的反对党”的角色，这种反对党角色的作用由于联合政府自身存在的内部纷争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如果与社会党的作用加以比较，其作用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党在1956年与共产党开始疏远之后就寻求与天民党的合作，从1963年到1983年间成为天民党主要的执政伙伴。但是由于它既不能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更不能促使天民党实现社会党自己的政治主张，反而不如意共作为反对党的影响力大。意共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高涨的得票率，而成为天民党非正式的执政联盟伙伴；因为如果意共在议会中投反对票，那么政府就会立即垮台。另外，战后意共在中部的红色根据地等地区的行政机关里也可以长时间获得执政机会，取得了很多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权的位置，主管许多重要的委员会、公共机构，得到有重要政治性质的职务。相比之下，意大利社会党真正登上意大

利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是从1983年开始的。这一年，克拉克西出任政府总理。在随后的4年中，克拉克西有效地领导了自50年代中期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作为主要执政党，在意大利的国家机构中大举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大量社会党人由此获得了高级行政系统、半国营集团和视听媒体的重要职位，以及由于参与行政当局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传统交易，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商界的支支持。可见，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意共的政治参与能力并不比社会党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更强，只有到80年代，意共才开始处于衰退阶段，社会党也才开始有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通过对法、意两国的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参与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社会党一直比共产党拥有更强的执政参政能力，但是在战后很长时期内，共产党在议会中的议政影响力是远远超过社会党的。总的来说，社会党在战后的政治参与度持上升态势，而共产党则持下降态势。从得票率和执政经历这两项最重要的衡量尺度来看，社会党已经成为法、意两国主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共产党在两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则呈现边缘化趋势。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动员比较

政党社会动员主要指政党利用组织教育、培训和宣传手段，鼓励和引导社会大众加入、支持、声援该党等等。社会动员的效果主要表现在政党吸引党员的人数多少、建立外围组织的众寡等方面。另外，社会动员还包括政党整合自身等方面的内容。因为，政党内部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组织结构，直接影响着政党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的效果。依据迪韦尔热的理论，社会党与共产党作为出身于工

人阶级的政治力量，都是属于群众性政党。善于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以社会动员来增强自己的政治影响是它们的一个典型特征。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动员比较

战后的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党员人数、组织方式和外围组织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党员人数

战后初期的1947年，法国社会党只有35万党员；之后20多年时间里，受各种因素影响，社会党党员人数不升反降。到20世纪60年代，缴纳党费的党员已经跌落至不超过8万人。70年代初，新社会党成立，并与共产党结成联盟，党员人数才开始稳步回升：1975年上升到15万人，1981年则上升到20万人。在整个80年代，社会党的党员人数就一直徘徊在17至20万之间。进入90年代以来，受西欧范围内“右转”的政治气候的影响，社会党党员人数再也没有超过12.5万人。^①

1947年，法国共产党拥有90万党员，达到历史上党员人数的最大规模。在之后的冷战氛围中，法共的社会动员进入一个困难时期。1957年党员人数降至33万。不过，比起同期社会党的人数，法国状况仍要乐观得多。20世纪60年代初，法共的力量和影响在社会公众中开始提升。不过，1968年5—6月的群众运动和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一度引起法共党员的思想混乱，党员人数再次下探到30

^① 数据来源于[法]让·马雷、阿兰·乌普著：《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7—208页；黎原编写：《法国社会党第七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简介》，《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21页。

万左右。在五六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共人数基本上就一直徘徊在30—40万之间。直至70年代，法共人数才开始再次缓慢回升，1978年达70.5万人。但是，从1985年开始，法共党员人数再一次震荡探底，1990年为58.5万人，1995年为50万人，2002年则下降至不足14万人。^①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党员人数都是几经沉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然在总体上，社会党与共产党党员人数都是趋于萎缩。不过，共产党党员人数的下降速度远远赶不上社会党，人数也比社会党相对多得多，基本上是3—4倍。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党员人数都开始反弹，但是共产党的人员增幅明显地不如社会党。进入80年代中期，共产党党员人数迅速下滑。到21世纪初，法共所剩党员人数不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员人数的1/5。而80年代是社会党人数继续增加的时期，但在绝对数上一直不如共产党，到90年代社会党人数也开始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仍是低于同期共产党党员人数的下降幅度。21世纪初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党员人数上终于达到基本上持平的地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形式不同，这些数据可能会掩盖一部分真实情况。社会党实行的是相对松散的组织形式，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则严密得多。对于共产党来说，党员只要进入共产党，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退党，而一旦退党，则一般不会再次加入。而对于社会党来说，党员入党和退党则表现出相对随意性。所以，虽然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及其变化在一

^① 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http://www.pcf.fr>，法国共产党网站。

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党社会动员的效果，但是对两党在这方面的比较，还需要结合其他变量如政党外围组织的建立的情况等一起分析。

（二）外围组织

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拥有一些外围组织，主要是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随着冷战爆发，社会党的主要外围组织就是于1947年、1948年从总工会中先后分裂出去的“工人运动”派与铁路、邮电两个独立工会组成的工人力量总工会。另外全国教师联合会、高级职员联合会、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原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和其他一些工会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属于社会党的支持者。除此之外，社会党还极为重视在青年、企业和学术团体中做工作。这三个社会群体都有自身单独的组织并遵从社会党的统一领导，例如青年社会党人运动就是这样一个组织。青年社会党人运动组织的成员年龄一般在15—28岁之间，其内部运行规则需经过社会党的全国理事会批准。为了使党和青年社会党人运动的行动保持一致，当选为青年社会党人运动的负责人有充分的权利在其负责的群体中协助社会党的有关机构进行工作。另外，在争取妇女组织方面，社会党也一直不遗余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法国社会党在1997年向女权运动者开放，主张男女平等思想，强调女性参政的权利。如若斯潘政府中就有8名女性，占政府成员总数的1/3，其中5名是部长，1名是部长级代表，另2名是国务秘书。总之，法国社会党一直试图通过在青年、妇女、企业、学术团体等社会群体中进行社会动员，使党的联系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与社会党相比，战后的共产党有着一整套更加完善的外围组织制度。它不仅系统地建立了一个“领导核心”，而且还掌握了各种社会的和职业的组织。1969年10月出版的《东西方》杂志曾公开发表

过一份受共产党控制的几百个社会外围组织的一览表，^①足以见法共当时对外围组织掌控的范围之广。例如，法共控制的青年组织就包括法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法国女青年联盟、共产主义学生联盟，以及法国农业和农村青年联盟，等等；在妇女组织方面有法兰西妇女联盟等。在国民教育方面，共产党也控制了几个属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工会，不过，法共却未能控制教育界最大的外围组织——全国小学教师工会。在农业方面，它控制了保护家庭经营运动，这个组织在法国的中部和南部很有基础。另外，法共还控制了租赁人联盟、工人体操运动联合会以及其他无数个文化和娱乐组织。在所有法共掌握的外围组织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国总工会，它一直是支持法共的坚强后盾。

集中体现左翼政党在外围组织方面社会动员效果的是工会组织，应该说，在战后的头30年内，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比支持社会党的几个工会组织的力量更为强大。那时法国总工会拥有会员200多万人，而其他工会组织加在一起都不到100万人。但是，近20年里，法国工人人会率大大下降，仅为7%，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总工会会员人数降到100万人。支持社会党的几个工会组织力量虽然也有所下降，但是工人力量组织有70多万人，法国工联有80多万人，全国教联有30多万人，全国高职联有15万多人。^②这样看来，从80年代开始，共产党在工会的优势不再明显。到90年代，虽然法国总工会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但是支持社会党的各工会组织的力量相

^① [法]弗朗索瓦·博雷拉著，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今日法国政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页。

^② 《国际工会运动知识手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355页。

加，已经可以超过总工会的力量与影响。80年代之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对工会控制的一个共同趋势是，它们利用工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大大减弱。事实上，在近20年里，许多外围组织如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如同工会组织一样，出现了独立倾向，与两党关系疏远的态势非常明显。

就社会动员而言，在战后最初的30年里，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外围组织的控制力，共产党总体上都要强于社会党。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大为改变。共产党不仅党员人数快速下降，而且对外围组织的控制力也急剧削弱，而社会党虽然对外围组织的控制力也减弱了不少，却仍称得上迎来了一个相对兴盛的重要时期。

（三）组织形式

战后，法国社会党使用的是一贯具有的广泛民主组织原则，承认思想上不同流派在党内的存在，承认各派别在党内的强大组织和在执行委员会中拥有的相应的比例代表权。20世纪60年代末，新社会党章程改变了这种作法，明确规定“党内完全有讨论自由，但是任何有组织的倾向都是不容许的。”不过，章程同时又规定“在各级党组织的选举中要最坚决地贯彻比例代表制原则”。^①所以社会党内始终存在各种公开的派别，各派都有自己的渊源和领袖，有自己的立场和战略。如20世纪80年代有密特朗派、罗卡尔派、舍韦内芒派和莫鲁瓦派等等，90年代有若斯潘派、法比尤斯派、奥布里派、罗卡尔派、莫鲁瓦派、德洛尔派、埃马纽埃利派和梅尔马兹派等等。另外，社会党权力高度分散，地方组织的自主权较大，甚至中央的指

^① 陈露译：《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声明和章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2期，第30页。

示决策往往受到地方上的阻碍，很难顺利地贯彻实施。

与组织原则相适应，社会党采取党分部的基层组织形式。党分部一般以地区中的市、镇、区为单位。它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吸收党员，壮大成员队伍上，对各种入党的条件只是做一般原则性的规定，而不是严格地执行。它的特点是向所有人开放，领导者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体现了民主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党没有组织纪律性。它的组织纪律性表现在各级议员的候选人一般是自上而下委任的，各级领导一般要经过党的专门培训机构的训练，党员及党的活动分子一般遵守党定期的活动制度。

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在组织原则和方式上表现出既要党内民主化，又要团结统一的倾向。一方面，法国社会党加强党内民主，扩大党员的参与决策权。例如1997年，社会党把党的第一书记的产生由原来的全国委员会选举改为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党的决议也交由全党表决；同时广开言路，就重大时事问题直接征询党员意见；要求党的全国领导机构每年要向党的基层支部书记做工作报告，增加上下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它倡导建立党内各派协调机制，强调党内团结。例如1995年，社会党在若斯潘的领导下积极着手整顿党的组织，再次加强同党的基层组织的联系。再如2003年法国社会党七十三大上，整顿党的组织仍是大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大会决议提出：“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党”，使“每一个基层党员都应该充分地参与决策。这样，通过民主所采纳的决定就会把全体党员团结在一起。全国理事会应该成为党内真正的议会。”^①

^① 黎原编写：《法国社会党第七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简介》，《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21页。

战后，法国共产党长期奉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是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中明确规定的，也一直被法共长期严格使用着。如法共二十三大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确定党内生活准则的基本原则”。^①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全党的意志统一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特征，因此法国共产党内是不允许有任何派别出现的；对于党内持异见者往往是以开除其党籍为结局，如法共在波匈事件后对表示不满苏联做法的亨利·勒费弗尔和安尼·克里热尔被开除出党，就是一个例证。在这种组织原则指导下，法共采取的是党支部的基层组织形式。这种党支部主要是以职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当然也存在地域上的党支部。就规模上说，党支部比党分部更小。这两种特性使共产党的基层领导者比社会党的更容易控制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也更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法共随着推行以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欧洲共产主义”，在党内开始重视民主与监督，党内也渐渐出现一些事实上的派别，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改革派、正统派、革新派等的不同声音一直存在。冷战结束后，通过激烈的辩论，1994年法共二十八次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正式宣布放弃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强调集体领导，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独断专行，主张党内生活的民主、自由和多样性，认为党内应有充分思想和言论自由，党内生活的多样性不仅可以被容忍和接受，而且应当承认它是一种财富。同时通过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法共不再强调传统支部的作用，也不再对党员参加基层支部活动作硬性规定。法共提出，根据当前社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附录《法国共产党章程》（1979年通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会的变化，除支部外，党员也可成立其他形式的集体组织来开展活动，并可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可见，冷战结束后法共正在努力消除党内的“集中”气息，试图做到开放与民主。法国的两类左翼政党自分裂时起就有着明显不同的组织特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之后，第一次有了几乎相同的组织方式和原则——广泛的民主。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动员比较

我们依然从两党的党员人数、外围组织以及组织方式上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两党在社会动员方面的异同。

（一）党员人数

战后，意大利社会党党员人数一直是变动不居的，但波动不是太大。1947年，其党员人数达82万多人；1949年党员人数下降了一半左右，只有43万多人；此后20年里没有太大变化，基本保持在40多万人；1963年社会党员人数为4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为15万多人；两党合并后，1967年的党员人数达到63万多人；到1983年社会党人数为54万多人，社会民主党人数为20万多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社会党达到60万党员的水平，社会民主党却急剧下降；到1991年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为10万多人；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政局的大动荡过后，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崩离析，代替它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左民党的党员有近80万人。

与社会党相比，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众多，并且有着大起大落的特点。在1944年，意共党员仅有50万人；到1954年，猛增到214万人；之后人数大幅度下降，仅1956年就有30多万人脱党；经过十几年连续下滑，到1969年还有119万名党员；1972年党员人数上升到171万；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又一轮波动，到1989

年还剩下143万人；90年代之后，继承共产主义传统的意大利重建共大约有12万左右的党员。

从意大利社会党（包括左民党）和共产党（包括重建共）的党员人数上看，战后的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可称得上是群众大党。但是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实力有较大的差异，很长时间里共产党的力量是社会党的两到四倍！这种情况在后冷战时期发生了逆转：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左民党的党员人数是坚持共产主义性质的重建共的六七倍。从党员人数的变化来看，社会党与共产党有不同的升降时期：社会党在冷战初期党员人数骤降一半，而同期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则骤升4倍。此后共产党衰退十几年，社会党没有什么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意共上升时期，社会党则处于衰退期。在80年代社会党迎来回升时期，意共却走向衰落。90年代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意重建共比冷战时期的共产党的力量弱小得多，而此时原意共的“变质”使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势力大增，是战后力量最强大的改良社会主义政党。总之，两种性质的左翼政党在战后的党员人数上基本是处于一种你得我失、此消彼长的状况。

（二）外围组织

战后，意大利两大左翼政党都重视对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实行控制与加强关系，并把它们作为增强自身力量与影响的有力工具。意大利社会党的外围组织主要包括：约2万多人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拥有150万人的意大利劳工联盟中60%的力量，和约有450万会员的意大利总工会中15%的力量。其中劳工联盟的总书记一般由社会党人担任，如20世纪80年代末其总书记就是由社会党人焦尔焦·本维努托担任。至于社会民主党，“它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是一个搞政治宣传的

党”。^①因为社会民主党自成立后，始终未能摆脱诸如知名人士在党内占主要地位，中央领导不能制约省级领导，缺乏地方和企业支部等特点。这些都说明它是一个权贵式政党，而不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即使它在1950年建立了三大工会的劳工联盟组织，它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仍远不如社会党。当然，社会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劳工联盟中的控制力。

战后，与社会党相比，意共不仅拥有众多的党员，还控制着更多的工会等外围组织。意共是通过自己党员在工会中的活动来对工会施加影响、控制的。在意共具有70%以上控制力的意大利总工会(全国最大工会，曾经一度拥有约470万会员)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许多是意共党员，如1988年当选为总工会总书记的就是共产党员布鲁诺·特兰廷。除了工会之外，意共还建立了大量的其他外围组织，如共青团、共产主义妇女联盟和农民联盟等都直属意共。另有一些组织则由共产党和社会党共同管理，但是实际上，社会党只起十分次要的作用。这些组织，名目繁多，有经济性质的，也有文化性质的，从农业合作社(在艾米利亚-罗马地区，这种合作社很多)，到负责人民之家(单是在托斯卡纳区就有1300个)的“意大利文化娱乐协会”，都属于这一类外围组织。^②意共对外围组织的控制力与它庞大的党员队伍密切相联，在那些组织的领导层甚至是基层会员，往往都有着数目众多的意共党员。在这一点上，社会党是无法比拟的。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意大利总工会、共青团和妇女

^① [法]热纳维埃夫·比布著：《意大利政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② 同上，第40页。

联盟在内的外围组织对意共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共青联盟声称要彻底破除对共产党的“驯服工具论”；总工会宣称它“不再是党与群众之间的传送带”，“不再以党的路线为工运的指针”；妇女联盟也由于女权主义思潮占据组织的上风，很难起到党的助手的作用。^①因此，70年代之后，意共对外围组织的控制能力走上了下坡路。即使工会组织在80年代之后仍能保留45%的入会率，但是由于工会本身的独立性的增强，加上意共党员人数下降，其中包含着多个外围组织的会员退出意共，这一时期意共的社会动员能力大为减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85年意大利举行关于浮动工资的公民投票，意共和意大利总工会多数派坚持贝林格生前主张的反对取消浮动工资的立场，投票结果竟然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总工会多数派的得票未能过半数。但总的来说，在冷战时期，共产党一直有着比社会党更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冷战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左民党）和共产主义政党（重建共）的社会动员状况发生了逆转。虽然左民党刻意放弃了意共战后一直维持的“存在于意大利社会”的战略，但是先前意共的刊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纷纷宣布独立，各群众组织如工会、青联、妇联等也相继独立。由于经费、人员和惯性等原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与左民党之间密切的关系。因此，后冷战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了冷战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较好的社会动员能力。反之，原意共少数派成立的重建共周围基本看不到多少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在增强社会动员的道路上重建共仍面临诸多困难。目前在支持

^① 中联部研究室编：《外国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左翼政党的民众中，大多已将左民党看作是他们的利益代表，重建共的社会动员能力远无法与左民党相比。

（三）组织形式

在传统上，意大利社会党权力分散、整合无力，组织形式十分混乱。战后社会党内的多次分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47年，社会党右派分裂出去成立社会民主党，1964年，社会党左派分裂出去成立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甚至在1966—1969的短短三年时间内，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就完成了一次从分裂到合并再到分裂的轮回；1989年初，社会民主党内部又有一部分人分离出去，自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联盟”，1994年，社会党再次公开分裂为“意大利社会党人”和“改良社会主义党”等几个弱小的政治组织。至此，社会党永远地退隐出人们的视线。冷战结束后，接过了社会党政治衣钵的左民党虽然从党的基层组织到上级机构，仍保留了一些原意共的组织痕迹，但采用的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广泛民主的组织原则，而不是意共的民主集中制。左民党政治决策的“多数”准则的基础是充分承认不同政治观念合理并存的多元主义立场。在不与党章前言中所体现的原则与价值相冲突的前提下，它允许在党内存在不同思想观念、政治立场及派别组织，允许各家各派以及党员个人在党内建立活动中心，创办刊物，组织大规模集体文化政治活动。^①目前，左民党内部各种派别组织五花八门，尤其是在1998年左民党与原民主社会主义的几个小党合并之后，党内派别林立的趋向更加明显。

战后意共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同时，还关注这一组织原则中的

^① 金太军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南欧诸国》，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5页。

民主含义。1956年意共八大在党章上首次列出“党的内部生活和党的民主”一章，增添了不少关于发扬民主和保证集体领导的规定。1983年十六大宣布民主集中制不是意共的意识形态特征，而是党内生活的方法，强调发展民主，精简组织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等。1989年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意共自建党以来一直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转而使用党内民主的原则。冷战结束后，意重建共也宣称推行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但可以说，重建共丝毫没有要恢复民主集中制的意图和考虑。重建共最终放弃民主集中制的这种做法，也使得意大利“革命”与“改良”两种性质的左翼政党在组织形式和原则上有了很大的相似性。

就社会动员而言，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即20世纪80年代之前，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和外围组织都明显比社会党占据优势。共产党具有集中特色的组织形式和原则有助于自身对党员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而其与外围组织之间则更多地带有隶属或类似于隶属关系的性质。从资料显示看，在战后的前半期，共产党在社会动员方面比社会党更富有效果。但是自80年代之后，共产党的党员人数逐渐减少，外围组织也纷纷独立或者会员减少，社会党在这些方面相对地受损较轻。另外，在组织形式和原则方面，战后初期，人们一直认为民主集中制更有助于发挥党的政治影响，毕竟它曾帮助共产党度过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一段艰难困苦的地下斗争时期。因此，共产党一直对其民主集中式的组织形式和原则重视有加。但是到七八十年代之后，共产党却越来越多地淡化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色彩，强调民主的内涵，这与此时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是一致的。同时，社会党使用的广泛民主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也越来越受到党员的青睐，也更能吸引普通的民众。总之，共产党

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优势在战后逐渐地减弱，表现为法国共产党不如法国社会党、意大利重建共不如意大利左民党。

小 结

通过对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力量与影响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根据战后两类左翼政党在政治参与、社会动员方面的比较，二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力量与影响在不同阶段有很大不同。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产党凭借它占1/4强的选举得票率稳占议会大党的头两位。共产党在议会内强大的议政能力和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得它不论是作为单纯的反对党还是处于支持政府的立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必须与作为左翼领袖的共产党进行协商与妥协。这时的社会党即使参加政府，其综合性的政治影响力仍不能与共产党相比。80年代之后，社会党成为可以与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唯一的左翼政党，被认可为国家主流政治力量之一。共产党则在选举得票率、党员人数和外围组织的各个方面迅速衰退，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随之下降。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已经衰退为处在政治生活边缘地带的一个小党，甚至不能再稳居左翼第二大党的地位。

第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发挥政治作用的方式不同。社会党发挥政治作用的方式主要是执政参政，其次是作为在野党时的议会议政，最后才是通过社会动员达到政治目的。社会党不仅长时间里做过执政党的合作伙伴，而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为主要的执政党之一，并在这一地位上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即使处在在野

党的地位，社会党也习惯于利用议会党团的力量进行议会斗争以参与政事。至于建立和掌控外围组织，社会党往往只是把它作为增强自身力量和发挥政治影响的辅助手段。与此相反，战后的共产党最多只参加过短期的左翼联盟政府，始终未能得到充足的机会向公民展示它的执政参政能力。通过议会斗争、组织动员和发动外围组织的途径来增强自身力量和发挥政治影响，就成为共产党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就战后的发展演变看，随着共产党力量的衰退，执政或参政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议会内斗争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即便是组织党员和发动外围组织的能力也在降低，共产党也只能寄希望于利用这两种越来越有限的方式来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自己的影响了。

第三，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政治命运的起伏升降既有同期性又有异步性。从战后两党的发展轨迹来看，社会党与共产党先是长时期的患难与共，然后是迅速的分道扬镳。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两党在具体的党员人数、选举得票率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它们发展的方向却是基本相同的，同升同降，但升降的幅度并不相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党的发展方向不再是相同的，而是基本相反的——社会党升，共产党降。当然不排除一些短时期内，两者也会出现升降一致的情况，如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几年时间里，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呈现出衰势。

完成对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力量与影响等方面的比较后，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即二者异同演变的角度，对前文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和说明：

首先，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重建，以及在80年代成为执政党这种政治角色的根本转变，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在战前保留的

传统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特性几乎完全化为乌有，如完全丧失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替代的奋斗目标，明确宣布自己改良主义的立场以劳动者阶级性质代替了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把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看作是解决现实中经济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之一，与“膨胀”、“紧缩”等政策交替、轮流地使用，而不再认为这些政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意义。虽然受其他西欧社会党的影响，战后法、意社会党内部很早就出现这种转变的倾向，但是在法、意这样革命传统深厚的国家里，社会党发生的这种与自己出身决裂的转变是在最近的20多年内逐渐完成的。战后，法、意共产党自产生之日就具备的诸多特征也已经逐渐消失殆尽，如暴力革命被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更换成为对以普选制、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的承认，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和原则变成了广泛民主制，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改成了全体劳动者的代表者，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论替换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思想多元化。其原有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浓重的苏联布尔什维克色彩，并曾长期被认为是革命性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剔除了这些特征的共产党，与社会党（尤其是与过去保持一定革命特性的社会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其次，虽然社会党发生右倾，但是它只是完全抛弃革命性主张，却没有改变它的左翼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尽管共产党发生右倾，并且出现“社会党化”现象，但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替代和共产主义信仰依然是共产党痴心未改的伟大理想。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国有化运动，坚持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社会福利制度，正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政策层面的具体表现，坚持发动群众运动或公民干预依然表现出共产党斗争手段中的某种

激进色彩。所有这些表明，两党自20世纪20年代由于改良与革命之争而分裂，至今仍然分别代表改良社会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两大左翼传统。

最后，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战后初期，共产党与社会党作为代表两大左翼传统的政党，共同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并且出现共产党相对较强的特点。但是，随着社会党呈现逐渐壮大的发展趋势，共产党的相对优势逐渐缩小。从80年代开始，社会党演变成为主流政治力量，共产党则在政治生活中日趋边缘化，改良与革命两大社会主义支派的力量已经不再是均衡的。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共产党的表现已经充分说明，革命性的共产党虽然只能保持较小的规模和势力，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不会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而消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类政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力量与影响上有如此的异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异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政党自身的主观原因并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因为法共的转变一直是被动迟缓的，而意共则主动灵活得多。但是冷战后两国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命运和政策主张却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所以我们认为战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异同的根本动因应该是：战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政党所处的客观存在的发展空间和生存基础——这两个方面构建了政党生存发展的时空场域。

第五章

扶持与限制：战后社会党 与共产党发展空间比较

政党发展空间是指政党进行特定政治理论和实践活动而被允许的自由程度和范围，以及外围政治环境背景。对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来说，政党发展空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内方面，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限定的一些“游戏规则”，这些制度性规则为两类左翼政党自主参与国内政治生活划定了范围；二是国外方面，即战后出现的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冷战之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环境。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直接影响并限制了法、意的左翼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发展空间。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国内制度空间比较

战后，为了彻底杜绝法西斯专政独裁的政体给国家和人民再次带来灾难，法、意等西欧国家普遍完善了以议会作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政体。新的政体以民主、自由原则为基础，以定期普选制、多党轮流更迭的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虽然表面上这种政体主张各种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公平、合法的选举获得政权，但是在这种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体制中，不同的政党所获得的制度空间（主要由议

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组成)并不是相同的,或者说,相同的政治制度却对不同政党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国内制度空间比较

战后,法国经历了政治体制迥然不同的第四、第五两个共和国。由于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重大变化,而且这也是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发展演变最充分的时期,所以比较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空间,主要集中于第五共和国时期进行,当然,也会部分涉及到第四共和国时期与主题相关的一些情况。

(一) 第五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制度改革

通过公民投票,议会在1958年批准了由戴高乐将军主持的新宪法草案,法国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在随后的几年内,法国进行了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对社会党与共产党是否具有显著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探讨以下两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第一,国家的政治体制从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转变为半总统半议会制。首先,突出了总统的地位。1962年公民投票通过的以普选产生总统的制度使总统能够完全摆脱议会的控制,自此,总统代替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其次,加强了政府的作用。第五共和国不仅规定了政府由掌握实权的总统任命和组织,而且对议会的信任投票、政府的监督方式、倒阁方法都做了严格的限制,从而使政府处于大大优于议会的地位。再次,1958年宪法弱化了议会的权利。改革后议会的权力主要集中在立法权、财政预算表决权和监督政府权三大方面,政府“回收”了议会手中的某些行政权力。

第二,1958年宪法对选举制度做了大的调整。最大的变革是废

除了比例代表制，开始实行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的选举法。按照这种选举制度，在议会选举中，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议员，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要获得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第一轮无人胜出，即进行第二轮投票。参与第二轮竞选的候选人要受到一定的资格限制，即只有在第一轮投票中得到一定有效选区票（从1976年起为12.5%）的候选人才可以参加第二轮的角逐。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符合这个条件，则第一轮中得票仅次于这名候选人的参选者可以加入到第二轮角逐；如果该选区所有候选人都不符合上述条件，则由第一轮中得票前两位的候选人参加第二轮竞选。在第二轮选举中，候选人只要获得相对多数选票即可当选。由于候选人人数众多，选票分散，很少有人能在第一轮中当选，第五共和国的议会往往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1962年总统选举法也采用了这种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规定如无人第一轮选举中以绝对多数形式胜出，那么得票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的角逐，获得相对多数选票者当选。

另外，在第五共和国期间，对法国左翼政党生存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制度改革，还有社会党政府对欧洲议会选举和省一级选举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政府为了“公正地代表选民的意志”，^①在欧洲议会选举和省一级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制。这种制度根据人口比例把议席分配到各个选区，各选区的党派提出本党候选人，选民根据名单投票，各政党按照在每个省获得的选票比例取得相应的席位，只要有5%的得票率就可以取得议席。1986年议会选举取胜的右翼多数派废除了省级一轮比例代表制，恢复了单

^① 吴国庆著：《法国当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但仍保留了欧洲议会选举的比例代表制。

（二）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改革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影响的比较

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改革不仅使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要重新适应一个崭新的制度性政治环境，而且为两类左翼政党建构了不同的政治空间，带来了不同的政治影响。

第一，第五共和国提高总统地位，扩大行政权力，限制议会权限的政治制度改革，大大削弱了政党的政治作用，尤其是大大地削弱了在野党的政治作用，限制了在野党利用合法的议会斗争对执政党进行抵制和监督的权利的发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政治制度改革对于法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无异于直接的打压。因为对于战后多数时间内作为在野党和反对党而存在的法共来说，发挥自己政治影响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就是议会斗争。削弱议会权力就是减少了占有多个议席的法共在议会内通过质询、辩论和投票等方式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掣肘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政治制度改革对社会党的影响却并不是太大。因为，社会党即使在野时权益受到限制，这种损失也可以通过参政或执政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大弥补回来。

第二，单记名多数两轮选举制度代替比例代表制的改革，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影响不同。戴高乐及其幕僚认为第五共和国实行新选举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第四共和国比例代表制的多党制度带来的政府更迭频繁、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是为了建立具有稳定性的议会左、右两大派，实现轮流执政。戴高乐及其幕僚认为，两大议会多数派必须是左、右两派，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所有的法国人联合起来”，^①而

^① [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著：《一九四〇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要真正地实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必须是降低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因为在一个议会里,如果有1/4的议员不遵守议会活动的规则,那么著名的左右派交替成为多数派就不可能了”,法国的右翼势力“因此必须减少阻碍整个制度运转的共产党的席位”。^①显然,执政的右翼势力把共产党看作是法国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威胁,而进行刻意地压制和削弱。同时,身为右翼的戴高乐及其幕僚出于培养不具体制威胁性的左派的目的,一直希望把共产党减少的议席补充到社会党那儿去。

为了压制共产党,戴高乐及其幕僚放弃了一轮多数选举制,转而使用两轮多数选举制。因为如果采取一轮多数选举制,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一个共产党候选人与四五几个非共产党候选人竞争时,会出现共产党候选人在这唯一的一轮投票中领先并取得相对多数当选的可能性,而如果采用两轮多数投票制,右翼和中间派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第二轮中形成一个反对共产党的联盟”,^②阻止共产党在选举中获胜,进而也就阻断共产党向议会或总统职位迈进的步伐。同理,使用单名投票制而不是分省名单投票制,也是为了限制共产党,让社会党等其他政治势力更有机会表现自己。因为,单名投票制使选举更多地要依靠政党候选人的个人魅力,而政党的社会动员优势难以真正发挥出来。这样一来,通过使用单名投票制的选举制度,共产党不仅很难发挥善于社会动员的优势,而且其候选人也会因政治上长期孤立而形象受到损害。另外,与共产党严明的

^① [法]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著:《一九四〇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② 同上,第350页。

组织纪律性相比，社会党相对民主化的组织形式往往允许不单单凭借政治威望和政治地位指标来选取政党的候选人；同时，社会党灵活多样的联合方式也帮助了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领先后，可以在第二轮中根据不同情况把左派或右派，甚至左右派都拉到自己一边，从而获得最终的胜利。由此看来，法国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改革使社会党成为受益者，共产党则成为受损者。

正如戴高乐及其幕僚所设想的那样，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的实施促使了法国的政党格局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在第二轮选举中，孤军奋战的政党几乎不可能获胜。政党只有结成联盟，共同支持一名候选人，使选票相对集中，才有可能成功。这种做法也就使法国各个党派纷纷向左翼或右翼集结，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政党联盟。正如莫里斯·迪韦而热所说，“两轮投票制能够促进联盟两元制的形成，在多党制中引进类似的两党制。”^①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个政党要么拱手把议会中占有席位让出，这样当然不可能拥有总统职位；要么与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政党或政治团体合作，结成选举的政治联盟。于是，共产党为对抗右翼，迫于无奈与社会党组成左翼联盟：从开始的选举联盟转向议会联盟，以及后来的执政联盟。但是共产党在制度的困囿下不得不进行的应时之举，却造成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那就是在联盟过程中抹杀了自己的许多革命特性，模糊了两党界限，从而帮助社会党成功地攫取了共产党的大量选民。这一标志性事件是在左翼联盟的第4年（1976年），社会党的选举得票率就一举超过了一直领先自己几十年的法国共产党。

^① 吴国庆著：《法国当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第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党政府推行的欧洲议会和省级选举的比例代表制, 使本已衰退的法共处境更加尴尬。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可以使政党格局趋于具有稳定性的两极化, 可以保障大党的既有权益, 而比例代表制则为法国政坛上的小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会。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 法国出现了一批新兴政治力量, 如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新左翼政党绿党等等。原先由于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的束缚, 这些新兴政治力量始终不能得到多少政治资源份额。80年代中期推行的比例代表制的改革, 一方面直接帮助这些新兴政治组织获得了更多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削弱或分散了传统政治力量的得票。例如198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按比例代表制进行, 除法国传统四大党进入欧洲议会外, 国民阵线异军突起, 因获得全部选票中11.07%的有效票而进入欧洲议会, 跻身于法国大党俱乐部。1989年法国绿党以同样的方式崛起, 其得票率比传统大党之一的共产党还要高。这些小党, 尤其是绿党的崛起对于已经持续衰退多年的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不仅绿党抢去了数量很多的左翼议席, 使得共产党不再能够保持传统的四大党之一的地位, 而且因社会党合作伙伴选择范围的扩大, 共产党原有的牵制力也相应降低了许多。1997年社会党联合政府中包括法共和绿党两个合作伙伴的现象, 说明了法国左翼阵营只有共产党和社会党唱“二人转”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与之相反, 这种比例代表制对于已经成为主要执政党的社会党来说, 虽然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同时也给社会党多了几个可以选择的政治合作伙伴。

另外, 第五共和国在一些政治领域内小范围的制度性改革, 大都选择在最不利于共产党的时机推行。即使像民主普选制的完善与

发展这样的改革也不例外。比如，一项关于法定选举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的法律，由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促使议会通过，并定于从1974年7月5日开始正式生效。这项改革已经得到法国政治家们很长时间的关注，却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个中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是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慎重行事的重要顾忌之一，就是这项改革可以使青年选民一下子增加300多万，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青年一直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害怕共产党会因此进一步发展壮大。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共产党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下降，1974年总统选举中各主要政党候选人才把这一改革写进自己的纲领之中，并由德斯坦总统上台后将此政治诺言兑现。^①

事实上，不仅第五共和国时期如此，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由于冷战形势的严峻和法共势力的高涨，这种对法共的制度性压制就已经表现得极为露骨：1946年，在制宪会议选举中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法共占据了最多的席位；1951年6月，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就改用了“联合名单竞选制”。联合名单竞选制规定，几个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可以声明结成联盟进行投票。当时法共受到政治孤立而无法与其他政党结成竞选联盟，只能单兵奋战。国民议会选举结束法共虽然获得了25.6%的选票，却只得到了16.4%的议席，法共的议席一下子从168席减到103席。可以说，这种选举办法其实是专门对付法国共产党的。但是，这种压制并没有完全阻止法共的力量继续增长，于是第五共和国又开始实行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结果共产党在1958年虽然获得了20%的选票，却只能够获得2%的议席。有人统计过，

^① [法]让-马里·科特雷、克洛德·埃梅里著：《选举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页。

如果使用原来的比例代表制，法共完全可以得到 87 个席位。^①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会得到以下的认识：首先，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获得的政治制度层面的发展空间截然不同。共产党一直遭受到政治制度上的种种束缚和压迫，而社会党得到的却是制度上的处处宽容和扶持。于是，在这种政治制度框架内，第五共和国的头 10 年里，法共代表 20% 多的选民，却最多只能在国会中占据不足 14% 的议席（1973 年），最少只有 2% 的议席（1958 年），而社会党代表不足 20% 左右的选民，却最多可以占据国会中约 22% 的选票（1967 年），最少得到 7% 的选票（1958 年）。当然，共产党只要生存在这种政体中，其受到的这种制度性的压迫就是无法抵御的。1958 年议会选举的惨痛教训就是明证。

其次，由于长期处于制度性的限制和压迫中，法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实践上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甚至不能发挥出选民希望的政治作用。长此以往，这无疑会沉重打击选民对共产党的信心，同时也增加了共产党自身的困惑与迷惘。左翼联盟时期社会党凭借与法共的合作，摄取了很多左翼选民，尤其是法共选民的信任。在当时，法共为了减轻制度性压迫造成的后果，寻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同社会党结成左翼联盟。20 世纪 60 年代，法共在第二轮选举中选择支持社会党人。这不仅令社会党人在此时期的总统选举中成绩斐然，也帮助本来已经四分五裂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树立了建立统一新党的信心。1969 年新社会党成立，左翼联盟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配合左翼联盟战略的实施，法共在宣传上强调与社会

^① [法] 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朔斯洛著：《一九四〇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64 页。

党的共同之处，在实践中谋求双方的妥协与合作。于是，在70年代，法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与苏联的疏远，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加入欧洲共产主义行列之中。同一时期，社会党为了与共产党合作，在纲领政策上也表现出一些激进色彩。结果，普通民众看到的是两党共同主张的社会主义目标，共同主张的和平的、多党制的、渐进的、非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同主张的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共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抨击；而很难认识到共产党和社会党还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法共由于长期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也不可能在总统选举中胜利，这种政治上的“缺憾”造成原本属于法共的选民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改投社会党，以增加自己选票的有效性。所有这些都促使大量共产党选民转入了社会党阵营中，这也正满足了戴高乐等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愿望——让社会党代替共产党成为左翼领袖。

社会党成为左翼领袖之后，在法共不得不继续支持的帮助下一跃成为执政党。但是，社会党却没有投桃报李，没有也不可能为自己的左翼阵营内的竞争对手——共产党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社会党反而根据政治形势的具体变化果断地改革选举制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比例代表制的实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不顾法共的政治地位日益边缘化。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国内制度空间比较

战后意大利与法国一样，也经历了两次共和国时期，但是这次共和国的转折是在冷战结束之际。由于意大利第二共和国并未修改宪法，所以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政治发展空间大都是形成于战后第一共和国时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意大利人民推翻法西斯政

权后，成立了意大利共和国，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在西欧国家中最能体现民主原则、更加维护劳动人民利益，也更加体现公正的政治制度。

（一）意大利第一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制度

与上文一致，为了给下面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比较分析奠定基础，我们主要选取对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影响甚深的几个政治制度进行阐释。

第一，意大利第一共和国宪法具有较为激进的性质：宪法赋予了普通劳动者以较高的地位。宪法开宗第一条规定“意大利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①给予劳动阶级以独特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宪法第三条宣告意大利国民形式上人人平等之后，提出：“共和国的任务，在于消除经济及社会方面的障碍——实际上限制公民自由与平等，阻碍人格充分发展和全体劳动者真正参加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的障碍。”^②此款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民事实上的不平等，许诺新共和国积极干预，消除障碍。正如唐纳德·萨松所说：“‘立法者的意图’是很激进的”。^③另外，宪法继续规定了几项消除实现平等和自由的障碍的措施，如第四条规定：“共和国承认全体公民均享有劳动权，并帮助创造实现此项权利的条件。”^④宪法法院于1965年对此条进行了法理解释，裁定它是指

① 金太军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南欧诸国》，附录一，《意大利宪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② 同1，第188—189页。

③ Donald Sassoon, *Contemporary Italy: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since 1945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p.221.

④ 同1，第189页。

国家必须努力增加就业，任何人都不得干涉人民对工作的选择。^①而宪法四十三条宣称“为了公共利益，法律可预先保留一定的企业或企业部门，或通过有偿没收的方式进行转让”，^②这就使国有化具有了宪法效力。显然，意大利第一共和国宪法具有明显的激进性质，这是其他西欧国家所没有的。

第二，在较为激进的意大利第一共和国宪法框架内，战后的意大利实行了最能代表各方民意的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这种比例代表制基本上是一个提名制度，即选民必须选择一个党，接着还可以用所谓的选择性选票按优先顺序写明该党的3至4名候选人。在参议院的选举中，选举方法有所更改，各党在每选区只可提1名候选人。这种名单提名性质的比例代表制显著地突出了政党的重要性。因为候选人首先是代表党，为了自己当选，他必须为本党多拉选票，而且保证该党的支持者会选择他或她。这导致大多数政党，尤其是天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候选人在政党的庇护下进行自己的个人竞选活动；而意共依靠支持者的纪律性，可以保证领导者希望的候选人当选。意大利参议院的选举方式用的是“德洪特最高平均数定则”。这种方法比较有利于两个最大的政党，因为选票不能达到平均数的小党是得不到议席的。意大利的这种选举制度是在尊重意大利存在的政治多元性的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产生的政党太多，不能形成稳定的议会多数，使政党的决策困难重重，而且不能给选民提供明确的可供选择政府的可能性。

① 金太军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南欧诸国》，附录一，《意大利宪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② 同上，第190页。

第三，就政治体制而言，意大利是纯粹的议会制，政府必须取得议会的信任才能存在，否则会立刻发生危机进而倒台。总统拥有的更多的是名义上的权力，再加上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在议会内发挥作用。因此，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党的作用特别重要。“政党事实上已经成为政权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把持者。它们在选举时指定候选人、控制议员职位、确定议会党团的行动、制定施政纲领、更换政府等”。^①政党地位的重要性使意大利各政党党员人数占该国人口比例之高也是其他西欧国家所少有的，拿意大利和法国作比较，也许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两个国家人口总数相差不多，但意大利各政党的党员总数差不多等于法国的两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政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二）第一共和国政治制度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影响的比较

首先，意大利第一共和国宪法的激进性质使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自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衷心地拥护宪法，拥护共和国政治体制。事实上，社会党与共产党正是亲身参与了制宪的整个过程，并提出和批准了大多数主要条款，一位卓越的左翼领袖（翁贝托·泰拉奇尼）甚至担任了制宪议会的主席。这种政治经历使社会党与共产党毫无困难地接受了现行的政治体制，并以捍卫它为己任。共产党在战后之初就主动提出和平地、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与它对意大利第一共和国宪法的满意与拥护是不能够分开的。

其次，单纯的议会制政体、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政党在政

^① 金太军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南欧诸国》，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保证了共产党凭借本身选举的实力在议会内一直享有第二大党的地位，仅次于天民党。因为共产党在议会内有强大的势力，而天民党从没有真正获得议会多数从而能轻松组成一党政府。这样，由天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技术上可行的选择只能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主要包括天民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二是“中间派”联合政府，它由天民党和其他中间派小党组成，即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和自由党。三是中左派联合政府，由天民党和社会党组成，还可以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有时包括自由党。四是中右派联合政府，即天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依靠新法西斯党（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支持。这四种选择中只有“全国一致”联合政府和中左派联合政府始终能够得到议会的充分支持。中间派和中右派联合政府在1976年之前曾经得到过技术数据上的多数，1976年之后不再能够获得必需的政治多数。如果从纯技术角度上说，在1976年之前，由共产党、社会党联合激进党与极左派团体组成的左派联合政府从来就没有可能成立。1976—1978年间，左派扩大，加上中间派，包括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左派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开始存在。^①但是此时意共正在实行历史性妥协的战略，承认代表广泛阶级阶层利益的天民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样，留给天民党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组建“全国一致”政府，要么组建中左联合政府。不过，意共最终以投弃权票的方式支持天民党建立了“全国一致”的少数派政府。

相对于法国统治阶级露骨地利用制度武器压制法共而言，意共

^① Donald Sassoon, *Contemporary Italy: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since 1945(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p. 193-194.

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说，意共并不是没有执政参政的机会，好像是它自己放弃这些机会，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放弃也是被迫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西方世界中资本主义的压力、国内官僚行政和金融财政机构的反共倾向，等等。在这里，限于主题，我们只是分析它的制度环境的影响。

意大利政治制度环境对意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给予天民党长期的、唯一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权力。天民党总是能够联合小党获得组阁的资格，给意共不能参政或执政的事实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其二，意共的确没有受到多少统治阶级特别限制共产党势力的制度性压迫，从而在战后40年里得以保持强大的力量，作为议会最大的永久的反对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当然，天民党也曾经试图通过一些制度上的调整以压制共产党。不过，面对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制度性压迫，意共凭借自己本身强大的力量与其他政治组织联合，利用革命的宪法精神和现成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定的反击。1953年3月15日的法令规定，如果某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成功地取得50%的地区选票加上1%的全国选票，那么，该党或该党联盟就将获得64%的席位。但是这项法令不仅遭到意共（它立即称之为骗人的法令）和社会党的强烈反对，而且还受到中间派政党中持异议者的强烈抗议。结果，天民党—自由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的联盟（以及南蒂罗尔人民党和撒丁行动党）只获得49.8%的选票支持。这样，凭着略多于5万张的选票，比例代表制得以保留下来，随后，该项法令被废除。^①其三，正是第一

^① Donald Sassoon, *Contemporary Italy: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since 1945*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p. 182.

共和国比较激进的宪法制度和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使意共更加主动地改变自身以与体制契合。战后之初的意共看到原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武器与自己所拥护的和平和民主相背离时，就开始主动地逐渐放弃了那些一向被认为是革命性标志的特征：工人阶级性质、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等等。然而，拥有1/3左右的议会力量和众多党员与选民的意大利共产党却从此走进了海市蜃楼般的梦魇，因为它所占据的发展空间是这个制度为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准备的。当社会党这个正牌主人终于觉醒而要入住时，共产党在抵挡不住衰退的同时已经停不下变质的步伐。

对意大利社会党来说，走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依据它的身份所做的正常行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它一度蜷缩在共产党的脚下做革命者的美梦（战后之初到1956年）。但是这种角色并不是它的本来意图，而共产党所做的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改变逐渐提醒了社会党，社会党认识到，必须承担起由自己的身份定位决定的政治作用，否则就会被共产党完全替代而失去存在价值。迷途的“羔羊”适时而返也就成为必然（克拉克西的“现代改良主义”革新），而现行的政治制度早为尚未完全觉悟的社会党提供了回头的实践良机（1963—1973年的社会党参予天民党政府）。凭着它历史上曾有的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特性，社会党毫无困难地迈进了向它敞开的大门，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身份定位的回归。

这种看起来最具民主性，对共产党最“宽容”的政治制度在完成了或者说辅助完成了合法地限制共产党的作用，促使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同时，给意大利政治生活酿就了一些异常的现象：天民党是永远的执政党，共产党是永远的反对党，从而没有出现现代议制民主国家特有的权力更替现象；小党可以在政坛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

组织政府过程中可以讨价还价的协商者；政党权力巨大，政府权力弱小；吏治腐败严重、社会问题众多。这些异常的现象与外界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力，最终导致了意大利第一共和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著名的“净手运动”推动下而覆灭。

（三）第二共和国政治制度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影响的比较

意大利第二共和国宪法的最重要变化是，1993年在宪法的框架内，议会通过的第276号法律和277号法律对参众两院的选举原则和规则做了重大变革。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原来完全的比例分配制度转变为多数分配制度与比例分配制度相结合的混合制：参众两院的75%的议席按多数制选出，25%的议席按比例制选出，其中个别大区（如瓦莱·达奥斯塔区、莫利塞区和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等）有一些例外。在众议院的选举中，所获选票不足全国总有效选票4%的党派不能获得议席。新的选举制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混合的特点。多数制与比例分配制的混合，单名额选区与多名额选区混合，单一政党竞选与党派联盟竞选混合。二是过渡的特点。从原来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向纯粹的多数制过渡时期实施的选举制度，因为多数制选举取得的议席数目是75%，占有所有议席的多数，并且多数选举制已经在省市一级选举中实施。可以看出，人民希望能有一个高效率的议会、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和一个廉洁的权力机构。这种新的选举制度使意大利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有效地阻止了政党权力的极度膨胀，为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条件。类似于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新的选举制度有利于竞选联盟的建立，造成了类似两党制的、便于实现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联盟的出现。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左右两大阵营，其中左翼阵营中的领导者是继承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由意共的主体力量转变而

来的左翼民主党，而继承共产主义传统的意重建共则是左翼阵营中不可或缺却力量弱小的党。

虽然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对意大利左民党和重建共的影响还有待于更多时间的考察，但参照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历史经验，仔细研究左民党与重建共几年来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就可以推断出，左民党和重建共因为选举的需要将会保持一定的联盟或合作关系，正如1996年至1999年期间已经出现的两党合作。但是左民党由纲领党向选举党的转变告诉我们，它可以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选择多个合作伙伴，坚持自己意识形态的意重建共则要面临身份定位和通过选举胜利求得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借鉴法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去理解。但是，现在重建共的力量不足以威胁到意大利资本主义制度，根据代议制民主原则，统治阶级不会把限制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始终都是可以代表一部分公民的利益和心声的。在这一点上，冷战结束后法国共产党的处境与意重建共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法国和意大利两国政治制度对共产党的直接压力并不同。法国统治阶级使用赤裸裸的制度性改革来蚕食共产党的发展空间，削弱它的实力；意大利统治阶级却是用民主的制度形式包裹一党独大的政治事实，把共产党合法地摒除在政府之外。但是无论是紧迫的还是宽松的制度，它们都能够在具体国情下完成对共产党的削弱和抵制的任务，以合法的形式保证自己所认可的政治力量掌握政权。而另一方面，对于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社会党来说，政治制度一直备有充分宽松的发展空间，甚至是鼓励和促进其发展壮大，以便与右翼政党一起担负起维护和稳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国际政治环境比较

战后形成的美苏争霸和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首要的特征是国际意识形态的对立，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这种冷战局势的变换和与此相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对处在两极对峙战略前沿地位的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尤其是对后者的影响深远。其中，由于法国和意大利在西欧的重要地位，以及两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在整个西欧同类性质政党中的突出作用，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所遭受的国际影响和压力最为突出。深入研究冷战时期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所承受的来自国际政治层面的影响和压力，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战后两类左翼政党生存发展所需的环境空间根本不同。

冷战时期，对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影响巨大的国际政治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战后两种制度的共处与竞争给西欧国家的民众以极大影响。一方面，法、意等西欧国家的民众看到苏东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失业现象、贫富差距小，国家可以短期集中力量实现经济奇迹等制度的优越性而心生羡慕；另一方面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担心崇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会蔓延到本土上，掀起体制的革命。另外，苏联庞大的国家实力及其扩张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迹象也让西欧的人民担心本土的安全。西欧国家对待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这种复杂情绪，帮助了法、意等西欧国家的左派政治思潮力量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处于高涨态势，因为统治阶级只有通过实行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政策才能够抵制住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对普通民众榜样式的进攻，这为作为左翼政党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准备了

发展自身的有利环境。其二，从两极意识形态之争在国际关系层面的表现看，主要是美国和苏联分别对法、意等西欧国家施加的压力和影响。经济和军事实力无与伦比的美国通过对西欧在经济、军事，甚至是政治方面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从事扶持社会党和打击共产党的诸多工作，直接影响了两类左翼政党的兴衰与变迁。苏联也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的传统，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共产党（主要是法共和意共）的控制与影响，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冷战时期随着具体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国际影响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冷战在总体上是“西方压倒东风”的发展态势，社会党与共产党所承受的国际压力也相应成为“西紧东松”的发展之势。苏东剧变使持续了几十年的两极意识形态的冷战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由于一极的消失而出现的一种惯性反弹现象：美国推广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甚至以武力为必要手段的“新干涉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虽然法国等西欧国家对美国政策也有不满，但是至今仍未有迹象表明它们的同盟关系将要破裂，表现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新干涉主义”采取支持、不反对或不完全反对的态度。^①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国际政治环境比较

战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所受到的国际政治影响是不同的，换言之，美国和苏联分别对社会党与共产党施加的国际政治压力极

^① 当然国际形势的影响不只是两极意识形态之争，另外如多极化趋势的增强等因素也对社会党与共产党有着不同的影响与作用。尤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使欧洲作为整体力量的增加，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纲领政策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但这首先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分析。至于第三世界的崛起与发展，是受两极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而发生的，而且本身并不是对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造成根本性影响的因素，所以，我们对其忽略不计。

不相同。

（一）战后法国社会党的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影响

战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1975年12月在伦敦召开的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会议上曾说，“至于社会党人，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我们在葡萄牙这样做了。我们在意大利也必须这样做，尽管意大利社会党在天主教民主党人尚未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之前是靠不住的。”^①这句话表明了战后的美国对整个西欧社会党（包括法国社会党）的基本态度：明确地支持社会党，并扶持它取代共产党成为国内的左翼领袖，不干涉它进入政府执政，并且希望它赞成美国的国际战略。为此，在推行马歇尔计划时，美国对当时法国社会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建立反共联盟。相反，苏联在冷战初期严厉指责了西欧社会党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帮凶，认为他们“力图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辞藻，来掩盖帝国主义政策真正的强盗本质，实际上，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忠实同谋犯，他们极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毒害工人阶级的思想”。^②由此可见苏联并不想控制法国社会党，而是基本上把它放在了敌对的位置。

鉴于这种美拉拢、苏排斥的不同情势，法国社会党选择了顺应美国要求的策略，毅然与苏联决裂。当然，这种选择也是与法国社会党自身利益相契合的。虽然冷战初现端倪时，出于对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憧憬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敬仰，法国社会党主观上希望以中间力量的姿态出现，但是当时因作为主要执政党之一，肩负国家

^① [意]贝尔纳多·瓦利著：《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②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建设重任，法国社会党是无法拒绝美国“马歇尔计划”的诱惑的。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社会党认为“马歇尔计划”可以帮助法国摆脱经济灾难和社会混乱，提高工业生产水平和消除大量失业现象，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这有助于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当时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曾说过：“在一个孤立国家的有限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不可能不破坏经济和冒崩溃的危险，并会招来世界经济严厉的贸易、金融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制裁。”^①此时东欧各国为了实行苏联模式，普遍把社会党完全并入共产党，并出现了镇压社会党领导人的现象。这在法国社会党内引起了恐慌，增加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猜疑：害怕共产党力量强大后也会把自己吃掉。因此，既是由于美热苏冷的不同态度，更是由于社会党的实际利益，1947年社会党的拉马迪埃政府解除了共产党部长的职务，使法国社会党的立场更加公开化。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与法国社会党的关系可以透过国家关系来看出：法国承认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西方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它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防卫苏联的侵犯野心；在欧洲和法国安全保障方面坚持与美国合作，却对美国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不甘愿加入北约军事组织成为美国的附庸。“难道不能理直气壮地既拒绝苏联的超武装又拒绝美国的干预吗？”“我哪一个也不选择。我力图对付双重威胁”。^②这种典型的密特朗式的语言表明，法国社会党应对美

^① Wayne Northcutt, *The French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Fifth Republic, 1958-1981,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Inc., 1985, p. 6.

^②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苏的政策是从一个执政党的身份基于国家利益来制定和实施的。它也正是这样行动的：一方面，反对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也要求撤除苏联 SS-20 导弹；另一方面，以断绝与苏共关系的方式强烈谴责苏联在阿富汗、波兰的问题和苏联的人权问题。因与苏联价值观念相对立，法国社会党看到苏联解体时欣喜若狂，但左翼所遭受的沉重打击使毕竟是左翼政党的法国社会党也遭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牵连——这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社会党衰退的重要原因。之后，经过调整的社会党成为美国在世界上推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辅助者和支持者。1999 年社会党政府对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具体行动科索沃战争的支持和参与，表明了社会党已经开始放弃它一直高举的和平大旗，更加注重它作为执政党的现实责任和巩固意识形态战果的积极态度。但是，对于 2003 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做法，社会党与执政的右翼政府一样表示不满和反对——这说明社会党从法国及欧洲的国际利益角度考虑，反对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行径。

（二）战后法国共产党的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影响

战后，法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比社会党复杂得多，承受的国际压力也沉重得多。

首先，美国坚持强烈的反共立场，坚决压制法国共产党。正如亨利·基辛格于 1975 年 12 月在伦敦召开的美国驻欧洲国家大使会议上所说的：“在意大利……也许甚至还有法国，我们正看到共产党的影响不断增长，我们正面对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有一件事情是清楚地，那就是西方的共产党占统治地位，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共产党在西欧若干民主国家取得政权，美国政策的既定格局就会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只能通过运用毫不留情力量

均衡政策才能顶住。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丧失我们有史以来一直发挥作用的道德基础。”^①正是在这种反共立场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先有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的出台，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后有“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可以说，所有这些冷战战略部署的主题就是反共反苏。具体到法国，正如前文所说，美国要求法国政府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条件就是建立反共联盟。战后以来，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反共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也因此，法国共产党一直承受着这种沉重的压力。

其次，苏联对法国共产党施加了各种复杂的压力。众所周知，战后特别是冷战开始后，苏联对西欧共产党施加了强大的政治甚至军事压力。其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可以加强对东欧共产党或工人党的控制，二是可以在西方阵营内获得对自己同情与支持的人民力量，以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苏联利用与法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天然纠葛，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和经济援助等方式对法共和意共进行控制。在组织控制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九国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及其在成立之初就对法共、意共参加政府大加指责的做法，表明了它的使命就是帮助苏联对其他共产党的控制与管理。关于经济援助，法共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离开过苏联的经济援助。苏联除了通过与法共控制的公司企业做生意来变相地给予法共资助外，还有一种地下的经费对法共给予支援：通过特定收款人透过克格勃的秘密渠道进行。如法共总书记马歇的第二把手，加斯东·普利索尼

^① [意]贝尔纳多·瓦利著：《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6页。

耶就是这样一位秘密资助接受者。1987年，苏联向法共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助后，又给了法共10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1988年的竞选。^①另外，从法共主观愿望看，也存在诸多与苏联无法割断的联系：一方面，法共本身许多领导人都是苏联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不仅思想意识和工作方法受到苏联深刻的影响，而且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法共领导人之一的多列士就曾在苏联待过多年。另一方面，法国人民一贯深受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的影响，对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十分景仰和崇拜，其程度远比其他国家更高。加上前文已经提及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榜样作用，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景仰和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神化”，并且都直接转化成了对法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持。也就是说，法共的党员和选民中的亲苏派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即便是出于发展或者“包装”自身的考虑，法共也会选择靠近苏联，把苏联经验当作效法样板，扮演着“忠实党”形象。在双方都刻意表示亲近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以作为“斯大林主义者”而感到自豪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冷战严峻时期，苏联对法共的严密控制是有效用的。进入60年代之后，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福利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劳资矛盾大大缓和，苏联本身发生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事件，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等外交政策出台，社会主义制度的榜样力量随之大大弱化。所有这些因素使苏

^① [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著：《克格勃绝密档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电子版，18章《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baogaowenxue>。

联对法共的控制出现了松动迹象。在1969年7月的第三次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苏共不得不对各国党做出让步，如会议文件中有这样的阐述：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在十分不同的条件下活动的，这些条件要求采取相应的办法去解决具体问题。每个党应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并考虑本国的具体条件，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①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西欧共产党第一次带着自己的观点出席会议，对代表大会发表了自己的评价，其中以意共领导人贝林格的表现最为突出。这些表明，苏联对西欧共产党的控制力日益减弱。事实上，苏联对西欧共产党（主要是法共和意共）的态度是矛盾的：它默认共产党在各国内民主政治体制下生存与发展，却因担心两极格局失去平衡，并不支持共产党宏伟的执政计划，它还不得不支持西欧共产党的发展，因为这是增加自己阵营的力量。正如基辛格所分析的，“如果共产党控制了西欧，这对美国来说是头痛的事情，对苏联来说也好似头痛的。他们大概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西欧接管政权。但是，归根结底，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求他们支持这些共产党的努力。”^②西欧共产党很容易就会发现苏联的这个矛盾立场，并且认识到这种矛盾是基于苏联大国霸权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从而对苏联的政策产生反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控制力越来越小，法共等西欧共产党的自主性越来越大，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苏联这种矛盾立场一手造成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卡特

① 姜琦、张月明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② [意]贝尔纳多·瓦利著：《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主义和里根主义重新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法共又回到了苏联的身边,表示赞同苏联行动的立场,对80年代的戈氏改革也表示公开的支持。法共这种做法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是前文所说历史传统的影响。二是法共此时在国内力量已被社会党超越,而且自身仍不断衰退,有依附于社会党而自身身份模糊的危险。三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使法共党内发生分裂:一派被开除出党,另一派要求改组法共,还有一派对“欧洲共产主义”路线表示反对。在这种形势下,法共主流派选择在党内实行保守态度,强化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身份不同,以表明法共的存在价值,在党外则与苏联保持一致,试图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加强党内的团结和促进党的发展。整个80年代法共就是采取这样的政策艰难地应对困境。这种状况下的法共在遇到苏东剧变这样更沉重的打击时,仍是希望以保有正统的共产党的特征来保持党内团结和昭示生存价值。但是,毕竟整个苏联压力已然荡然无存,西方压力不但存在,而且因整个西方的右倾有所增强。国际政治环境的这种新变化使90年代的法共党内不同意见日渐增多,最终导致了新的理论革新的开始——“新共产主义”出台。

总之,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战后以两极意识形态之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背景中,所获取的发展空间是很不相同的。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排斥,共同推动了法国社会党向一个方向发展:沿着美国和国内资本主义力量希望的道路前进,代替法国共产党,成为左翼领袖,甚至执掌政权——这是一条宽广的、毫无限制的道路,而这也是法国社会党的主观愿望,因此在这条道路上它越来越与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在思想与政治上的要求相契合。法国共产党生存在异己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受到来自国外国内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制,

却只能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弱化、越来越变味的帮助与扶持，但是，意识形态的“同质”使得只要两个阵营还存在对立，法国共产党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牵制。可以说，来自苏联的影响不仅是苏联对法国共产党各种有形手段的控制，而且更多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相同而对其产生的精神束缚。只有在苏联解体后，外界的这种影响和压力逐渐消失，法共面对新形势才得以进行相应的改变。显而易见，这种国际政治影响的不同是与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紧密相关的。如果把国外政治环境的压力和制度空间的蚕食结合在一起考虑，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二、战后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国际政治环境比较

尽管存在具体国家的差异，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所承受的来自美、苏的国际政治影响基本上是与法国一样。美国、苏联往往以法、意两国为代表，提出对所有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对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不同影响和它们的具体感受进行分析。

（一）战后意大利社会党的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影响

由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战争后遗症等因素的作用，战后初期的意大利社会党是坚持亲苏反帝（美）态度的（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但是美国仍是尽量扶持它成为左翼领袖，强烈希望它代替势力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地位。所以当意识到意大利社会党对自己并不亲近后，美国采取援助和分化等方式直接干预意大利社会党内部事务，培植亲美势力。在冷战期间，美国的这种立场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比如1947年萨拉盖特集团从社会党中分裂出去，自行组织社会民主党，就是在美国政府和劳工联的大力支持及援助下进

行的。^①至于苏联，明知自己没有能力控制，但是对于意大利社会党明显的亲苏立场，它当然不会置之不理，而是大加赞赏和鼓励。如1949年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发表了赞扬苏联的技术和社会成就的文章，苏联颁发给他1951年的斯大林和平奖金。但苏联的影响力也仅限于此，保持这种亲密关系的主动权是掌握在社会党手中的。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社会党意识到意大利在经济上对美国具有强烈依赖性，同时看到苏联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出笼，加上自身受到整个西欧社会党右倾趋势的推动（西欧社会党此时正在进行战后的第一次思想大革新，进入民主社会主义阶段），所有这些因素致使意大利社会党明显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它开始脱离苏联的影响并严厉谴责苏联的社会主义，甚至在国内与共产党疏远关系。南尼在1956年退回斯大林和平奖金，并把它全部捐给“布达佩斯难民”，这一举动表明了他与苏联决绝的决心。

在之后，在外交政策上，意大利社会党越来越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趋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发生苏攻美守的冷战新态势，欧洲形势有了缓和迹象，西欧民众出现左倾浪潮，像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一样，意大利社会党又一次与强大的共产党合作成为必然。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外交调整期过后的美国对苏联发动新一轮攻势，而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干涉波兰事务给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全面反共带来很好的理由。处在这种形势下的意大利社会党，恰恰完成了本党的全面革新。新领袖克拉克西决意要改变意大利社会党不及共产党这个西欧地区的特殊现象，利用对己有利的

^① Michael A. Ledeen, *West European Commun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Brunswick, U.S.A. and Oxford, U.K.: Transaction Books, 1987, p.84.

国际形势，抛出“现代改良主义”理论，把原来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密切联系全部抛弃，大肆宣扬意共依然是共产国际的产物和继承者。虽然说意大利社会党在80年代第一次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是由国内具体经济政治情况决定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适宜的国际形势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但是在苏东剧变的重大冲击下，意共改名为左民党，彻底投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阵营。群众基础和政治实力相对意共而言本就脆弱的社会党的生存空间，被意共完全占据了。左民党对科索沃战争的支持态度说明了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观念已经趋于一致。

（二）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政治环境及其影响

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政治环境与法共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意共是西欧共产党中力量最大的一个，本国社会党本身的极度弱小使它显得更为强大，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威胁也就显得更为明显。而且意大利在北约组织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北约的南欧指挥部就设在其南部城市那不勒斯，意大利是美国在地中海国家中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掌握着美国及其盟国海军使用的地中海海上通道。这种特殊状况使意共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势力更为强烈的反对。美国甚至视意共为未来“诡计多端的竞争对手”，是头号危险。^①于是，1947年1月，德加斯佩里总理赴美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美国方面表示，美国不愿浪费自己的资源，去帮助与国内和国际民主

^① Simon Serfaty and Laurence Gary (ed.),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 p.54.

原则与目标相背的趋向。^①这就是说，如果在意大利政府内有共产党人，美国是不愿援助的。之后的5月13日，德加斯佩里以辞职和重新组阁的方式把共产党赶出了政府。在同月的20日，马歇尔正式保证美国支持意大利。美国不仅利用经济援助压制意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而且直接插手意大利的政治选举，展开“一场针对共产党的战役”。^②在1948年的选举中，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邓恩亲自在意大利各地巡回，以甜言蜜语哄骗选民，并威胁说，如果共产党进入政府，美国的援助将会停止。在美国的支持下，天主教会、中右翼政党等所有反共势力在这次选举中结成了联盟，最终以天民党获得48.5%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左派的31%的选票。从此天民党在反共势力的支持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党独霸政坛，意共则开始了永久反对党的生涯，也开始了突破阻力、追求执政的漫长过程。只有在消除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担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对执政的追求，深知此点的意共表现得越来越像美国所满意的社会党，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但是美国是如此担心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以至于即使意共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改变得“更像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英国的工党人”，美国仍然觉得：“由于共产党这个词在美国看来非常刺眼，为什么他们不向前跨出最后一步，改变党的名称，这样就可以消除疑虑。如果不再叫共产党，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③这就是美国对意共最终的希望与要求。受到苏东剧变的刺激后，只披着一层共产党的“外衣”的意大利共产

① 史志钦著：《意大利共产党的演变与分裂》，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张汉清教授指导，1997年，第48页。

② 同上，第49页。

③ [意]托马索·吉利奥著：《贝林格》，北京：新华出版社，1978年版，第153页。

党终于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满足了美国的所有要求，这才在90年代中后期获得了执政，但这时它已不是作为共产党执政，而是作为社会党的后继者——左民党执政。

意共一直是人们所认为的对苏联控制最能体现独立自主性的西欧共产党，因为它有理论创新的传统，本身也有强大的实力和众多拥护者。但从冷战时期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对意共的影响都不可以忽视。苏联对意共保持影响力源自战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苏联的鼎力支持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①战后，苏联对意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历史的传统告诉意共，党的产生、生存、扩大甚至是执政的唯一依靠只有苏联，正像人们形容的那样，陶里亚蒂依靠莫斯科就像德加斯佩里依靠梵蒂冈和华盛顿一样。^②事实上，战后意共的迅速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在二战中的英勇抗敌以及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共产党获得了崇高的威望，这吸引了许多人加入意共。而且许多的意共领导人受过苏联的培养或提拔，是共产国际的原有成员，在思想意识、工作方式和个人感情上都充满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如陶里亚蒂就是其中的一位。其二，意共与苏联之间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不仅战后一段时间里，意共和其他共产党一样需要得到苏联的财政支持，凭借与苏联的关系，意共可以参与一些国家贸易活动以

^① 意共的建立就是以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对形势的看法为依据的。当时共产国际认为西欧形势是革命的，意大利是最临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只是缺少一个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党，所以在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情况下仍必须建立纯正的共产党。此后意共处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并不断从苏共得到活动经费和培训领导人等帮助。

^② 史志钦著：《意大利共产党的演变与分裂》，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张汉清教授指导，1997年，第56页。

获得部分资金。另外，与法共一样，意共始终得到苏联的秘密支持，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帮助培训意共情报组织，目的是增强意共应付政变转入地下工作的能力，再如苏联始终对意共的资助要求慷慨大方：1972年，苏联提供了570万美元资助意共领袖隆哥参加竞选；1976年即便是贝林格公开表示要疏远苏联，也获得了65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甚至到了完全与苏联决裂的80年代，意共仍然能够不断接收到来自苏联的几十万美元的经费支持，接受者主要是意共内的亲苏派（如科苏塔派）。“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意大利共产党生存的需要。”隆哥的这句话也许最能真正表述出冷战时期意共与苏联的关系。^①

相对于美国坚定而强大的反共力量，苏联对意共的影响是相对弱得多的。从战后之初，出于对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和伟大理想的考虑，苏联就默认意共等西欧共产党在各国内的民主政治体制下生存发展，而对西欧共产党夺取革命实现执政并不热心。在意共有希望通过选举获得执政的时候，苏联也因不愿触怒美国而不热衷于意共的做法。这样苏联无法帮助意共抵御来自美国的反共压力，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行径在苏南斗争（1948—1952）、波匈事件（1956）、中苏关系恶化（1956年开始）、“布拉格之春”事件（1968）、入侵阿富汗（1979）等事件中一次次地显现出来的时候，逐渐习惯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意共对苏联的做法越来越不满。随着具体国际背景（包括美国要求的毫不退让、西欧的发展和第三

^① [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著：《克格勃绝密档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电子版，18章《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baogaowenxue>。

世界的崛起等)的发展变迁,意共对苏联的反抗力度也就越来越大。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意共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打开绿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西欧其他共产党组成强大的独立力量——欧洲共产主义,苏联被迫一步步地退让(如前文所述在世界共产党1969年会议上和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意共的表现),再到1981年12月,因为苏联对波兰团结工会的粗暴干涉,意共终于实现了与莫斯科的决裂。意共在一项正式决议中声明,从俄国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动力已经枯竭,“社会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成就,越来越依赖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先进经验的成功。”^①当意共终于扯断与苏联的联系后,它也就从东方阵营转向了西方阵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意共放弃民主集中制,与社会党国际进行联系等行动,充分说明了它努力做最后改变的意图。苏东剧变的发生使意共最终完成了变质之路,也最终满足了美国一贯的要求。但是,长达70多年的苏联模式的影响,以及同样存在这么多年的共产党的信仰和特性,并不是改名易帜就能够一笔抹掉的,意重建共的建立与苏联一贯扶持的“健康力量”密不可分,它依然体现了苏联加在意大利共产党人身上不可磨灭的痕迹。

综上所述,美国对意共的要求是彻头彻尾的变质,而苏联不仅没有能力阻止这种改变,而且自身对人权、民主忽视的行为越来越与意共的价值观念发生严重偏差——这种美国对意共的强力干预和苏联控制力的弱化,正是意共战后发展演变的重要推动力。而来自

^①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美国的扶持与鼓励，和来自苏联的无所用力，使意大利社会党在东西方对峙中获得了压制对手（意共），发展自己的良好环境。

通过以上关于国际政治环境对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影响分析，可以知道：以两极意识形态对峙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格局，使美国找到借口在西欧国家直接插手各种事务，以扶持社会党和压制共产党；实力远逊于美国的苏联不能真正帮助共产党摆脱美国的压力，却凭借着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联系获得对共产党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随着东西方差距的增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斗争呈现弱化趋势。苏南斗争、波匈事件、中苏论战、中苏分裂和捷克“布拉格之春”等事件，体现出的是苏联仅以意识形态为工具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而不是真正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奋斗。苏联自身的改变^①表现出，在与美国等西方阵营的对峙中，苏联不仅不能坚守意识形态阵地，而且走上了令人反感痛恨的大国霸权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使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次次地出现大的争论和分歧并最终走上分裂之路，从而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贯团结的历史传统。当无产阶级国际大家庭不再和谐并四分五裂时，受到巨大冲击的法、意共产党只能是各自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这时存在于共产党周围的另一股力量的作用也就凸显出来，那就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力量以压迫或引诱蜕变的方式消除共产党的革命特性。在这种“西紧东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共产党不仅无法获得持续有力的国际支援，反而经常受到两股

^① 主要体现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个人问题的披露，赫鲁晓夫关于当代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基本问题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原则的提出，20世纪70年代与美全球争霸行径的显露，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等。

不同方向和不同力度的国际势力的牵制,越来越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相反,社会党却因此得到了从容的发展时机,从而取代了共产党成为左翼领袖,甚至实现了执政的目标。

小 结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发展空间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认识:

第一,从国内政治制度层面看,战后法、意实行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为革命性的共产党和改良性的社会党留有不同的发展空间。战后,法、意实行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使左翼力量不会像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遭遇过的那样,遭到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的赤裸裸镇压。^①经过两次战争的荼毒,在战后两制竞争的国际背景下,法、意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即社会党,帮助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和修补。同时,法、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允许革命性的左翼政党——共产党的存在,以展现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平等与自由,但决不允许共产党具有威胁现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能力。因此,战后法、意两国的统治阶级为改良性的社会党准备了宽松的、可以充分发展的政治体制,能够容忍并推动社会党由弱变强以担负起制度内改良重任的执政使命。但是对革命性的共产党,尤其是对战后初期法、意两国内具有威胁体制

^① 如德国俾斯麦政府曾经宣布社会民主党非法,以及法西斯对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消灭式打击。

实力的共产党，统治阶级或者利用制度改革以直接压制共产党的发展，或者通过反共势力联合起来利用制度的许可把共产党合法地排挤出政府之外，直至共产党不再具有威胁性（或者力量衰退，或者变质易名）。

第二，从国际政治环境层面看，两种意识形态或两制的斗争给革命性的共产党和改良性的社会党带来了不同的国际压力。一方面是美苏的差距逐渐拉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法、意等国民众的榜样作用越来越微弱，对社会党基本无能为力和对共产党的控制力不断减弱；美国对法、意社会党的直接扶持和对共产党强力压制的力度则不断加强。这些帮助社会党获得了一个对发展强有力的国际环境，相反使共产党遭遇到来自国际上强大的压制。另一方面是苏联越来越不得人心的表现。在冷战的国际大氛围中，随着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越来越明显，忧虑西欧受到苏联入侵的想法就越来越为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所共同担心。这也是它们在战后默认北约的存在和美国在西欧驻军的重要原因。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苏东巨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也成为包括法、意共产党在内的许多西欧共产党走向低谷的最主要的国际动因。

我们要认识到，国内政治制度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二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共同建构出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发展空间。

第六章

改良主义的决定作用：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基础比较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各个方面表现的异同及其演变，固然是与战后它们所获得的不同政治发展空间密切相关，但是在政治根源的背后，还有经济社会根源在起着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的经济社会基础是二者出现各种异同的最深层根源。政党生存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实质，是它所存在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经济社会状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力量，同一历史时期的一个国家内部所有政党遇到的经济社会基础是相同的，但是具体到不同的政党，相同的经济社会性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却是不同的。

第一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基础比较

政党生存的经济基础，并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经济基础”完全同义，而是指政党生存所要依赖的经济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它不仅包含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而且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内容。

一、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基础的状况

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石油危机为界，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的经济基础可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

(一) 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阶段

战后，西欧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恢复与发展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在这个时期，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各国先后兴起了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科学和航天技术、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材料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随着科技成果大量转化为生产力，一些生产劳动的重负从体力劳动者身上转嫁到机器身上。在采矿、种植、运输和制造等行业和部门中，实现了无生命的能源和机器的结合，生产力由此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力量，法国和意大利也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战后初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法国和意大利的生产水平比战前大大降低，法国1945年的生产水平比1938年下降了1/3，而意大利1945年的生产水平只相当于1938年的55%。经过40年代中后期的大规模经济重建，两国都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济秩序，至1950年两国的生产水平都已经超过了战前。50年代以后，两国迅速进入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59—1974年间的15年里，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5.7%，在整个发达国家中居第三位，超过了美国和联邦德国。直到1973年由于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的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才暂时告一段落。与法国类似，1950—1963年的意大利也经历了一次经济奇迹。国内生产总值年平

均实际增长率高达5.9%，在整个西方国家中仅次于日本。仅仅13年间，意大利就进入了世界工业大国的行列。在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由于劳工运动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困扰，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了许多，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59—1963年的9.07%降到1964—1970年的6.20%，接着降到1970—1974年的3.38%。^①虽然1963年之后意大利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降低，但是与同期的西方国家相比，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速度仍是不可小觑的。

（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一轮的科技浪潮已经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信息论和控制论为理论基础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到来，它包括微电子、通信、电子计算机与人工智能、自动化、光导和光电子等一系列的高新技术的发展。第四次科技革命不仅造就了一批以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首的新产业、新经济，而且促使了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变革，整个世界真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法国和意大利虽然属于西方国家中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动较晚的国家，但在80年代也均有了清醒的认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意大利就开始了以提高科技含量和自动化水平，降低工业成本为目的的工业结构改革。法国在1981年10月制定了《以生物技术的飞跃发展为目的的动员计划》（10年计划），以鼓励和资助进行遗传工程、微生物学、发酵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到1982年

^①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法国经济研究室主编：《法国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8页；关树芬主编：《九十年代的西欧形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5页；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2003年系列书籍中的相关资料。[意]路易吉·德罗萨著：《战后意大利经济》，罗红波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7月，法国又制订了《关于规定法国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方向和计划的法律》，专门把电子元件和软件工程、自动化、专用设备和通讯等列为发展重点，努力开发核能、太阳能、生物资源能等新能源。

由于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个阶段相继进入了经济滞涨与缓慢增长交替时期。法国从1974年进入经济发展的滞涨时期。1974—1979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只有3%，同期通货膨胀率却扶摇直上；1980—1984年，法国经济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工业生产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年均下降0.3%，同期通货膨胀却进一步恶化，消费物价平均年增长率达11.1%，1980年和1981年甚至分别高达13.6%和13.4%。意大利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生产水平不断下降，这种状况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和意大利才借助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渐渐走出困境，进入经济低速增长和低通货膨胀并存的时期。此时的法国经济增长率再次爬升到2%以上，这个增长速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基本上一直维持在2.6%以上。与法国的情况相类似，经过了长期经济萎靡之后，意大利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第二次经济奇迹。如1988年国内总产值增长了将近4.2%，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这个增长幅度也是很大的。虽然90年代以后，意大利国内总产值的增幅有所下降，但基本上仍然能够保持2%以上。21世纪初期，意大利经济发展开始加速，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已经上升到3%左右。^①

^①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法国经济研究室主编：《法国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8页；关树芬主编：《九十年代的西欧形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5页；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2003年系列书籍中的相关资料。[意]路易吉·德罗萨著，罗红波等译：《战后意大利经济》，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

战后，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的经济基础有着不同的特征。我们主要对影响两党最深的三个方面——生产组织方式、经济管理方式和社会分配方式——进行考察。

（一）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阶段

首先，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福特主义^①盛行。

这个时期，在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地区，使用福特制生产管理模式的规模企业不断涌现出来。法国的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电气制造业、造船工业、机械加工工业，以及包括纺织、食品、服装等消费品工业的众多企业，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扶持。为了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法国政府利用增加投资、企业合并等手段把这些企业扩大规模，并使用福特制生产管理模式加以改造。即使一些未被重点扶持的夕阳工业也纷纷效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组织方式进行改造。在意大利，尤其是北部工业发达地区，经历了一次与法国类似的发展过程。虽然当时意大利的工业大多仍是传统工业，主要由家族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但是政府采用了开放政策和“技术借用”战略，鼓励利用国内低廉的劳动力，组建合并工厂，通过“钢铁工业革命”、“机械工业革命”，^②以及在化学和制药、纺织、服装、

① 所谓福特主义，是指把劳动中各个环节的运动都理解为人的行动。它要求人的行动要适应机械的运动法则，通过合理的动作训练去最大效用地完成劳动中的操作活动，从而实现了劳动力的合理化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种生产组织方式首先由美国人泰勒作为一种劳动管理形式应用于企业内，后来被福特公司采用并推广到生产流水线上，在战前的美国以福特制的名字进一步得到推广。

② [意]路易吉·德罗萨著，罗红波等译：《战后意大利经济》，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95页。

食品加工工业等产业的改造,形成众多以公有性质为主的大型企业。同时,在其内部通过加速和改进生产过程等手段,实现了以生产专业化为特征的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推广和应用。

其次,在经济管理上,凯恩斯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在西欧绝大多数国家中,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一直是被崇奉的经济思想。在经济领域内,首先发展的是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守夜人”,负责保障一般经济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而把担当调节生产、供需、价格等任务完全交给市场这个自发的“看不见的手”。虽然,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资源自由配置的要求的同时,却也无法阻止,从某种意义上说,加重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甚至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崩溃、大恐慌。战后,为了避免30年代的梦魇再一次降临,也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中获得启示,并且从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看到成功的希望,西欧国家普遍建立了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推行私有企业的国有化运动和对经济生活实行国家干预与调节。战后初期,法国和意大利都推行了把大量企业收归国有的国有化运动。法国是通过向具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性质的私有企业收买的方式推行大规模国有化运动,意大利则是把法西斯政权掌握的企业收归国有。除了对国有化运动的重视之外,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对经济生活进行国家干预和调节。例如法国的国家干预所具有的计划性特色最为明显。1945—1946年,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联合政府推出一连串计划性经济政策。这种计划性经济政策在随后的岁月中将本国工业经济带上现代化的大道。意大利虽然由

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在表面上并不支持实施国家干预政策，实际上却通过国家控股机构伊里公司对银行、公共工程、钢铁等产业进行计划和干预。这种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不仅大大推动了新科技革命与新生产组织方式所积累的生产力的迅速释放，而且也使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积聚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再者，社会分配方面，福利国家制度的初步建立。

二战结束后，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都开始在战前零乱、分散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基础上，建立了范围扩大、规模扩大和力量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完成了福利国家^①的制度建设。在1945年10月，法国就根据临时政府的法令建立起了一般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法国约50%的从业人口；此外，还制订了包括农业、采矿、国有化工业工人以及文职人员参加的许多特别保障计划。意大利也从1965年开始改组和统一了社会保障制度。概括地说，战后法、意社会保障制度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社会保障普及全民的阶段，60年代到80年代是社会保障水平提高阶段，80年代之后是社会保障制度调整阶段。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属于欧洲大陆类型，侧重于用社会保障津贴来取代工资和薪金收入。这个时期，法国和意大利的福利开支都占国家总开支的60%以上，其中福利开支的费用来自雇主的份额也属西欧各个国家中最

^① 福利国家的具体内容包括：在“混合经济”制度下，由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之类的“弊病”。参见黄素庵著：《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多的，甚至曾经达到了福利总开支的58%。^①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两国都已经建成典型的福利国家。

（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第二阶段

首先，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出现。

在福特主义推动法国和意大利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一个飞跃式发展之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生产流水线的设备僵化，无法适应消费社会出现的消费品个性化的特点；劳动力工作机械无创新空间，难以开启劳动者本身的智慧能量。这种状况导致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世界石油危机的推波助澜之下，一时之间，法、意生产力受到束缚的状况甚为严重。8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和意大利的企业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企业一样，开始在生产组织方式上进行一次新的变革。抛弃原来的福特制，以日本丰田主义为榜样，采用灵活化的机械设备和具有广泛熟练技术的劳动力，进行特殊化商品生产。这一革新，不仅取代了原来使用高度专业化的机械设备和半熟练技术劳动力所进行的大规模标准化商品生产，适应了消费社会中对商品的个性化需要，而且更大程度地开发了劳动力智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

其次，经济管理方面新自由主义模式确立。

20世纪70年代之后，原有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已经不能解决世界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和前所未有的“滞涨”问

^① 顾俊礼主编：《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题。在80年代，它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逐渐取而代之。新自由主义模式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具有自发调节作用，自由的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使经济活动达到最高效率。同时，新自由主义模式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调节分配的做法，认为这会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提倡私有制，主张只有私人经济才具有实现个人本性发挥的特性，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最大的优越性。对法国和意大利来说，放弃凯恩斯主义要比其他西欧国家晚一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程度也没有英、美等国家彻底。所以在80年代，法国和意大利都大张旗鼓地实行私有化运动，推行紧缩和刺激投资等经济政策。这种新的经济管理模式把处于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全球化阶段。各国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私有的资本实现了国际化、自由化，加上苏东剧变使世界上两大市场合二为一，生产的社会化在90年代真正达到了世界性规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欧国家还重点经营了欧洲一体化事业，法、意两国是重要推动者。在90年代，欧盟实现了统一市场、统一货币，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向深度和广度的推进进一步导致了西欧国家的调控能力减弱，如法、意这样的对国家干预具有较大兴趣的国家越来越难以抵挡新自由主义的攻势。

再者，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造成的大量结构性失业现象，加上法、意社会的老龄化，致使交纳社会保险费的在职就业人员越来越少，需要救助的对象却增加更多，国家需要用以维持社会福利保障的公共开支也越来越大。而此时西欧国家

经济陷入困境之中：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行，“悲惨指数”（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这样，以高生产、高发展为基础，以高工资、高开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支撑不下去，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福利开支有多半来自雇主，这些状况大大降低了雇主投资的兴趣和能力。因此，进入80年代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整个福利国家也陷入财政危机的困境之中。福利国家制度不仅成为把经济拖入泥沼的包袱，而且六七十年代实现的“充分就业”与“公平分配”也成为昨日黄花。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战后的法、意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两种发展模式：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充分就业、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与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被称作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总结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学习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优越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曾经为战后法、意等西欧国家的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和阶级矛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立下汗马功劳。7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以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放松国家管制，减少社会公共开支与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模式，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危机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它的兴起与盛行表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契合仍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伴随着这一模式的建立，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出现，也标志着法、意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经过一个缓和期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对抗积累期。

三、战后经济基础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异同的影响

以上分析的战后法、意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模式，正是社会党与共产党战后生存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对两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力量与影响等方面的异同及其演变起着决定性的、全面性的作用。应该注意的是，经济基础对两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影响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往往是经济因素要求政党首先对具有灵活性和现时性的具体政策进行改变，然后才会反映到具有刚性的意识形态上来。所以下面考察经济基础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异同的影响时，把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一)经济基础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纲领政策异同上的影响

鉴于经济基础对两党纲领政策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在此选取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一是关于两党的传统理论主张的国有化与私有化问题，二是关于两党在战后新形势下遇到的新问题，即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问题。

1. 关于国有化与私有化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当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推动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积聚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会允许利用国家的力量在经济生活中注入一定的社会因素。也就是说，通过国有化形式实现国家对一定资本的代管，可以缓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当矛盾一旦得到缓解，因为国有企业也必须参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市场竞争，国家代管资本所表现出的市场滞后性和僵化性束缚市场经济自由的资源配置的矛盾也就显现出来。于是，这些国有化的成果会再一次被释放为私有资本，私有化运动就会得到提倡。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欧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正表明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生产力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任何一个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党都是不能违背或者否认的，否则，它必然受到惩罚。而在传统观念中，国有化一直是被奉行社会主义的政党看作是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改变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社会党与共产党曾经在战后的第一个阶段大力实施国有化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成功，这种成功正是符合了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所致。当这一规律要求私有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时，社会党与共产党关于国有化的传统政策与观念就会在现实中遭到碰壁。法国社会党在20世纪80年代执政之初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法国经济已经处于凯恩斯主义和福特主义把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基本挖掘完毕，正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向下一个阶段艰难过渡的萧条时期。社会党政府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做出国有化和扩大公共开支的决策，结果不但没有振兴经济，反而在1982—1984年使法国经济跌落到战后的最低点，工业生产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些始料不及的后果迫使法国社会党政府迅速逆转了经济政策。意大利社会党在80年代初，意大利左民党在90年代中后期，执政时推行的私有化政策表明了同样的问题。因此，对社会党来说，国有化与私有化政策越来越成为它单纯地解决经济问题的具体政策，而不再是体现它的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特征的标志。对仍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替代私有制的共产党来说，由于其本质的革命性，以及它无需作为执政党承担政府责任的政治地位，仍然坚持着国有化的必要性的纲领主张，但是它对于公有制和私有制、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态度也逐渐呈现软化趋势。如法国共产党虽然在80年代参加联合政府时因固守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而退

出政府，但是在90年代的联合政府中它不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明白：执政的政党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2. 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使生产在全球资源中取得最佳配置真正得到实现了。欧洲一体化的开始是西欧各国为了通过发展自身实力以应对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而进行的联合。在西欧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聚集之地，欧洲一体化逐步向纵深推进的态势也展现出其更多的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必然带有剥削和不平等的痕迹，而且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主动推行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使新自由主义推行到整个世界的领域，私有化、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使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积累。这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成为了一把双刃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虽然给国家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但对西欧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仅看到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而且明白这些社会变化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其一，经济全球化帮助资产阶级，尤其是如跨国公司老板之流的国际垄断资本家把生产基地大量从西欧国内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使得本国内工作岗位大量丧失。其二，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使法、意等西欧国家的主权让渡的内容越来越多，尤其是为了配合欧洲一体化的各种指标（主要是经济指标）的完成，国家推行必要的经济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会极大地损害普通民众在社会保障和工作就业等方面的既得利益。正如达伦道夫所说，“在

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民族国家必须通过限制国家的权力来提高‘本地’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有必要采取‘削减’政策，而不惜破坏社会的团结，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陷于严峻的考验。”^①

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形势及其带来的诸多新问题，迫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增添了应对这一问题的新观点新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两党的政策主张中，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对策成为重要的内容。从不同的党的性质和党的政治地位出发，二者的反应是十分不同的。

作为既是改良主义政党又具有执政地位的社会党，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双重特性”的特征有所认识，因此它的应对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社会党赞同右翼新自由主义政党的看法，认为必须积极地推动这一客观进程，以保证经济发展。同时，因为各国政府共同参加这一零和博弈，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更改的经济目标值只能用牺牲社会目标 and 政治目标来换取”。^②所以，社会党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牺牲某些社会福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社会党不会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相信全球化产生的不平等有其内在的公正性，更不会认为对这种不平等现象应该具备较高的容忍能力。党的性质要求社会党要应对挑战，要对这一客观进程中产生的负面作用做出规范，提出各国共同进行全球治理，缓解跨国市场流通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以尽量维护中下层人群的利益。

共产党作为既是革命性政党又是在野党的身份，它则基本上持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② 同上。

一种抵制的态度：从全力维护劳动者利益出发，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消极和负面作用上，尤其是对劳动者利益的损害上，并把这种消极和负面作用解释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新特点，从中寻求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制度替代的新根据。同时，共产党根据历史经验认知到社会福利国家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在共产党在批判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对资产阶级的有用性的时候，体现出了其民族主义者的特征。

(二)经济基础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力量与影响异同上的影响

各种物质性力量的发展演变表明，战后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新的科技革命与科学的生产管理方式依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率先推广；其二，战后巨大的经济成就使西欧社会多数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三，发展模式的转换表明资本主义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内的自我调节。这些现象至少表明，目前法、意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尚没有处于激化的状态，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不是主张彻底推翻的革命主义，而是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的改良主义，成为法、意等西欧社会的主流思潮。社会党作为本质上属于改良主义的政党组织，在这种情势之下，最终完全放弃革命时代留下的革命性痕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党起初还保留制度性社会主义的痕迹，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都消失了。法、意共产党之所以会在战后几十年里逐渐淡化自己的革命性特征，甚至完全放弃自己的革命本质（如意大利共产党），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一个革命性政党很难争取到进行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必要支持。

具体说来，在法、意两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期，由于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政策实现左倾，先进生产力掌握在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手中，作为左翼政党的社会党与共产党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而且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倾向明显和斗争能力增强，激进的共产党往往成为领导者，或者说共产党的领导使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利用有利的经济基础更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这种状况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党的发展，因为社会党作为左翼政党中的改良主义政党，更符合此时经济基础对政党的现实要求。所以这一时期，虽然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力量与影响上都处于发展期，但是社会党的表现更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战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法国和意大利由于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福利遭到大量削减和压缩，同时又需要增大开支，因而社会福利制度难以继续维持，不仅不能保障长期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滑向贫困线以下，而且就业人员的工资也不再固定增加，甚至出现缩减，雇员贫困化现象日益严重；同时，大量失业者组成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雇主可以对就业者实行更大的剥削而无须担心会造成什么损失，加上国家干预力度的减弱，原来的不许任意解雇工人的劳资协定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经济的萎缩也使企业不再能够承担过大的劳动力成本。所以，在新自由主义模式阶段，就业人员的斗争力大大减弱，他们因害怕失业而不敢对雇主表示不满。在这种状况下，有利于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它不可避免地遭到自身逐渐萎缩的命运。而社会党作为“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继续找到发挥自己作用的地位：一方面，它在去除掉革命的痕迹后，通过积极采取私有化等政策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继续提出公正与平等的口号，争取消除社会不稳

定因素，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发展。因此，社会党在这一时期仍能够维持社会主流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政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当其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它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及其力量 and 影响会随之相应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直接影响了甚至决定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力量与影响的异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建立影响了甚至决定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在80年代以后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力量与影响的异同，而两种模式的变动影响则决定了社会党与共产党两个阶段转变的方向。

第二节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基础比较

政党生存的社会基础，是指政党以社会上哪些群体作为自己的支撑力量，是政党生命的力量之源。显然，它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密切相关。对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来说，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群众性政党，依托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撑是它们生存的社会基础。

一、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变动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阶级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一无所有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同时马克思也承认，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里，另外还有中等阶级和农民阶级存在。尽管法国和意大利在西欧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较为迟缓曲折，其国内的社会阶级阶层长期带有农民阶级和城市小生产者的特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产业阶级相对西欧其他国家较为弱

小，长期深受农民阶级和城市小生产者势力的影响。但是在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和生产发展的推动，法、意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其他西欧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有了共同的发展特点。

在资产阶级方面，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性大垄断资本家（如跨国公司老板）、一般性私营公司的拥有者，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公务员等等在内的阶级阶层包含在其范围内，从而体现出多层次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时期一样，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只占极少数比例，却拥有绝大多数的财富。鉴于我们研究的是左翼政党，其社会基础是劳动者阶级。^①所以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战后劳动者阶级的状况。

（一）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西欧还处于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的工业化社会里，传统制造业仍然是工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的后工业社会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新兴工业部门不断出现。整个经济结构出现第一产业迅速萎缩，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膨胀的现象。二战前，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在国家中的比例为48%，法国为36%；到1950年，这一数字在意大利为41%，在法国为33%；到1960年意大利的农业人口的比例为31%，法国为22%；到1970年意大利为21%，法国为14%；到1977年意大利为13%，法国为

^① 西欧学者对于战后西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动后的“劳动者阶级”、“工人阶级”、“中间阶级”等阶级阶层的划分有着各不相同的见解，争议很大。这里对于在本章内涉及到的容易出现歧义或混淆的几个概念明确一下：“劳动者”、“劳动者阶级”或“雇佣劳动者”，是与资产者相对应的概念，包括所有付出自己的劳动、受到资产者雇佣的领薪者。“工人阶级”指以体力劳动为主要劳动形式的劳动者，主要包括第一产业中的农业工人、第二产业中的蓝领产业工人和第三产业中服务性工人。

10%。^①这些数字显示在法意两国多余的农业就业人口已经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上去：农业和家庭都被卷入工业化浪潮之中，小手工业生产方式和传统的服务性职业由于工业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业生产的出现而日渐消失。最突出的现象是，由于家务劳动的机械化帮助妇女劳动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得她们也投身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从而最终实现了雇佣劳动的普遍化，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也就相应地大大壮大。

战后法、意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迅速增长，在经过生产过程细化的生产流水线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大量的非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工业劳动力的数字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几乎没有下降过。据统计，战后法国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分布百分比：1946年为29.5%，1954年为35.7%，1962年为39.5%，1972年为39.1%，1975年为39.1%。^②在意大利，1981年该国生产者占就业人口的20.9%。^③除了第二产业的工人之外，第三产业由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就业劳动力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中工人阶级队伍也是相当庞大的。他们充斥在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等种种由于经济增长进入消费社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服务行业之中。正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在整个黄金时代，工人阶级平均约占就业

① [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马清文译：《晚期资本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附表。

② [法]弗朗索瓦·卡龙著，吴良健、方廷钰译：《现代法国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0页。

③ 沈汉著：《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总人口的1/3，甚至连老牌工业国家也不例外，如法国。八国集团的国家在1960—1980年的工人数目是不断增加的。”^①

在工人阶级占据就业人口的1/3左右，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新中间阶级的数目呈现出更大的发展势头。一是由于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需要大量多层次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生产线生产的整体监督和控制，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内部出现。二是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保险业、信息咨询服务业，以及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如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等部门都需要大量的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就业人员。另外，在新科技革命催产出的如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内，就业人员一般工作在办公室内，被称为职员，与工作在厂房中或生产流水线上传统产业工人有很大的不同。三是如律师、医生、自由职业者之类依靠本身专业知识就业的人员大量产生。四是由于国家加强国家社会管理的职能，完善公务员制度，各级公务员队伍日益庞大，形成一个稳定而数目众多的公务员阶层。这些人被称作新中间阶级。他们是领薪者，属于雇佣劳动者，而与拥有一定私有生产资料的传统中间阶级如小企业主、小农场主、独立经营者不同。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前主席H·孟德拉斯曾经根据经济财产和文化遗产进行了划分：从其上限看，高级干部、企业领导人和高级公务员不包括在内。工商界独立的大企业主以及公证人、大律师、著名医生等“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也排除在外。从其下限看，移民、体力劳动者和职业工人不包括在内。因

^① [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莹译：《极端的年代》（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

此属于新中间阶级的阶层主体就是职员和科技人员。^①虽然这一时期法国和意大利的中间阶级人数不如美国庞大，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在1956年就已经超过工人人数，但是中产阶级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还是逐年增大的。法国1968年的自由职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加上职员和管理人员占有所有就业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25.8%。^②意大利在1971年职员的比例也占据了就业人口的17%，到1981年自由职业者、经理、职员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则已经上升到37.5%。^③

总之，在这一阶段内，工业部门的工人阶级队伍是强大的，他们占据社会主体部分；同时，新中间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与工人阶级力量的差距逐渐减小。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二阶段

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随之产生的是，法、意新兴的信息工业等部门和新使用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再使用半熟练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而是需要熟练技术工人。于是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工人很难再找到工作。同时，经济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使法、意第二产业中传统的采掘业、钢铁业、造船业、纺织业、机械加工业急剧萎缩。传统工业的消失使大量蓝领工人的岗位不再存在，这是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迅速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一时期，法、意

① [中]胡伟、[法]H·孟德拉斯、M·威莱特主编，胡伟译：《当代法国社会学对战后法国社会变迁的观察与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4页。

② [法]弗朗索瓦·卡龙著，吴良健、方廷钰译：《现代法国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0页。

③ 沈汉著：《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第三产业所需要的新中间阶级继续扩大。在80年代，法、意的新中间阶级已经代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同时，结构性失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失业在西欧各国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欧盟国家在90年代长期高达10%以上的失业率表明社会上出现了长期失业者，他们因没有工作而日益贫困化；另外，孤身抚养子女的妇女、外籍人和老年人，也是陷入新贫困之中的社会边缘阶层，而社会福利在八九十年代的不断削减使这些人的处境越发恶化，成为“新无产阶级”。一般认为“新无产阶级”仍然属于雇佣劳动者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出身都是雇佣劳动者。为了生存，他们也是会不断寻求工作，即使是短工、黑工。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产业工人队伍迅速萎缩，新中间阶级超过工人阶级力量，成为社会主体；同时，新无产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重大变化。

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

在战后两个发展阶段，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的社会基础在发展特点上有着历史延续性的相似点，但也有着阶段性发展的不同点。

（一）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阶段

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意雇佣劳动者内部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工人阶级的“非无产阶级化”。二是雇佣劳动者在具有浓厚的集体意识的同时增强了多元意识。

首先，马克思曾认为工人阶级对于生产资料一无所有，所以称之为无产阶级。到20世纪下半叶，法、意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出现了质的变化，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是“非无产阶级化”。这种“非无产阶级化”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的经济

增长与日益完善的社会福利，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劳动者的工资得到了持续上升，定期增长工人工资的机制得到了建立。如一向以工资低廉出名的意大利在60年代，雇员平均工薪收入年增长率为6.7%。^①法国的工资更高一些：每个人，无论工作的，还是失业的，也不管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如何，都可以享受家庭津贴、社会福利补贴、住房补贴等福利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把失业、残疾、疾病、老年等困难时期的风险降到了较低的水平。所有这些，使得战后的法、意工人改变了过去无产者一无所有的绝对贫困的景况，他们的购买力有了不断地提高，不仅可以做到“既让皮埃尔穿暖而又可不剥掉保罗身上的衣服”。^②在法国、意大利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迈进消费社会的门槛。

所以，我们说当福特主义兴起的专业化大生产要求工人们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时候，当工人们的确可以把小汽车、彩电、冰箱等大型耐用消费品买回家的时候，当工人们还可以面对商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做出自己个性化选择的时候，法、意的工人阶级作为消费社会中的一员，就已经不再是19世纪的无产阶级了。战后私人消费开支迅速增长的客观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1950—1973年间，按不变价格计算，法国和意大利的私人消费开支都增长两倍以上。^③另外，由于缩短工时，增加带薪休假等政策的实施，劳动条件比战前有了很大的好转。这种生活水平使工人阶级不再如以往的

① 张世鹏著：《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② [法]弗朗索瓦·德克洛泽著，张庚辰、杨荣甲、林方、李琴译：《多多益善——法国社会生活内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15页。

③ 黄素庵著：《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无产阶级一样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完全没有交集，而是有一定能力与资产阶级一起分享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出来的种种物质财富。从这方面说，法、意两国工人阶级的“非无产阶级化”现象在这个时期是非常突出。

其次，众所周知，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自19世纪中期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因其工作、生活环境相对集中，表现出相当明显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明确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距离甚远，即使与中产阶级之间也有着迥然不同。他们与社会其他阶级大量隔离而自成一体，有自己鲜明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蓝领工装是他们的典型特征），住房条件和人生机会也受到极大限制。有人甚至说他们与耐用消费品基本无缘。这个时候，他们的集体性气质是很明显的：往往通过组织（先自发后自觉）进行相互之间的救济，进行罢工、游行和投票等活动。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与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这种集体性的阶级意识不断得到认可和强化。这是法、意工人运动能够不断开展，工人政党能够获得群众性政党特征的根本原因。法、意工人阶级这种凝聚一体的意识，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高峰。^①进入20世纪下半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第二产业继续处在不断发展的时期，适应福特制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大量群众性工人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集体意识。这一集体意识的繁荣期一直延长到20世纪70年代的老工业区。如巴黎周围的工业地带，意大利北方工业城市中大如米兰，小如博罗文亚等地，虽然工厂内部的生产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生产流水线上所做单调工作的相似性，

^① [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董译：《极端的年代》（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以及工人住宅仍具有集中性，都保证了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得到一定保存。这种集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工会组织力量的强大。工人经过多年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深知利用组织力量获得自身权益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法、意工会入会率是相当高的，不仅存在综合性的全国总工会，而且在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工会的活动活跃频繁，工会的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它在建立完善的、固定的，国家、劳方、资方三方劳资协调机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作为代表劳方的主要组织，在处理劳资矛盾时对政府和左翼政党有着重要影响。

然而，当产生集体意识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贫穷和集体化的生活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抛弃时，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也就出现了逐渐减弱的趋势。市面的繁华，充分的就业，一个真正消费社会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法、意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科技的进步，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有了电视，电话等，加上各种平民化和私人化的娱乐方式，工人就不再参加过去的组织、工会、党派等集体生活。贫穷与集体化的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①

在工人阶级集体意识不断减弱的时候，崇尚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其内部也不断衍生出来。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中间阶级处于不断壮大的过程中。而中间阶级与生俱来就具有多元化或个性化的特点，因为中间阶级本身包含着利用不同专业和不同技术谋生的不同职业的雇佣劳动者，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较好的收入待遇使他们可

^① [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董译：《极端的年代》（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页。

以拥有较大的自由，过着具有自己个性的生活。在黄金时代，消费社会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张扬个性主义的倾向。从人们对“消费主义”的定义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个人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消费主义的产生是因为普通人的自我表现最容易在消费行为中寻找机会。由于消费主义的影响，人们把购买看作是力所能及而又令人愉快的活动，消费不再被看作手段而被看作目的本身。消费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可能使消费者的购买动机更加捉摸不定，例如市场上有红、白等颜色的小汽车可供选择，但是消费者偏偏会选择其他颜色的小汽车，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①因此，随着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工人“非无产阶级化”在整个雇佣劳动者阶级逐渐扩展开来，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也就日益减弱，雇佣劳动者个性多元化的特点渐趋突出。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内，法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从而多元意识代替集体意识成为雇佣劳动者的主要思想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如前文所述，这个时期第二产业的众多传统工业部门的凋零和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让位于后福特制的生产组织方式，使得文化专业水平不高的，习惯于集体性劳动和生活的工人人数大量减少。法国巴黎周围、意大利工业三角区“米兰—都灵—热那亚”等城市和地区中以工厂企业聚集在一起的老工业区变得一片萧条，就是一个明证。随着以集体方式进行工作和生活的工人人数的锐减，雇

^① 郝万祿、刘智勇主编：《简明西方经济学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佣劳动者的集体意识也就大幅度削弱了。

其二，伴随着新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法、意雇佣劳动者内部的阶层分化也日益加快。不同阶层的雇佣劳动者的思想意识是千差万别的，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这种雇佣劳动者内部的阶层分化及其特点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工人阶级内部越来越呈现出两大分层。处在上层的是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人或者技术工人；他们的职业具有一定稳定性，是较多社会保障的享有者；他们珍视自己的才能、知识，注重实际原则，往往能够很快适应后福特制劳动组织方式和新生产力发展变化要求的自动化大生产的工作，一般与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识是具有相当的自主性的。处在下层的是临时工或者代加工企业的劳动者。他们主要是体力劳动者，或者是技能工人的帮工，或者是大型土方工程（如采沙场）之类工种的工人，一般职业不稳定，享受的社会保险也是低级的和少量的。^①外籍工人和结构性失业者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严峻时期他们往往成为失业者，乃至长期失业者。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两个阶层差距是逐渐加大的，这种差距随着新自由主义对福利政策及统合主义体系（劳资协商）的施压逐渐地显现出来。前者憎恨后者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而依赖于福利政策维生，从而增加了自己的负担，因此在政治上开始右倾。后者则在政治上依赖于左翼政党以对自己的景况进行改善。

二是这一时期的新中间阶级内部出现了比前一时期更为复杂和

^① [中]胡伟、[法]H·孟德拉斯、M·威莱特主编胡伟译：《当代法国社会学 对战后法国社会变迁的观察与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6-157页。

剧烈的分化现象。正如前文所说，新中间阶级本身包含的不同职业和不同部门的就业人员之间有着千差万别。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导致新产业部门不断出现，这种差别是不断变化的。不同专业和不同技术的就业人员之间的非相似性使得他们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新中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已经出现。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某些部门出现劳动力饱和状态，加上科技革命使大量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机器代替劳工，以及日新月异的产业变化导致的严重结构性失业，所有这些已经越来越多地冲击到新中间阶级，大量白领阶层人员丧失原本具有稳定收入和保障的工作，成为工人阶级中的短期就业工人，甚至沦为失业者。有着这种遭遇的群体与仍然享有稳定工作和生活保障的群体之间思想意识有着很大差异。

三、战后社会基础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异同的影响

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和雇佣劳动者的新特征，作为劳动者利益代表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的状况，对战后两党的异同起到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一) 社会基础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异同上的影响

社会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雇佣劳动者中的中上阶层，即新中间阶级，并且兼顾部分下层的工人阶级，而共产党是以雇佣劳动者中的中下阶层（即蓝领工人）为主要的社会基础。这种不同的社会基础及其变动影响了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异同。战后，正是由于法、意工人阶级倾向于共产党，本来属于工人阶级右翼的社会党陷入了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的困境，寻求其他的阶级基础和群

众基础是它们的当务之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间阶级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一部分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和政治抱负。他们崇尚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与工人阶级右翼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从工人阶级的上层群体中演变而来，或者与工人阶级上层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等有着很大的相同。这正好与急于寻找新的社会基础的社会党一拍即合。所以，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在进行政党整顿之后，宣布其代表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代表新中间阶级的利益——这样既维持了自己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党形象，又顺应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同一时期，法、意共产党由于自身的社会基础即工人阶级仍能保持稳定的壮大，并不急于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所以这一时期法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即使是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合作，也要表明自身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特例。它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宣布自己是一个全民党，不局限于工人阶级性质。当然，意共这一做法与其特定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从社会基础的角度看，在意大利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意大利共产党面临的对手是一个包含多个阶级阶层的全民性质的宗教性政党——天民党，工人阶级中的很多人因其信仰之故支持天民党。因此，共产党如果只局限于工人阶级性质，必然难以与天民党相抗衡。但是意大利共产党虽然放宽入党的阶级限制，却始终坚持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思想（这除了是共产党的革命性奋斗目标所要求的之外，工人阶级占据社会主体地位也是重要的原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中间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党也已经成为它的主要代言人。考虑到新中间阶级的多元性、非集体性和改良性，社会党在指导思想、阶级基础、奋斗目标等各个

方面进行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意大利社会党的“现代改良主义”运动中表现得甚为突出和明显。20世纪90年代凸现的新无产阶级现象，同样受到了社会党的重视，如法国社会党提出“新阶级联盟”战略，试图仍然保持完整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的政治代言者的形象。而意大利社会党的政治衣钵继承者——左民党因“出身”于共产党，首先需要稳固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即中间阶级。在90年代的过渡时期，虽然左民党并没有如法国社会党那样政治上明显地表现出倾向于新无产阶级，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漠视新中间阶级“新无产阶级化”现象。在这一时期，法国共产党起初仍然坚持原有的单一的阶级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具有团结精神的工人阶级才具有斗争性，才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坚守与社会阶级阶层的真实变化（工人阶级集体意识的削弱与工人阶级本身的萎缩，新中间阶级的扩大，雇佣劳动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最终成了“两股道上的跑车”。在持续衰退之中坚持了十余年之后，法国共产党终于认识到固守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只能自取灭亡，获得包括新中间阶级在内的所有雇佣劳动者的信任才是再次振兴的必由之路。所以，在90年代的革新时期，法共提出了要代表所有雇佣者的利益，而不再优先考虑工人阶级的特殊性的主张。在这个时期，即使是需要突出共产党特性以保证自我存在价值和必要性的意大利重建共，也在坚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同时，开始试图以包含多元化意味的“社会下层群众”的概念来减少“工人阶级”概念表现的社会基础单一性的弊端。法、意共产党还在指导思想实现多元化，在党的组织上提出开放和民主，以满足作为社会基础的雇佣劳动者们多元意识。

(二) 社会基础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政策主张异同上的影响

在选举社会里，政党的政策主张是直接吸引选民，或者说是巩固党的社会基础的工具。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什么变化，或者说社会基础即选民关注什么问题，直接决定了政党的政策主张。因此，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何种变化，它们的政策主张总会出现相应的反应。社会基础的异同也就直接决定了社会党与共产党政策主张的异同。

因为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的社会基础都是雇佣劳动者，所以它们的政策主张都明显带有左翼的维护中下层人民利益的色彩。如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期，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共同坚持国有化运动和社会福利政策，意大利社会党与共产党也是福利国家的推动者和坚持者。又如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时期，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党都坚持进行欧洲一体化建设时，强调人道的、民主的欧洲，强调进行欧盟内部移民问题和劳工保障问题的协调——这与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重建共要求欧洲建设应以实现充分就业和改革福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是有很大相似性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是有所不同的：社会党更多地依赖于中上阶层的新中间阶级，而共产党更多地以中下阶层的蓝领工人为社会基础。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时期，两党对待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态度和政策的区别明显体现了这一点。新中间阶级能够凭借自身较高的专业优势和知识水平，很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变化，同时他们由于信奉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遭到淘汰的人们是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能力低下者、懒惰者和游手好闲者，所以不愿为这些人即下层人民交纳自己应付的社会保障费用。而社会下层群众由于难以承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压力而日益贫困化，

失业津贴、社会救济等社会福利往往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赖以生存的主要收入，所以他们对于经济全球化是持否定态度的，要求落实和扩大社会福利。显然新中间阶级和社会下层群众对待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福利的态度是迥异的。为此，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福利上的政策也就有了明显的区别：社会党顺应新中间阶级的要求，承认经济全球化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且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提出变过去的“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以对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等方式来减轻社会福利制度的负担；共产党则顺应社会下层群众的要求，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社会公正的损害，要求维护社会福利制度。

(三) 社会基础对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力量与影响异同上的影响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社会基础上的变化是两党力量与影响异同的根本原因。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人阶级是法、意雇佣劳动者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处于上升趋势，其比重长期保持在40%以上。工人阶级较强的集体意识和斗争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工会，它在国家、劳方、资方三方劳资协调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工人阶级占据社会主体地位，劳资力量对比倾向于劳方的状况，保证共产党拥有了坚实而有力的社会基础。因此，共产党不仅在选举得票率和党员人数上都能够得到较好的收获，而且对外围组织的控制力也较强。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福特制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发展达到顶峰，法、意工人阶级力量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法共和意共相应达到了自己力量发展史上的最高点，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这一时期，由于法、意的新中间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既保留对工人阶级的一定吸引力，又作为新中间阶级的当然代表者的社会党也处于

发展上升阶段。法国社会党在六七十年代的不断发展是一个充分的例证。即便因为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政坛上长期占据着改良主义左翼政党的政治位置，意大利社会党的力量影响情况与其他西欧国家社会党有所不同，但在这个时期它也比50年代多出了十几万的党员。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和新中间阶级的迅速崛起，社会党力量持续发展壮大，共产党则渐渐地一蹶不振。不论是党员人数、外围组织还是选举得票率等都清楚地显示出：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各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战后由于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动，雇佣劳动者的多元意识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左翼及其发动的新社会运动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社会基础性原因。新左翼建立的政治组织在80年代之后逐渐在法、意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绿党是它们中间的主要代表者。^①它们凭借着对新形势新问题的敏

① 新左翼及其新社会运动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风靡西方的违反运动，形成于70年代，80年代获得空前发展，90年代发展势头依然不减，成为令人不可忽视的左翼政治力量。它包括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生代运动、生态运动，等等，其中以生态运动为主要流派，女权运动为重要流派。这是在对待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变时，新中间阶级或者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向社会提出争取自己权益的呼声，或者说是因重视战后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如不顾生态后果的经济高速增长、妇女压迫、经济帝国主义等）引起的新冲突，而对世人作用警告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新左翼及其新社会运动，在这样几个方面挑战着传统工人运动：一是社会基础的散漫性，同性恋者、性别主义者、绿党、和平主义者、青年、学生或专业人员等，以及一切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人，是它的社会基础。二是组织形式的分散性，多为分化的、散漫的个体和小团体，目标和组织形式各种各样，而不具有什么约束性。三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四是抗议手段的非暴力化。五是文化价值取向的个人主义化。

锐反应和及时对策,夺取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大量选民。相比而言,社会党要比共产党更及时地注意到这一点,较快地吸收了新左派中重要的观点和主张,所以遭受的挤压相对较轻;共产党则反应相对迟缓,处境较为艰难——这也是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持续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90年代,另一支政治力量从另一个方向对社会党和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极右翼政党^①的崛起。以新无产阶级为社会基础主体的极右翼政党,对社会党来说,目前还不能从社会基础上剥夺社会党的势力,它的出现更多地是提醒了社会党在纲领政策上更加关注那些心怀不满的社会下层群体,更加努力解决公正与效率的矛盾问题。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极右翼政党的出现不仅加大了共产党在纲领政策上提出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负面作用的困难与紧张程度,而且直接侵蚀了它的下层群体的社会基础。这种因战后社会基础变动引起的政治格局变化,对社会党与共产党产生的不同影响,也是造成两党在力量与影响上出现盛衰逆转

^① 极右势力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出现,80年代力量逐渐壮大,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加深,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在以法、意为代表的西欧全面异军突起。在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法国、荷兰、丹麦、德国、瑞典、挪威等国,或者是极右翼政党获得执政或参政权力,或者是在议会内或地方政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目前西欧各国似乎只有爱尔兰和葡萄牙两国内极右翼活动不甚突出,其他国家都出现了它们的身影。2002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总统大选中击败社会党,进入第二轮选举的事件,向世人清楚地展示了西欧政治的右倾化。

极右翼政党以推行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为己任,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明显法西斯痕迹的、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极端政治力量。它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新无产阶级”,虽就业但面对弱肉强食的社会缺乏生活安全信心的民众,以及法西斯势力的一些残余势力。他们一方面痛恨跨国资本家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外国投资,另一方面痛恨侵占其工作岗位的外来移民,因此种族主义死灰复燃的,成为他们手中的重要武器。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说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不公现象已经招致民众的极大不满。

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战后法、意社会阶级阶层变化的本质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它作为政党的生命力之源决定了战后社会党和共产党根本的政治命运和发展演变：由于工人阶级本身的式微和非无产阶级化的特征，共产党一贯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共产党不得不在不可避免的衰退中改变原有的思想意识，把社会基础从工人阶级扩大到整个雇佣劳动者；社会党本身具有吸收劳动者中上阶级的性质，它很快把自身的社会基础从工人阶级扩大到新中间阶级，这种变化顺应了战后新中间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客观事实，也因此，社会党不仅在战后的力量与影响获得逐步的壮大，而且成长为主流政治力量之一。

小 结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生存的经济社会基础的状况及其变动，是战后两党的异同以及异同演变的最深层次的根源，直接影响了两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力量与影响等方面的异同及其演变。

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实现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完成了两次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生产力方面质的飞跃，先后顺利地建立了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两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由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的是社会基础即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动：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时期，工人阶级仍然占据社会主体的地位，同样属于雇佣劳动者的新中间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尽管工人阶级内部和新中间阶级的多元意识已经出现，但是工人阶级仍具

有浓厚的集体意识。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时期，由于工人阶级队伍大量萎缩、新中间阶级上升为社会主体部分以及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新无产阶级出现，雇佣劳动者的集体意识逐步瓦解，多元意识成为社会主流。

社会党与共产党赖以生存的这种经济社会基础，决定了战后法、意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呈现出同一社会性质下的两个阶段：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推行期间，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国家力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调整成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保证了这一生产关系容纳的生产力得以进一步释放。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模式出现危机时，资产阶级适时地启用新自由主义模式，使受到束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推动下的市场经济得以自由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资源配置。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全球意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并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旺盛的生命力。当然，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启用，生产关系再一次出现了少约束、少控制的现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和市场的盲目性等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因素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中的对抗与斗争因素也在逐渐增加。

总结战后法、意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运动状况，对经济、政治、社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出，随着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在实现充分就业的雇佣劳动者中，崇尚温和改良路线的新中间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工人阶级也满足于已脱离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状态。加上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制度性威胁长期存在，社会改良主义在法、意等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在各方面的统治地

位。^①所以，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社会党能够在这一时期获得发展壮大；保持相当实力的共产党则一方面领导工会和群众，进行与资方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却走向民主的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一路减去革命特征。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第二个阶段内，改良主义仍然作为左翼中的主流力量，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右翼力量推动新自由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矛盾中的对抗性因素增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社会党这样的改良主义力量去缓解社会紧张情势，消除社会弊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发展，虽然它并不能完全达成这些任务。另一方面，革命性的共产党由于社会基础的大幅缩水而迅速衰落成为一个弱小的政治力量；这一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对抗的状况，也决定了此时的共产党无需也不能担负起发动革命的历史使命。

^① 这里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关于改良主义确立的三个基本柱石理论。三个基本柱石是指：一是具有统一归属意识的工人阶级在规模和数量上的保证，二是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三是充分就业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推行。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张世鹏编译：《工人阶级的世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第37页。

结 束 语

通过对战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力量与影响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导致两党异同及其演变的经济、社会、政治性根源的考察,也许可以得出关于法、意等西欧社会党与共产党,以及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一般性的认识。虽然对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复杂的历史实践来说,为免把事情简单化,这些一般性认识也许还不能冠之以“规律”,但是这种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科学分析基础上得出的认识,在有兴趣的人士寻找本书开始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也许能够对他们有所启示。

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党与共产党不同的政治命运

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命运: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从弱小的党成长为强大的、具有执政资格的主流党,革命主义的共产党则从强大的党衰退为弱小的、边缘化的党。对于这一现象,应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上去认识。

战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处于基本缓和状态,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展时期。这决定了社会改良主义在经济、

政治、社会和思想上占据了全面的统治地位，从而根本上决定了改良社会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在战后的政治命运和发展演变：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时代，社会党可以作为代表劳方利益的政治力量，与代表资方利益的右翼政党轮流执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同时，尽管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性，改良主义不能完全把革命性力量排挤出资本主义社会之外，但也限制了革命主义性质的共产党只能存在于狭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内，使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带有更多温和的类似于改良的痕迹。

如果把考察的眼光延伸到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成熟期后，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改良性和革命性的两大政治力量就始终存在着。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发展时代和革命时代是交替出现的。伴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改良性政党与革命性政党的发展演变也出现了螺旋式上升的“循环”现象。具体的说，以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适合改良主义政党生存与发展的时期，此时改良性政党往往可以获得发展壮大，而革命性政党或者力量只能保存在较小范围之内，或者受到极大挫折；反之，在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革命主义政党会风生云起，改良主义政党则会消沉下去。这种状况不断重复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的生产力全部释放完毕之前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它已经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重复出现了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发生在19世纪。19世纪上半叶，西欧处于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全面宣战的关键时刻。在这一革命占据主流思想地位的时期，倡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主要思想。在它的指导下，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开始建立，同时，向资产阶级展现出

自己强大的革命力量。19世纪70年代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各国相继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自由竞争发展到顶点，开始向垄断过渡。资产阶级以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形式稳定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并着手强化国家机器和完善政治体制，如普遍确立议会制度，建立文官制度，形成多党政治，扩大普选权范围，出台劳工福利政策，征收累进所得税，种种资本主义政治改良政策不断出台。在这种突显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时期，改良主义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各国社会党内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和分歧，正是这种改良主义力量在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中逐渐发展的集中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西欧大多数社会党投票赞成本国政府参战，则明确显示出这种改良主义思潮已经占据了左翼中的主流地位。这是革命性思想与改良性思想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而进行的第一次交锋。

之后不久，第二个回合就已经开始。一战的爆发，标志着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引发的资本主义危机使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到来。20世纪20年代，西欧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在苏联革命的推动下，纷纷从已转变为改良性政党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称号为共产党。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经受住了战争与法西斯的考验，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同一时期，社会党却表现得萎靡不振，或者在战争中组织分散，难以发挥政治作用，或者在政治生活中扮演共产党忠实的小伙伴的角色。这一时期，劳动者政治组织中领导者的位置由改良派让位给了革命派，此时出现的社会党“共产党化”现象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次交锋就是我们所研究的战后时期。5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

改良主义在这一新的发展时期又一次充当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此时，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一举成为西欧政坛上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主要力量，革命主义的共产党则经受到挫折。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内，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改良性与革命性政治力量交替占据着左翼的主流地位。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始终发挥着作用的规律，它恰恰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应该注意的是，在每一次的回合中，由革命性力量与改良性力量共同组成的劳动者阶级的力量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都会比前一个回合中向前发展了一个阶段，而不是简单的重复。例如，与第一个回合的19世纪下半叶相比，二战之后代表劳方利益的左翼政党（包括社会党与共产党）无论是在政治地位、力量与影响，还是纲领政策的成熟度上，都远远不是19世纪末的社会党所能比拟的，它们自身的发展以及与资产阶级斗争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心福利国家的建立，把19世纪末的革命者与改良者共同的奋斗目标一一实现的事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另外，在不同的时代内，改良社会主义力量（社会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共产党）的轮流获得发展，并不是说另一方就会消失或灭亡，而是指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需要暂时不会发生主要作用。

因此，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发生力量失衡和淡化激进特征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必然现象。那么，依据否定之否定规律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只要资本主义仍然继续下去，这一现象就会重复出现。当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再次出现对抗和激化状态时，时代主题再次由发展转变为革命时，代表劳动者利益的革命性力量，将会再一次代替社会党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作

用。当然，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还处于上升阶段，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发展的时代仍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改良与革命力量的第四个交锋在这一时期内还不会发生。^①因此，在目前发展的时代里，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作为代表雇佣劳动者的主要政治组织，参与到资本主义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状况是不会改变的；仍能够存在的革命主义的共产党则会显现出在政治生活中遭受边缘化的态势，并在自己的纲领政策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一些社会党的色彩。

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伦理双重内涵的认识历程决定了二者在奋斗目标上的不同转变

战后，在奋斗目标上，社会党从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二元性转变为伦理社会主义的一元性，而共产党则从制度社会主义的一元性转变为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二元性。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应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去探究社会党与共产党在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伦理双重内涵的认识上所经历的不同发展历程。

^① 根据最为人们所承认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波理论（康特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理论），现阶段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顶峰时期，此后将逐渐走向衰退，大约再过20—40年的时间，将会进入经济发展的谷底。关于这种理论和结论，参见[俄]康特拉季耶夫：“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薛敬孝：“论长波框架中的世界经济走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3页。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政治文化。^①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社会平等要求、财产公有主张和民主思想，以及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闵采尔的《千年太平天国》等描述的大同社会，还是19世纪前半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计划，这些社会主义思想中都包含了一种新旧社会更替的观念。新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实现社会平等、财产公有和民主自治等基本价值。显然，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明显地蕴涵着伦理道德的内容，也暗示着新旧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上存在不同。

19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它表明，新旧社会的更替是经济、政治等基本制度的全面更替，然后是伦理目标的实现；^②同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① 所谓人类优秀的政治文化，是指那些由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而极具生命力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或政治价值。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②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用人性、平等、自由、正义等美好的道德理想对腐朽的社会关系进行道义谴责确实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步骤和组成部分，但抛开物质的生产方式和人的阶级属性，单纯地谈道德价值，只能是虚幻的东西。离开制度社会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罢了。这里可举一例：如对“平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消除贫富差距，保证广大劳苦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实现了平等；而如哈耶克等资产阶级理论家则认为，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就是限制富人能力发展，是对富人的一种不平等待遇。

即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转变为可以指导现实的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真正突显出社会主义的双重内涵——制度性与伦理性——的统一性，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践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剔除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内涵，明确社会主义是单一的道德诉求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欧开始出现。伴随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伦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断蔓延，并被工人阶级政党中的改良派尊奉为指导思想。此时，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模式的建立，使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内涵变成现实，从此也给工人政党中的革命派以明确的榜样目标。这样，制度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分别与革命和改良划上了等号，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双重内涵在认识上被割裂开来。

当工人政党的改良派与革命派分裂为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时候，由于当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革命社会主义占据了左翼的主流地位；此时，苏联革命的成功也使革命社会主义者获得了把制度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制度的成功经验。在这种形势下，20世纪上半叶，改良性的社会党在遵循伦理社会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完全与制度社会主义相隔离，反而保留着制度性替代的奋斗目标；而革命性的共产党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重点强调制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并出于与社会党划清界限的生存需要，在很长时间里“忘记”了伦理社会主义同样是“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共产党往往把关注的中心放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变革上，却忽视了民主、自由等伦理性目标。长此以往，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双重内涵遭到严重分离的苏联模式，而这种模式长期成为法、意

等西欧共产党效仿的榜样。

战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社会党与共产党都呈现出了重视社会主义的伦理内涵，向伦理社会主义靠拢的趋象。社会党已经开始从战后初期的坚持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二元并举逐渐转变为伦理社会主义的一元独尊。因为随着改良主义在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占据主流，社会党作为改良主义的主要代表者，已经逐渐把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与资产阶级内部的改良合二为一。事实上，社会党的改良完全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社会党也就不再需要革命性的奋斗目标，它是把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幻化为虚无的价值观念，完全倒向了伦理社会主义。同期，共产党却从战后初期以制度社会主义为一元独尊逐渐转变为以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二元并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战后西欧社会主流中改良主义的盛行，制度性替代的奋斗目标使共产党难以生存和发展，这种状况使共产党只能寻求突出精神领域中对资本主义变革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制度社会主义的样板——苏联模式在现实中的失败，提醒共产党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涵，重新认识到伦理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这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本质仍具有革命性的共产党不可能像社会党那样，完全放弃制度社会主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统一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概念的这一科学内涵，符合这一理论或者按照这种理论指导进行政治斗争的政治力量，应该能够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战后的社会党把制度性替代完全舍弃，又一次把社会主义的双重内涵隔离开来，在目前的社会基本矛盾缓和的阶段，这一做法一般不会阻挡社

会党的发展。因为，在发展时代利用伦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更人道的改造，是社会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功绩，但是在它的发展中将会存在这样的隐患：当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对抗因素增加，制度性替代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时，它将面临着必然的困境。共产党在经历对社会主义的双重内涵认识上长时间分离后，终于实现了其对制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统一性的科学理解。这有助于它在今后的发展中做到：一方面，在发展的时代里，通过对伦理内涵的呼吁推动资本主义文明化和人道化的改造，这样既可以保证党不会脱离时代精神，允许自己能够客观冷静地对待社会党右倾的发展趋势，并进行适当的联盟与合作，以应对右翼的压力，又可以稳固党在民众心目中的有用性和正当性，以在不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能力。另一方面，依然肩负着制度替代的历史使命，可以使共产党在发展的时代耐心地积蓄力量，而不是妄自菲薄地贬低自己的价值，同时提醒它在纲领政策、组织能力等方面为下一个革命时期的到来做好准备。

三、政党自身应对生存基础和发展空间的变化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直接原因

鉴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对两类左翼政党的比较分析，我们在分析两类政党之间异同的根源时，重点着墨在造成社会党与共产党异同的客观性因素上。但是，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刚性的政治组织，它自身主观上的反应与举措也是造成其力量起伏，甚至是命运存亡的重要原因。这种主观反应相对于其生存基础和发展空间的变化，是否滞后，滞后的程度如何，是影响政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及时跟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进行主观上相应的

革新，那么政党的生存发展就会陷入困境之中，甚至走向消亡。从法、意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演变中正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意大利社会党本质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但是它一直依附于革命性政党意大利共产党而生存，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早已建立，而且已经开始暴露其弊端的时候，才进行政党的整顿，恢复了本质的身份定位。在80年代，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整顿的作用，社会党虽然获得了短暂的执政机会，但是这种党的主观应对长期滞后于客观的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也背离了这种变化对于改良主义政党的要求，这是如此一个近百年追求社会主义的政党不能安然度过苏东剧变和“净手运动”，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意大利共产党在战后表现出的灵活应变，符合了现实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发展要求。在经济萧条时期，意共主动提出削减福利措施和减免税收这些非左翼政策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逐步确立的情况下，意共早早决定走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一直到改名易帜之前，除了在80年代后期不可避免地遭到一定程度的衰退之外，意共始终能够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完全脱离革命主义性质后，意大利共产党依然及时地从理论到实践做出革新，仍能维持住70多万党员的雄厚实力。在多数群众性政党由于当时西欧经济社会的变化大幅缩水的前提下，意共这种表现甚为突出。因为与当时的西欧其他兄弟党如法国共产党萎缩为14万的小党的情况相比，该党的生命力无疑是顽强和旺盛的。至于它的性质是否已经质变，则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

具体地说，与反应及时的政党相比，反应滞后的政党在这样几个关键问题上的处理不当和应对迟缓，就直接造成了它们力量的锐减。一是对待战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方面，面对新中间阶级

的产生与壮大，反应灵敏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及时地调整了党关于阶级性质的纲领政策，从而获得了新中间阶级的支持，也就增强了社会基础。而法国共产党则一直到90年代才做出真正的纲领上的变化，以期获得新中间阶级的信任，但是为时已晚！二是对待战后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出现的多元化现象，社会党要比共产党更早地意识到需要在党的思想、组织和政策上实行开放性，以适应这种多元化的形势。例如，当出现新左翼及其发起的新社会运动时，社会党能够及时地吸收诸如绿党、女权等新左翼的思想观点进入自己的纲领政策之中，而法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落后是十分明显的。三是对待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动，如社会福利的危机问题，共产党表现出对过去社会福利国家黄金时代的举措十分眷恋，在新形势下仍然固守一些传统的做法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福利国家的弊端已经暴露明显，过去的主张不再能够起到作用。与社会党及时提出积极福利政策相比，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显得苍白无力，也无可操作性。

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近百年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共产党仍将长期存在于西欧政治生活之中，仍继续和社会党一样，参与在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中，以夺得竞选胜利和执政权力为直接的政治目的。为了自身的发展，共产党就必须要进一步增强自己针对新问题、新形势或者新的政治地位的灵活应变能力。因为如果是作为执政党，“获胜的‘部分’要保持‘公平’，为所有人，而不是只为自己的统治”。^①掌握公共权力，担负公共责任，及时应对

^①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9.

来自任何阶级的要求和任何领域的挑战，这是对政党执政的必然要求。当然就目前来说，西欧的共产党是不太可能获得主要执政党的角色的。不过，即使作为在野党，由于选举的需要，依然必须及时、有效地提出应对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否则政党在竞选中就不能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从战后的历史上看，在增强党的灵活性和提高党的应变能力方面，总体上，共产党面临的任务要比社会党大得多。因为它的主观反应能力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自身的革命性质及特征的一定束缚。长期以来指导思想的单一性，加上苏联的外界压力，共产党不易及时彻底地改换思想；相比之下，社会党就没有这些“烦恼”，可以及时地进行自身的改革。战后的共产党也已经意识到主观反应能力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提高这一能力。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党一直向执政党的方向努力，它就会遇到自身革命目标、阶级性质与“为所有人”的公共责任之间的冲突。因为毕竟它所生存于其中的是一个与其理想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人”包含着它要消灭的剥削阶级。而这也正是一个持续百年的老问题，现在仍需要现实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党继续探索和研究。

参 考 文 献

一、英文著作：

1.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New York: I · B · Tauris Publishers, 1996.
2. Alexander De Grand, *The Itali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Tony Judt, *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r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30 – 19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4. John Gaffney, *The French Left and the Fifth Republic, The Discourses of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5. Spencer M. Di Scalar, *Renewing Italian Socialism, Nenni to Crax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Vassilis Fouskas, *Italy, Europe, the Lef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ian Communism and the European Imperative*,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7. Jacques Levesqu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Peter Lavoy], *Italian Communists versus the Soviet Union*,

- the PCI Charts a new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8. Kate Hudson, *European Communism since 1989, Towards a New European Left?*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9. Wayne Northcutt, *The French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Fifth Republic, 1958 – 1981,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Inc., 1985.
 10. Michael A. Ledeen, *West European Commun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Brunswick, U.S.A. and Oxford, U.K.: Transaction Books, 1987.
 11. Simon Serfaty and Laurence Gary (ed.),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
 12. M. Adereth,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 (1920 – 1984), from Comintern to “the Colours of Fr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 Annette Eisenberg Stiefbold,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n Transition, PCF-CPSU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to Soviet Authority*, New York: Praeger, 1977.
 14. Tiersky and Ronald, *French Communism, 1920 – 197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5. Martin A. Schain, *French Communism and Local Power, Urb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Frances Printer Pub., 1985.
 16. Julius W. Friend, *The Long Presidency, France in the Mitterrand Years, 1981 – 1995*,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98.
 17. D.S. Bell and David Scott,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Resurgence and Vic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18. Robert Ladrech and Philippe Marliere(ed.),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History, Organization, Policie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9.
19.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0. Amherst, *Italian Socialism, between Politics and History*, Mass: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6.
21. Cris Shore, *Italian Communism, the Escape from Leninis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Pluto Press, 1990.
22. Leonard Weinber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ian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23. James Ruscoe,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1976 – 81, on the Threshold of Government*, London: Macmillan, 1982.
24. Peter Lange and Maurizio Vannicelli(ed.),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Italy, France, and Spain, Postwar Change Continuity, a Casebook*, London: Publication info, 1981.
25. Donald L. M. Blackmerz and Sidney Tarrow(ed.), *Communism in Italy and France*, Princeton, N. J.: Prins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26. Blackmer and Donald L.M.,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Italy and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7. Mario Einaudi, Jean-Marie Domenach and Aldo Garosci, *Communism in Western Europe*,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1971.
28. Martin J. Bull and Paul Heywood (ed.), *West European Communist Parties after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4.

29.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 and Party System: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 –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0. D.S.Bell (ed.), *Western European Communist and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Oxford: Berg, 1993.
31. David E. Albright (ed.),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32. Michael Waller and Meindert Fennema(ed.), *Commun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Decline or Adaptation?* Oxford, UK: B.Blackwell,1988.
33. Armen Antonian, *Toward a Theory of Eurocommunism, the Relationship of Eurocommunism to Eurosocialis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34. Enver Hoxha, *Eurocommunism is Anti-Communism*, Tirana, Albania: 8 Nentori Pub. House, 1980.
35. Ernest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the bitter fruits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2nd,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n Rothschild, 1979.
36. Stuart Thomson, *The Social Democratic Dilemma, Ideology, Governance and Globalizat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2000.
37. Peter · H · Russell(ed.), *The Future of Social-Democracy Views of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tonto Press, 1999.
38. Giles Radice and Lisanne Radice, *Socialists in the Recession, the Search for Solidarity* ,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86.
39. Donald F. and Busky, *Democratic Socialism, a Global Survey*, 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40. William E. Griffith(ed.), *the European Left, Italy, France, and Spain*,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9.
41. David Childs, *the Two Red Flags,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and Soviet Communism since 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0.
42. Douglas Eden and F.E.Short(ed.), *Political Change in Europe, the Left and the Future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43. Irenaus Eibl-Eibesfeldt and Frank Kemp Salter(ed.), *Indoctrinability, ideology and Warfar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44. Stefano Bartolini,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eft, 1860 – 1980, the Class Cle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 Bernhard Ebbinghaus and Jelle Visser, *Trade Union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Macmillan Reference, 2000.
46. David Broughton and Mark Donovan(ed.), *Changing Party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and London: Pinter, 1999.
47. Colin Crouch, *Soci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8.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49. Claus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4.
50. Frank L. Willson, *The Failure of West European Commun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ragan House, 1993.

51. Geoffrey Evans,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 Class Voting in Comparative Context*,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52. Andrew Glyn, *Social Democracy in Neoliberal Times: The Left and Economic Policy since 19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3. Roberto D Alimonte and David Nelken, *Italian Politics: The Center-left in Po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54. Danald Sassoon, *Looking Left: European Soci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I. B. Tauris Pub., 1997.
55. Danald Sassoon, *Contemporary Italy: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since 1945(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二、英文期刊:

1. *Italian Affairs*
2. *Italy, Documents and Notes*
3. *Monthly Review*
4. *West European Politics*
5.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6.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7. *Problems of Communism*
8.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9. *Socialist Review*
10. *Party Politics*
11. *The Jouvnal of Communisb Studies ancl Tvansition Politics*
12.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13. *Socialist Economic Review*
14. *Studies on the Left*

15.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Problems of Communism*

三、中文著作：

1. 黄宗良、林勋健主编：《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陈林、侯玉兰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 张世鹏著：《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4. 张世鹏著：《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林勋健主编：《政党与欧洲一体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6. 林勋建主编：《西欧多党政治透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7. 胡瑾主编：《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曹长盛主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 汪恩键主编：《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0. 李周著：《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聂运麟教授指导，2002年。
11. 张丽君著：《法国共产党“新共产主义”理论研究》，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张月明教授指导，2002年。
12. 史志钦著：《意大利共产党的演变与分裂》，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张汉清教授指导，1998年。
 13. 张耀军著：《战后西欧左翼政党联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林勋健教授指导，2002年。
 14. 张台麟编：《法国政府与政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
 15. 帅能应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 郭建平等著：《低谷中奋斗——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变化评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7. 王坚红著：《冷战后的世界共产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8. 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吴彬康等主编：《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
 20.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1951—197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
 21.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欧洲共产主义问题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22. 《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
 23. 高放、张泽森、曹德成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

- 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各国社会党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26.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版。
 27.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编：《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
 28.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9. 金重远著：《战后西欧社会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0. 张契尼等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31. 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2. 孙莹主编：《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变革》，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33. 王学东、陈林等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4. 王捷、杨祖功著：《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5. 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北京

- 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6. 殷叙彝主编:《当代西欧社会党人物传》,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37. 陶涛著:《西欧社会党与欧洲一体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8. 姜士林等编:《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族主义政党论丛》,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年版。
 39. 姜琦、张月明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848-1988)》,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版。
 40. 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版。
 41. 侯玉兰著:《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年版。
 42. 严维耀编著:《西欧劳动市场》,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
 43. 黄素庵著:《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年版。
 44.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兴衰之路——外国不同类型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版。
 45. 顾俊礼主编:《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年版。
 46.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组织编:《世界政党比较研究》,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年版。
 47. 何家栋、陈林等著:《热话题 冷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

- 主义前沿问题对话》，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8.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9. 徐崇温著：《世界之交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0. 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51. 荣敬本、高新军主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2. 李景治、张小劲著：《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3. 李宏著：《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4. 郭懋安主编：《国际工会运动知识手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
55.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七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6. 李琮主编：《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57. 沈汉著：《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58. 倪力亚、李景治著：《意大利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59. 熊自健著：《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60. 中联部研究室编：《外国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61. 肖枫著：《两个主义一百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62. 金太军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南欧诸国》，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3. 顾俊礼主编：《西欧政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4. 林勋健主编：《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65. 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6. 郝万禄、刘智勇主编：《简明西方经济学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
67.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法国经济研究室主编：《法国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8. 关树芬主编：《九十年代的西欧形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编：《世界沧桑15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0.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和发展动力国内外有关理论观点辑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版。
71. 周克明等编：《当代世界工人和工会运动》，沈阳：辽宁大

学出版社，1990年版。

72. 蔡声宁、王枚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3. 中国欧洲研究学会主编：《欧洲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2003年版系列书籍。
74. 本书编写组主编：《世界知识年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1959、1961、1965、1982—2003年版系列书籍。

四、译文著作：

1.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苏]列宁著：《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 [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5. 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张世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6. 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7. 唐建、路平译：《法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8. 《法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9.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10. 《法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
11.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 《法国共产党为保卫共和制度而斗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13. 《法国共产党为和平与民主而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14. 《意大利共产党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15. 《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6. 《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17.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18.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 方山译：《意大利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20. 《法共和意共论当前时局和党的任务》，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57年版。

21. 《保卫民主和自由的斗争——法共、意共1958年10月中央全会文件和两党联合声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22. [法]乔治·马歇著：《让我们说实话》，程效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胡尧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4. [法]弗朗索瓦·博雷拉著：《今日法国政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5. [法]热纳维埃夫·比布著：《意大利政党》，葛曾骧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26. [法]克洛德·维拉尔著：《法国社会主义简史》，曹松豪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27. [法]乔治·阿耶歇、马蒂厄·方托尼著：《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沈炼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28. [意]陶里亚蒂著：《意大利共产党》，寒微、晓煌、李杨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29. [意]阿门多拉著：《意大利共产党历史（1921—1943）》，黄文捷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0. [意]陶里亚蒂著，拉焦尼埃里编：《陶里亚蒂论葛兰西（1927—1964）》，袁华清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1. [意]贝林格著：《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 [意]托马索·吉利奥著：《贝林格》，赵洋仲，王彦林译，北

- 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33. [英]唐纳德·萨松著：《当代意大利：1945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王慧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4.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 [美]戴维·奥尔布赖特编：《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西欧的政治社会》，方廷钰，沈一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6. [英]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7. [德]托玛斯·迈尔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8. [英]威廉·E·佩特森、阿拉斯泰尔·H·托马斯编：《西欧社会民主党》，林幼琪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39.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40. [德]托马斯·迈尔等著：《论民主社会主义》，刘芸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41. [意]路易吉·德罗萨著：《战后意大利经济》，罗红波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42. [中]胡伟、[法]H·孟德拉斯、M·威莱特主编：《当代法国社会学——对战后法国社会变迁的观察与思考》，胡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43. [法]弗朗索瓦·德克洛泽著：《多多益善——法国社会生活内幕》，张庚辰、杨荣甲、林方、李琴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44. [法]弗朗索瓦·卡龙著：《现代法国经济史》，吴良健、方廷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5. [美]卡尔·马扎尼著：《欧洲共产主义的希望》，吴章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46. [意]贝尔纳多·瓦利著：《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张慧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7. [西]费尔南多·克劳丁著：《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钟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8. [意]乌尔班主编：《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前途》，石益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49. [法]雅克·德罗兹著：《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时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50. [美]克雷默、斯蒂文·菲利浦著：《西欧社会主义：一代人的经历》，王宏周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51. [美]加尔森汇编：《神话与现实：西欧国家工人参与管理概况》，裘彭龄等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52. [英]费利浦·阿姆斯特朗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钱李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3. [奥]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著：《国际史》，杨寿国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54. [英]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6.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1945—198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7.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8.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修订版。
59. [法]让-马克·夸克著:《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60. [加]艾伦·伍德著:《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1. [英]戴维·米勒著:《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2. [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63.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4. [美]约翰·凯克斯著:《反对自由主义》,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5.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政党概论》,雷竞璇译,台北:台湾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
66.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7.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学》，曹沛霖等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
68. [美]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69.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70. [德]马克斯·舍勒著：《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梯伦等译，刘小枫编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71. [法]雷蒙·阿隆著：《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72. [美]威廉·格雷德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张定淮、周新琦、夏家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73. [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74. [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五、中文期刊

1. 《当代世界》（《共运资料选译》、《政党与当代世界》）
2.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3.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4. 《国外理论动态》
5.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6.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

7. 《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
8. 《国际政治研究》
9. 《国际问题研究》
10. 《法国研究》
11. 《国际资料信息》
12. 《欧洲》（《西欧研究》）
13. 《国外社会科学信息》
14. 《参考资料》
15. 《国外社会科学》
16. 《世界经济与政治》
17.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18.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
19.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大复印资料）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形成的。2001年，进入燕园不久，出于个人的兴趣我就选定了这一题目，从此开始了三年的苦心研究。

三年间，在论文选题、资料收集、研究架构、语言表述等各个方面，我都得到了导师林勋健教授的悉心指导。先生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教我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对待学术研究中的每一个细节。先生热情的鼓励让我满怀信心，克服了种种困难。没有先生细致的关怀与不断的鞭策，我不可能在学业上取得今日的进步。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组的黄宗良教授、张世鹏教授、潘国华教授和林代昭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先生们的教诲，我将终生受益。在此，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孔凡君老师、关贵海老师、唐士其老师等我曾经请教过的专家和学者，以及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的现有研究成果的作者们。

非常荣幸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

全景同志的大力支持。老部长在百忙之中仍然花费时间、精力阅读了书稿，并亲自撰序。他对于年轻同志的殷殷期望，我将铭记在心！我还要非常感谢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正局级副所长赵子平同志的关心爱护，感谢党建研究所的各位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热情帮助！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许多同志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在此，我要说一声：谢谢你们！

作为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我深知自己的学识还很浅陋，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文中的不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韩 灵

2005年11月于北京